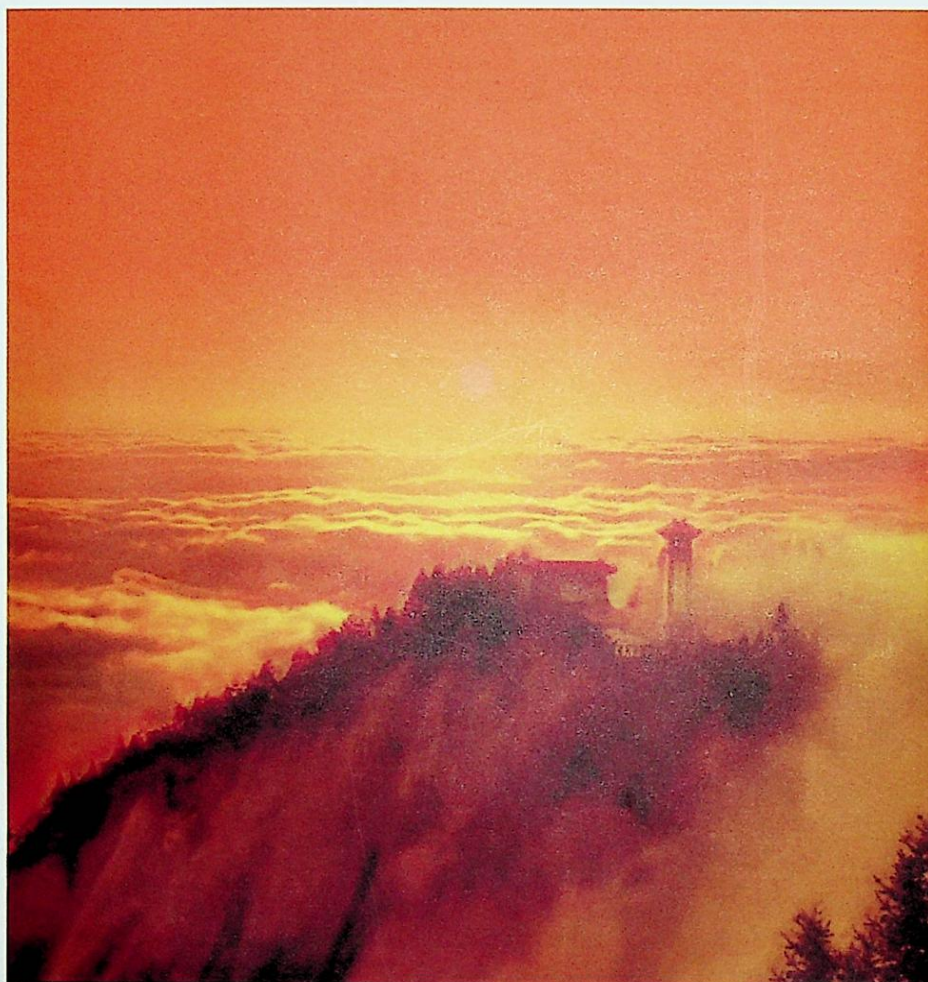




江西党史资料⁴⁵

朱开铨专集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江西党史资料”编委会

主 任 王晓春

副主任 卢大有 彭勃 史爱国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左家法 龙小东 刘 津 汤静涛 况建军

何新春 吴昌荣 张荣辉 周少玲 罗军生

黄福生 盛 璆 谢晓亮 鲍 焱 熊小席

戴和君

本辑责任编辑 彭志中

江西党史资料（第四十五辑）

朱开铨专集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延安时期照片



陕甘宁边区时期照片



罗培兰同志



朱开铨同志的夫人罗培兰抗战时期在陇东庆阳



朱开铨同志于1948年初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土改训练班



朱开铨同志、罗培兰同志和孩子与庆阳县政府兼专署同志们合影



1951年9月30日，宁都。卫生工作专区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右五朱开铨，前排左一罗培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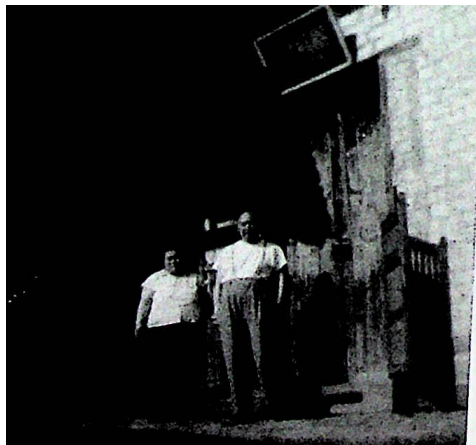
1952年宁都专区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全体合影



1952年12月，江西省委欢送陈正人同志赴北京履新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二为朱开铨



1962年朱开铨同志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964年夏，朱开铨同志和罗培兰在赣州会昌毛泽东同志旧居前



1972 年朱开午铨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左四余积德、左三为刘俊秀、右三杨尚奎



1986 年 10 月 4 日至 7 日在南昌市召开的“1935 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健在委员座谈会”全体与会
会人员合影。前排右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前排右四朱开铨，前排右三何绮波，前排右五周
守如，前排右六李小侠，前排右一中共遵义地委书记。



朱开铨同志和罗培兰同志 1989 年 9 月 18 日在南昌家中

目录

一、 朱开铃传记·····	(1)
二、 文稿汇集	
1、(电报)发理治劲光(1936年5月17日)·····	(33)
2、(电报)通知(1937年5月24日)·····	(34)
3、(电报)(1949年10月15日)·····	(35)
4、朱开铨致邵主席的信(1949年11月)·····	(36)
5、朱开铨致邵主席的信——关于寻找寄养革命儿童 (1949年12月)·····	(37)
6、宁都分区代表朱开铨的发言(1950年)·····	(38)
7、几个问题的报告(1952年10月)·····	(42)
8、关于重点乡分配情况(1953年3月7日)·····	(43)
9、江西省民政厅长朱开铨厅长发言记录(1953年11月11日)·····	(46)
10、关于老关系人员训练班报告的函(1953年5月)·····	(49)
11、弋阳县增加八个重点村给邵式平主席的信 (1953年5月16日)·····	(50)
12、民政厅朱开铨厅长关于市镇的基层组织暂行方案以及乡村 基层组织暂行方案的报告(1953年6月30日)·····	(51)
13、朱开铨厅长关于江西省四年多来民政工作的总结及当前 工作任务的报告(1954年)·····	(53)
14、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五总分团江西分团工作报告 (1954年3月)·····	(75)

15、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通报)(1954年5月31日)·····	(77)
16、关于购粮工作十二月廿二给省里的信(1953年12月20日)·····	(78)
17、检查丰城十区爵坑乡二村春荒调查报告	
18、关于修建黄道烈士陵园墓图样及经费的请示(1954年3月)·····	(86)
19、关于临川、黎川、贵溪等县需要将山地区乡划小平原乡划大的情况 (1954年4月20日)·····	(87)
20、在全省救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草案)(1954年6月21日)···	(88)
21、关于复堤堵口经费问题的签呈(1954年11月15日)·····	(95)
22、关于鹰厦铁路工程有关问题的检查报告(1955年11月15日)·····	(97)
23、在省四届政协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1980年3月6日)·····	(102)
24、红军长征路上的回忆(1981年6月12日)·····	(104)
25、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的经历·····	(108)
26、朱开铨著《保卫苏区南大门》·····	(122)
27、朱开铨著《回忆查田运动》(中央苏区时期)·····	(132)
28、回忆录中长征湘江、遵义手稿部份·····	(147)
三、回忆与缅怀	
1、习仲勋：《写在朱开钱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原始笔迹、签名·····	(153)
2、习仲勋：《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序·····	(155)
3、刘力贞、张光：纪念朱开铨伯伯·····	(157)
4、朱春宁、杨斌、朱瑞华：浅谈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陕甘省 苏维埃政府的衔接问题·····	(161)
5、杨龙、辛明：永恒的记忆在未来、有一种精神让我们自强不息、	

时代需要铁骨热血·····	(169)
6、熊国庆：在朱开铨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171)
7、朱亮、朱新平、朱红：鞠躬尽瘁风范永存 ——纪念父亲诞辰：100 周年·····	(178)
8、朱新平、朱春宁：在毛主席指导下反围剿·····	(185)
9、朱亮：我的父亲朱开铨·····	(192)
10、毛瑞明：“毛主席的巡视员”——朱开铨·····	(199)
四、附录	
1、《回忆与研究》上册（李维汉著）第 339 页·····	(209)
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朱开铨）·····	(211)
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	(214)
4、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任命状·····	(214)
5、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通知书（1950 年 9 月 22 日）·····	(215)
6、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通知书（1953 年 4 月 3 日）·····	(215)
7、陕甘根据地创始人、著名军事家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同志 代表同桂荣同志写给朱开铨、罗培兰同志的书信复印件·····	(216)
8、刘力贞同志的题词原件复印件	
①“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干部罗培兰”晚辈刘力贞·····	(217)
②瑞金南梁后人刘力贞·····	(217)
9、朱开铨著《关于遵义会议期间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218)
10、《中央给理治、劲光并转省委成立陕甘宁省委及干部任命》 党中央 1936 年 5 月 17 日复印件·····	(225)
11、朱开铨著《瑞金人民革命斗争片断》1958 年 8 月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27)
12、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6 年 3 月 26 日“中央批准朱开铨同志按省长级待遇”复印件·····	(238)
13、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证书”复印件《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	(240)
14、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240)
15、《赖传珠将军日记》第 117、119 页·····	(241)
16、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主编《战地黄花》42 页朱开铨同志夫人、老红军罗培兰·····	(242)
17、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	(253)
18、朱新平、朱春宁、朱红：记述父亲回忆习仲勋在陕甘边和陕甘宁根据地·····	(256)
19、1981 年 11 月纪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请柬·····	(265)
20、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序列·····	(265)
21、南梁革命历史纪念馆·····	(266)
22、1935 年 1 月 11 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266)
五、生平年表·····	(269)
后记·····	(283)

朱开铨小传

朱开铨小传

一

朱开铨，曾用名朱秉衡、朱镇东，1901年9月18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合龙乡松山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朱广昭，靠租种地主、公堂的土地养家。母亲刘招娣，操持家务并做一些手工活补贴家用。朱开铨为长子，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9岁、11岁曾在家乡附近的田心私塾读过两年书，12岁至14岁在合龙镇的一家小店铺当学徒，15岁以后在家务农。

瑞金地处赣南东部，与福建长汀接壤，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闭塞落后。在清朝和国民党统治初期，县域内的区、乡都不曾派人管理，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广大农村一般是由当地大姓中的土豪劣绅出钱到县里捐个官，然后组织起民团来处理当地事务。在农村中，许多村庄都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名称不一，如“田村会”“鸭婆会”等，主要协调农田灌溉用水和田租比例等事项。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受广东革命发展的影响，瑞金1924年就有中共党组织在活动。1925年10月29日（农历9月12日），在赣南特委陈奇涵的指导下，瑞金县第一次党代会在锦江中学召开，成立了瑞金县委，杨荣才为书记，邓家宝、杨斗文、杨金山、杨寿宝、钟腾贤、朱玉山、杨泰帮、廖斌等8人为委员。瑞金县委成立后，为配合广东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以农村中原有的农民组织为基础，在县域内的各个隘都建立起了农民协会。1926年秋，北伐军到了瑞金，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协会的发展，农协活动由半秘密转为公开。朱开铨经杨华昌介绍，参加了合龙乡车断隘农民协会，任农协宣传委员。他组织群众参加各种集会，发动农民起来向豪绅地主斗争，不久，由共产党员杨华昌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赣南革命形势低落，瑞金的反动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组织起反动靖卫团，对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杨华昌被捕，农民协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为了躲避靖卫团的搜捕，朱开铨转移到山区藏匿，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

1928年，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成立红四军的消息传到瑞金，推动了瑞金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瑞金县党组织负责人杨寿宝将朱开铨等人秘密召回，传达了上级布置的斗争任务，开展恢复中共组织的活动。经过斗争考验，1929年5月，由杨寿宝、朱甫挺介绍，朱开铨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红四军来到瑞金大柏地的麻子沟，和尾追敌人刘士毅旅打了一仗，歼敌800人，吓得刘士毅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县城。红军在大柏地与当地群众一起过了一个胜利年。接着，又攻下了宁都县城，随即东进长汀，开辟闽西根据地。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共瑞金县委决定创立红色暴动队，朱开铨任瑞金县第八大队（即合龙乡暴动队）第五中队中队长。全中队除两条枪外，其余都是鸟枪、梭镖、土炮。1929年冬，中共赣南特委派蓝夏桥、杨子江来瑞金创建革命武装，在原来擄动队和赤卫军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第二十四纵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于1930年春发动总暴动，一举攻克了瑞金县城，成立了瑞金县革命委员会（不久改称苏维埃政府）。

革命政权建立以后，1930年6月开始分田斗争。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得了胜利果实，无不兴高采烈，更加拥护红色政权。但是，一批逃命到石城的瑞金籍土豪劣绅，乘红四军主力再度入闽的机会，以重金勾结石城县靖卫团团团长赖世琮攻打瑞金县城。中共瑞金县委闻讯后，当即召开各区赤卫队队长联席会议，决定选择距县城不远、四周环山的合龙，集中二十四纵队和壬田游击队及壬田、合龙、沿岗、云集4个乡的赤卫队共3500人，由杨斗文指挥，待机歼敌。1930年7月16日，赖世琮率靖卫团1000多人

到达合龙地区宿营。翌日，红军二十四纵队和赤卫队向赖部发动袭击，打了个敌人措手不及，千余人全部被歼，赖世琼也被击毙。朱开铨率领合龙乡赤卫队第五中队参加了这次战斗，从中得到了锻炼。

1930年11月，红二十四纵队奉命改编离开瑞金。由于肃反扩大化，苏维埃内部存在惶恐气氛，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叛乱，瑞金和赣州的反动势力乘机勾结起来，组成了一支几百人的反动武装占领了瑞金县城。各地土豪劣绅纷纷重新组织民团，向初生的红色政权反扑，瑞金大部分堆区被其占领，革命再次陷入低潮。朱开铨和温时汗、谢桂柱、朱鸿等人结伴，离开瑞金前往宁都的黄陂、小布寻找红军。在宁都连陂桥，正遇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回到宁都。朱开铨第一次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毛委员。毛委员指示瑞金来的同志武装起来，打回瑞金去，重新恢复政权，并拨给100条枪，组成了一支百人队伍。朱开铨被编入这支队伍。他们在杨金山的带领下，首先在大川打掉了一个民团，接着又计夺了壬田镇。县里敌人闻讯，立即派出警卫队长钟文彰带100多人下乡“清剿”，被游击队在途中打了个伏击，钟文彰和几十个警卫队员被击毙，逃跑了的又大多掉进河里淹死，此役大获全胜。此后，这支队伍在杨金山的带领下边打边建设红色政权，很快瑞金的政权回到了人民手中。

注：此传为刘勉玉同志发表在1996年7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七卷的朱开铨条目，根据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及其家人提供的资料略有增改。

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江西日报》1993年2月四版，《朱开铨同志生平》。

二

1931年3月瑞金红色政权恢复后，朱开铨任壬田区合龙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裁判委员、代主席，分管经济和财政工作。当时，苏区肃反扩

大化比较严重。8月，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上任后及时制止了肃反扩大化倾向。9月，邓小平到壬田区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朱开铨正好坐在他的身旁。他问了朱开铨的家庭成分和有关情况后，又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朱开铨回答道：“我对这个社会制度不满。”邓小平说：“你这个同志很实在，思想也很进步嘛！”^①会后，邓小平在瑞金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朱开铨被调去学习了1个月，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

11月7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合龙乡苏维埃政府决定由朱开铨负责大会的给养保障和祝贺工作。朱开铨抓紧落实大会筹备处订购的各类食品与物质，组织人员扎花灯，写标语牌，成立铜号队、歌舞队等，连续三天带队前往祝贺。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在叶坪办公，中共苏区中央局也随之迁来叶坪，从此，瑞金被称为红色首都。

1932年4月，朱开铨当选为新成立的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由于叶坪是云集区的一个乡，所以云集区的地位十分重要。按当时关于中央机关党的组织关系由驻地党委领导的规定，云集区不仅要领导驻叶坪的中央单位的党组织，还要担负中央单位和部队2万人的粮食供应。朱开铨一方面感到身上担子很重，要想方设法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又觉得是一种幸运，“有条件接触中央的领导同志，更能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帮助。”^②他相信，只要有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任务都可以完成。

当初，云集区的工作比较落后。就拿叶坪乡来说，“扩大红军、经济动员、参战工作等都非常差，贫农团及各种群众团体，连会议都召集不成。”^③徐特立同志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教育部副部长，在叶坪试办一所学校，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扩大红军及其他工作也一样，缺乏生气，死气沉沉。”^④周恩来初到苏区时，就及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中央所在地是一个落后区的落后乡，必须改变这种局面^⑤。1932年4月至10月，云集区先后换了4个区委书记，局面仍未改观。朱开铨兼任区委书记后，深入

乡村调查研究，终于了解到真情，一是群众对 1930 年和 1931 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还是三等田，而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二是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混进了区、乡党政组织，经常诬告打击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朱开铨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向中共瑞金县委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那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⑥朱开铨想，看来要解决问题，非找毛泽东主席不可。

1933 年 2 月 13 日，朱开铨得知毛泽东已从福建长汀回到了瑞金叶坪乡陂坞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到云集区当苏维埃主席已经十个月了，什么工作都开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分田不合理，干部队伍不纯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我想向毛主席写个书面报告，但是，因为我文化水平太低，想向您作口头汇报，不知毛主席有没有时间，这样做是否方便，请批示。”^⑦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派警卫员陈昌奉给朱开铨送了回信，约他到办公室面谈。2 月 15 日，他应约去见毛泽东。在他汇报了云集区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问：“为什么工作开展不起来？”朱开铨如实报告了调查的情况。毛泽东问道，云集区 9 个乡，哪个乡最难开展？”朱开铨说：“叶坪乡最难开展。”他列举叶坪乡前两任苏维埃主席因被人控告，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撤职查办，现任乡苏维埃主席朱先棋是个雇农，也因为害怕控告不敢大胆工作。毛泽东问：“控告的都是什么人？”朱开铨答：“控告的多是地主、高利贷者的亲友，或者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毛泽东接着问：“各乡是否都有积极分子小组？都有多少积极分子？”朱开铨说：“各乡都有积极分子小组，每乡四五人，共 39 人。”毛泽东对朱开铨的汇报作了肯定，并把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1930 年和 1931 年两次分田是和平分田，土地革命不彻底；第二，主要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去斗争地主；第三，基于前两点，使得一些地主、富农分子隐藏起来，有的还混进了党：政、群众团体中来，混进贫农、中农队伍中来，造

成阶级阵线不清，干部队伍不纯。”毛泽东表示：“阶级敌人控告积极分子，就是向革命队伍进攻，这些严重问题必须解决。”他要求朱开铨回去把39名积极分子召集起来，他亲自去听取汇报。^⑧

2月16日上午5点多钟，各乡39名积极分子都来到区政府，毛泽东带着王观澜到来后，朱开铨主持了汇报会。各乡积极分子争相发言，汇报漏划地主、富农情况及他们的破坏活动，会议从下午6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点。毛泽东认真地听了每个人的汇报后，要求朱开铨等抓紧办好三件事：第一，扩大积极分子队伍，每个乡要扩大到二三十人；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地调查核实地主、富农的罪行材料；第三，要广泛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揭发地主、富农的罪行。毛泽东最后说：过10天再来听取大家的汇报。^⑨

送走毛泽东后，区委领导又接着开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第二天，区委就派干部到各乡去帮助工作，几天时间，各乡的积极分子都扩大了1倍，一些漏划地主、富农的情况得到核实，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10天以后，即2月26日晚，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云集区政府，听取群众反映，这次到会的积极分子比上次多几倍，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情绪非常热烈。毛泽东时而插话，时而记录，最后作了重要指示，正式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他说，“查田不是要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亩田，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不管这些人是混进乡苏维埃里，还是混进区、县苏维埃里，都要查出来。要搞清楚他们的剥削情况，核实好他们的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⑩他还提出要团结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并说，有点偶然剥削，不能算富农；地主也要分给田地，让他们自食其力。他要求云集区把生产搞好，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使每个乡都变成模范乡。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宣布自己要亲自在叶坪乡搞查田运动试点，并且要组

织力迓帮助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

云集区的查田运动，是从2月下旬开始由点到面展开的。先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叶坪乡搞试点，接着毛泽东又派罗镜瑞带70多人的工作团到一、二乡工作，云集区委抓第三乡。朱开铨还负责其他5个乡的面上发动工作，推广点上的经验。

在查田运动的日子，朱开铨隔两三天就去毛泽东那里一次，向他汇报各乡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聆听指示，然后又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各乡去贯彻。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云集区4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进展顺利，仅1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经过清查，全区共查出地主91家，富农23家，没收地主的，土地都用来分给贫农，叶坪乡每人平均多分了9分地。

经过查田运动，云集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培养了300多名积极分子和干部，建立和扩大了贫农团组织，划清了阶级阵线，肃清了封建势力和半封建势力，解决了1930年和1931年分田不合理的问题，纯洁了党、政、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加强了经济建设，扩大了红军，支援了革命战争。尤其是叶坪乡，在扩大红军、出借军粮、妇女做军鞋慰劳红军、退还公债票、建立犁牛合作社等方面，都走在前面。《红色中华》报表扬它“已由最落后的乡，一跃成为云集区的模范乡”。^⑪

1933年“红五月”扩大红军时，瑞金县分了2500名指标，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说完不成。毛泽东把朱开铨找去，问云集区今年能扩大多少。朱开铨说：“400人有把握。”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要朱开铨在瑞金县扩红动员会上介绍经验。毛泽东在动员大会说：“瑞金要扩大2500名红军，云集区承担了400名，你们别的区各承担200名行不行？”^⑫朱开铨回去以后，又进一步作了动员，结果，云集区实际上共扩大红军1020名，涌现了许多妻送夫、父送子参军的生动场面。

当时，中央苏区粮食库存不够，长汀、瑞金粮食供应困难，以致影响红军军需。毛泽东派通讯员送一封信给朱开铨，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要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3升米，2.8万多人就可以节约840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朱开铨把毛泽东的指示在区里传达后，全区掀起了家家捐献、人人出粮的热潮，仅仅3天时间就捐粮1000多担，超过计划1/4^⑬。瑞金县召开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会、贫农团代表会议，动员各区乡卖谷给苏维埃。朱开铨首先发言，要承担600担谷子。会后，云集区召开群众代表会议进行动员，“进一步提出要收买750担给苏维埃，群众都踊跃地自愿节省自己的粮食给苏维埃与红军。”^⑭为此，《红色中华》报发表评论文章《学习瑞金云集区的模范》，号召大家“学习云集区为解决粮食的战斗精神”^⑮。在云集区的带动下，瑞金县28万人民在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三升米运动”。

193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任命朱开铨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⑯。

云集区的查田试点工作，是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先导。云集区查田试点的成功经验，推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开展。1933年6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叶坪乡召开了8县查田运动大会和8县贫农团大会，并作了长达一天半的报告。朱开铨应邀坐在主席台上，会后，中央组织了包括从云集区抽调的400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内的大规模的工作团，到8县去开展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

①朱开桂：《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

②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③《在深入土地革命中，云集区第四乡的伟大转变》，1933年5月5日《红色中华》。

④王观澜：《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⑥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⑦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⑧⑨朱开铨：《六十巧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0页。

⑩朱开铨：《六十巧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0页。

⑪1933年5月5日《红色中华》。

⑫⑬朱开铨：《六十巧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0页

⑭⑮《为解决粮食而奋斗——学习瑞金云集区的模范》，1933年5月17日《红色中华》。

⑯1933年5月11日《红色中华》。

三

1933年6月，毛泽东派朱开铨到长胜县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行前，“毛主席把我叫到他在沙洲坝的办公室里，给我布置了具体任务，要我到那里以后，抓紧发动群众，抓紧发展生产，要重视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①

7月上旬，朱开铨来到长胜，召开第一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和健全全县级苏维埃机构。大会结束后，他背着背包，深入各个区乡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地方工作瘫痪，学校关门，主要是“红五月”扩大红军时，党员和骨干都去当红军了。于是，他一面大胆地起用新干部，一面建议县苏维埃作出决定，机关干部都下到各区去健全各乡的党、政、赤卫军、农会等组织，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在此基础上，朱开铨发动苏区农民秋收秋种，搞好农业生产；挖池塘、筑堤坝、进行水利建设；针对苏区耕牛缺乏，又组织犁牛合作社，调剂耕牛的使用；根据各户的人口和田亩的等级，收取轻薄的农半累进税，增加财政收入，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战争环境和经费奇缺的条件下，朱开铨重视发展苏维埃教育，因陋就简办了几所列宁小学和一所中学，动员少年儿童自带桌椅上学。令各乡对扩红走了的小学教师在短期内补齐。9月间，各个学校上课，长胜县儿童个个喜笑颜开。

朱开铨在长胜工作了4个月。1933年10月，他被调回瑞金，进入毛泽东任校长的苏维埃大学学习，并任二大队指导员。1934年1月，朱开铨从苏维埃大学毕业，作为列席代表，在沙洲坝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苏大”以后，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主席团主席，选调王首道、周月林、朱开铨3人为主席团巡视员。朱开铨担心自己文化低，能力不够，迟迟不敢去主席团报到。一天，毛泽东派人把他找去，针对他的思想顾虑，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长处，工农干部也有工农干部的优点，你是本地人，对这里的情况、风土人情都非常熟悉，并且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这些我们都很需要，不要有顾虑，要大胆的工作，革命斗争是人增长聪明才智的途径。”^②

一次，中央土地部争论在农村种一季稻好还是种两季稻好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便派朱开铨到瑞金作调查，看看种一季和两季各有什么依据，还指示要到反对种两季稻的地区去调查。结果妥善解决了不同地区种单季和双季稻的问题。

福建长汀县属的古城发生农民之间互相争执的问题，中共长汀县委派人去了几次没有得到解决。朱开铨要求毛泽东派他去一趟，毛泽东同意了，并嘱咐他要用合理调整的办法解决农民内部的矛盾。⁴ 开铨去古城了解情况以后，从教育入手，采用调剂的方法，合理地解决了当地农民之间存在的问题，长汀县委很满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朱开铨感到非常愉快。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瑞金九堡和沿岗区调查，帮助解决了那里发生的农民之间互相争斗的问题；还去福建长汀古城，解决了那里发生的农民之间互相争斗的问题，深得毛泽东好评。同时，毛主席帮助朱开铨学习，给他讲标点符号，讲革命理论，讲政策、策略，讲工作方法，讲联系群众，使他终身不忘。他由一个农民出身的“大老粗”，逐渐锻炼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正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结果。

“二苏大”以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更大规模的“围

剿”，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很快占领了寻乌、安远、筠门岭，粤赣省所在地的会昌县成了苏区的南大门。

1934年4月，没有等到毛泽东从福建视察回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即找朱开铨谈话，调他到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任土地部部长兼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开铨服从命令，当即到会昌县城东彭迳松山排就任。

1934年5月，毛泽东亲临会昌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执行委员、区乡政府主席92人到会，毛泽东、刘晓（省委书记）、钟世斌（省政府主席）、朱开铨（省政府土地部长）先后讲话。大会选举朱开铨任会昌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朱开铨领导下，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全面深入进行查田运动，健全区乡级政府工作，扩大三个基干游击大队，建立游击小队，发动群众开展扩红运动，为前线筹粮筹款，很快就改变了会昌县落后局面，到6月，全县扩大红军2008名，位列中央苏区第四名。

6月，毛泽东到粤赣省视察，指示要加强距会昌县只有30公里的高排一带的防务。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共粤赣省委决定成立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亦称会西工作委员会）由朱开铨任主任。

6月17日，朱开铨率会安工委一行9人来到高排，当即分头下去调查研究，发现粤敌前3次进攻，都是在农历十五、十六日晚上趁着月光发动的。朱开铨等决定利用粤军的这一进犯规律。他们在粤军进犯必经之地的安远官溪、老鸦石到会昌的朱方围，沿途10多公里的险要山头上，埋伏下1000多名战士和干部、群众，堆满几十斤重的大石块和几百斤重的松树筒，用藤条套住，静候敌人的到来。

6月28日（农历六月十五）下半夜，粤敌果然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伏击圈。朱开铨一声令下，战士们用快刀砍断藤条，松树筒和大块石头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滚去，砸死砸伤了不少敌人。敌指挥官摸不清山上虚实，胡乱开了一阵枪炮之后，急忙抬着尸体往回逃窜，丢下不少子弹和枪支。战斗胜利后，朱开铨赶到省委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非常高兴，说：“打得好！”

打得好！”^③

陈济棠的粤军在安远县城设有一个旅部，下辖两个团。一个团在天心圩与高排对峙，另一团在筠门岭与驻罗田的红 22 师对峙。由于筠门岭的敌军突不破红 22 师的防线，驻天心的敌军就被调往筠门岭，只留下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天心圩。侦察员将这个情况向朱开铨汇报后，朱开铨率领独立营、游击队、保卫队共 700 多人，连夜赶到 20 公里外的天心圩。这时，东方早已破晓，留守敌团部的一个排，闻风而逃。独立营胜利地占领了敌团部，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又在团部军需处得到几千斤盐，几百公斤油，几万斤粮食，以及一批药品和布匹。当天下午，朱开铨组织人力将这些战利品全部挑回高排。

以这批物资为基础，会安工委在高排建立了贸易栈，组织苏区和白区贸易往来；还通知瑞金、于都、会昌的消费合作社来这里买盐，帮助一些地方解决了吃盐难的问题。中共粤赣省委书记王明和刘晓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同志到这里时，看到朱开铨等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打开了局面，非常满意。

朱开铨领导会安工委在辖区，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自筹经费给养，展开边贸，用银元兑换苏币保证红军主力部队的购买力，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和发动群众，同仇敌忾，坚壁清野；布置赤卫队监视广东军、民团的动向，及时掌握敌情；指挥地方部队主动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拖住敌军，扩大游击区，保卫了战略要地高排，保障了南线反“围剿”主力部队侧翼安全，配合红 22 师扭转了被动局面，使中央苏区南线成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稳定的战场，为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创造了条件。

①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9 页。

②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75 页。

③朱开铨：《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红星照耀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5 页。

四

1934年9月，朱开铨奉命去中央党校学习。行前，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留他做了半个月的动员工作，才让他去报到。他到中央党校刚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即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你去红军中工作，任中革军委五局特派员。罗迈说：“你是中央工作团没收委员，到那里后，第一，监督执行政策；第二，依法打土豪收集资财，供应红军；第三，做群众工作。”^①

10月15日晚，朱开铨随中央直属机关一起，离开了瑞金云石山。他后来才知道，从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0月18日下午，朱开铨从部队驻地于都古田到于都县城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今天晚上要过于都河，吃了晚饭就走。”^②朱开铨先到于都河上去查看已经搭好的浮桥，并在桥上来回走了几次，才放心的回来随毛泽东一起过了浮桥。11月15日，部队通过宜章，朱开铨患了疟疾，仍然随军行动。一天晚上，实在走不动了，倒在了路旁。恰好毛泽东路过，问清病情后，立即派人到第五局找来担架把他抬上，又叫傅连暲给他看病，接连打了4天针，朱开铨的疟疾病终于好了。12月中旬，朱开铨奉命调到红章纵队。红章纵队赍中央和红军的后勤部队以及中央苏区的银行，四五百个挑夫挑着几百担银元及其他辎重。由于伙食很差，许多同志体力不支，挑夫跑了一些，银元也丢失不少。朱开铨调去以后，领导上就把整顿挑夫和改善伙食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改善伙食，争取每人每天有点肉吃，增加体力；二是清理担子，每担由原来的八九十斤减少至60斤左右，使挑夫的负担符合行军的要求；三是清理挑夫，把那些不愿意留下的，身体不好的都清理掉，再用公道价钱雇一些短期挑夫。经过这样整顿，部队的伙食大为改善，担子也轻了很多，大家都很高兴，纵队司令员罗迈夸奖说：“朱开铨同志很会办事”。^③

1935年1月9日，朱开铨随红章纵队进入遵义城。1月10日，朱开铨去看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并以此为根据地，

把影响造出去，赤化整个云、贵、川。”^④11日上午9时，在遵义广场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红军总政治部代表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罗梓铭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开铨任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土地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驻遵义的机关、部队以及遵义附近的部队有足够的粮食给养。为此，朱开铨带领十几名成员四处奔走，采购了大量的猪、鸡、蛋之类的食品，满足了各机关和部队的需要。同时没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进行了打土豪；打开国民党在遵义的三四个粮仓，让群众自己去挑粮。

1月17日，作为党的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结束。在会议期间，红军进行了一次整编和为期十天的休整，从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19日，中央机关离开遵义。3天以后中央电报指示，遵义革命委员会暂告一段落。由于遵义革命委员会撤出遵义的时间比中央机关晚，朱开铨等便和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地方工作部一起长征。

部队到达云南扎西，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找朱开铨谈话，要他到十二团任地方工作组主任。十二团是三军团的模范团，以善打硬仗而著称，团长谢嵩，政委苏振华。朱开铨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刘少奇又叮嘱他到十二团以后，“要把团的供给工作搞好”。^⑤

这时，红三军团十二团在毛尔盖附近的芦花休整了3个星期，并筹备粮草，准备过大草地。在人口不多的藏族同胞居住地区筹备粮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朱开铨带领地方工作组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土司的宫政，搞到二三万斤粮食，又和由邓克明指挥的二营一起，打了一个土司的牛场，缴获了10多头牛，从而解决了部队的粮草供应。但在解运牛的过程中，地方工作组遭到了反动土司的袭击，朱开铨的脚部受伤化脓。他以坚强意志，在茫茫大草原上走了6天6夜，出草地后又随军过腊子口，越岷山，经甘南的哈达铺继续北上，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的吴起镇。

①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②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③朱开给：《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0 页。

④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32 页。

⑤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0 页。

五

10 月下旬，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在吴起镇休整了几天后，朱开铨随军前往甘泉县，途经一个叫下寺湾的地方，守候在那的王观澜把朱开铨从行军的队伍中叫出来。王观澜向朱开铨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区，派你代表中央接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省苏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裁判部部长，制止对陕甘边的“左”倾错误肃反。这是中央采取的紧急组织措施。中央决定在陕甘省打一个大歼灭战，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南北语言不通，筹建陕甘省政府，要团结依靠陕甘边干部。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同志不是土匪，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军事斗争的陕甘红军不是土匪队伍。陕甘省首要任务是配合红一方面军，打个大胜仗。要立即成立支前工作团，这一仗打不赢，我们中央红军还要走。不允许用戴上土匪黑帽子的办法，以此为借口。抓人、杀人，搞宗派主义，排斥不同意见的同志。如果肃反扩大化继续下去，象中央苏区一样，这块根据地也很快会被搞掉，我们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①

新成立的中共陕甘省委，把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朱开铨向时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王生玉转达中央的命令，筹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接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辖区域的政府机构，将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序列；保障供给红一方面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五千人的每日粮草供应，在 15 天内筹足一个月的粮草随时调用；组建陕甘省支前工作团，组成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转运粮食、弹药和伤员，迅速开展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配合红一方面军打败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②

当时的省苏维埃政府总共只有七八个人，在三孔窗洞里力与居住。朱开铨把中央红军带来的警卫队和干部分成小组，除执行勤务的人员外，都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六军是一家，已经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命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宣布撤消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中央红军将和红二十六军并肩作战，保卫陕甘边的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打败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加紧寻找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尽快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筹建陕甘省政府。在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罗培兰等人的协助下，马锡五、杨玉亭、王子宜等原陕甘边区苏维埃的一些骨干力量很快回来了。”^③

直罗镇战役前夕，朱开铨在布置陕甘省支前工作时指出，中央红军将开展上万人的大兵团作战，军情瞬息万变，陕甘省预设的供给站点不可能随处都有，根据在中央苏区的战勤丁。作经验，凡红军在陕甘省战区发生的食宿、饮水、柴草、人工等费用，群众可以凭红军部队出具的欠款白条到陕甘省政府设置的兑付点足额领取现金，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做到只要有群众的地方，红军就能解决后勤供给问题，保持轻装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优势。^④

1935年11月8日，朱开铨率领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开赴郿县战区。支前工作团从中央红军来的干部较少大部分是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主要依靠他们帮助与群众沟通和战勤动员。陕甘边根据地的群众就像中央苏区的群众一样积极参战支前。支前工作团在肃清匪特、收集敌情、封锁消息、筹集经费、加工储存粮食、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帮助隐蔽红军主力部队以及组织向导队、担架队和运输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⑤

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毛泽东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同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5年11月30日，在陕甘省郿县东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背以上干部

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陕甘省委、省政府的支前工作，并列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四个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中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的这样好。”

1935年12月初的一个夜晚，毛泽东亲临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向朱开铨要可靠的向导带路赶往瓦窑堡。听取省委的工作汇报，了解陕甘省干部情况。毛泽东对朱开铨说：“观澜同志向你传达我的话，你讲给我听一遍。”听完复述后，毛泽东说：“对，都是我的意思，让你兼两个部长，一是要搞土地革命，划分阶级，二是要继续肃反。这两项工作政策性都很强，不能出偏差。”朱开铨汇报了成建制编入陕甘省的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的过程。强调这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有群众基础，能吃苦，能干事，靠得住的干部队伍，在直罗镇战役期间，主要就是陕甘边来的干部同中央红军合编后，共同努力完成了参战支前任务。如果没有陕甘边的干部组织群众支前，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就不可能做的那样好。朱开铨着重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长马锡五，在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以哥老会龙头大爷身份与刘志丹寻找适合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勘察南梁地形，调查社会情况，刘志丹发现南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子午岭山脉，很多条件类似井冈山，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马锡五参加了南梁根据地初期创建，任南梁游击队军需，利用哥老会关系安排伤员，负责部队粮食供给，陕甘边群众称他为“陕甘边红军管饭的马大爷”，“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肃反时不敢抓他，因为靠马大爷才能有粮食吃。由于刘志丹被指责土匪路线，没有办法介绍他入党，其他党员也不敢介绍他入党，马锡五一直是陕甘边红军粮食供给负责人，不能参加党的会议，没有实际职务，还要完成其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直罗镇战役粮食供给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说：这是一个立场坚定，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有重要贡献的哥老会龙头大爷，又经过直罗镇战役考验，你就当他的入党介绍人。陕甘边根据地不是一个马大爷就能打下来的，要继续深入

调查陕甘边根据地干部情况，现在洋房子先生还很牛，以为在国外读过理论书，按照洋书本就瞎指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农民起义军改朝换代的历史，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要在农村发展力量。目前有些错误还没有时间去纠正。在井冈山没有保住王佐袁文才，失去了根据地，是血的教训。我们要找到熟悉陕甘边实际情况、受群众拥护、有建立红军和开辟根据地经验的陕甘边干部，工作上要注意保护陕甘边区的革命火种，失去他们，会失去群众。团结陕甘边区的同志，我们在西北才能站住脚。陕甘省的工作就按会昌的方式办，要及时向中央汇报进展情况。朱开铨说：已告诉自兴同志，省保卫局要保护找回来的陕甘边干部。^⑥

粮食供应问题始终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和朱开铨面临的一大难题。陕甘省内的驻军有1万多人，还有各级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陕甘省区域虽大，人口并不多，土豪也打光了，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为解决民食军需，陕甘省苏维埃决定，组织两支运输队伍，每队200匹牲口，近百名队员，到白区去打土豪。经过两支队伍轮番到白区活动，才基本上解决了部队和机关、团体的粮食供应。

1936年2月，朱开铨被任命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经马锡武介绍，朱开铨和省苏维埃内务部干部罗培兰结为伴侣。5月17日，中共中央电令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朱开铨被任命为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委委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

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会议，部署苏区各项工作。会后各县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巩固革命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赶做军鞋军服，收集粮食3万多石，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西征，为迎接全国的主力红军在西北会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36年11月山城堡战斗后，国民党军被迫后撤150公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同年冬，省委、省苏维埃派出由朱开铨、蔡畅、郑自兴、张慕尧、赖传珠、刘国升等人组成的支前工作团，深入工作薄弱地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进行建党建政，发展革命武装。经过一段时期努力，支前工作团在原三边特委及其所属县委的基础上，新成立了合水、定环、庆阳、镇原、驿马关五个县委和定边、盐池、赤安、固北、定环、豫海、华池、曲子、环县、静安等县苏维埃政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驻防陇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陆续撤离。根据统战工作需要，经与驻扎在西峰镇的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协商，红军在西峰镇设立了办事处，由朱开铨任办事处主任。他除了和国民党的专员、县长、保安司令等要员接触、应酬外，尽量寻找机会到群众中去，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

1937年春节过后，应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罗梓铭的要求，省委决定派朱开铨去三边工作，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省苏维埃政府驻三边代表（保留在陕甘宁省的党政职务）。在三边，他发现部队存在烧柴困难。三边的群众和红29军日常生活用柴，全靠上山挖草根和树根，红29军挖了很多堆在山上，缺乏运输工具运不回来，地方政府又没有专门运输部门，而群众几乎每家都有骡马大车跑运输。朱开铨指示定边县委和县政府，动员群众组织运输大队，解决了红29军烧柴难问题。针对三边政府经费非常困难、很多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朱开铨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三边自古就是很有名气的盐和骡马交易市场，因规定只能用苏币（苏维埃货币），白区来的商人即使赚到苏币，也无法到白区使用，因此盐和骡马交易基本停止，三边的财政也无税可收。朱开铨向特委书记罗梓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陕甘宁根据地的边境市场，实行灵活的经济政策，恢复银元流通，各商铺将现有苏币交政府银行保管，政府银行凭信用担保，有银元时，足额还给商家银元。灵活的经济政策，激活了三边贸易市场的盐和骡马交易，也带动了其他商品流通，税务部门很快就收到了大笔银元，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不仅解决了三边党政机关和红 29 军经费开支，银行还兑现了用银元还苏币的承诺，解决了地方税收和货币流通问题，受到中央表扬。

4 月下旬，朱开铨作为陕甘宁省的代表，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和体会。

会后，朱开铨感觉胸部疼痛，经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检查，诊断为“三期肺病”。卫生部部长傅连暲知道后，立即给他拨出一间房子，让他安静休养。林伯渠主席亲自过问，关心备至。边区政府每月给他增加十几元养病费，并供应 45 斤大米。这在当时延安的条件是不容易的。3 个月后检查，他的“三期肺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①②③④⑤⑥朱春宁：《浅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与陕甘将政府的衔接问题》，登于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的《陕甘边根据地研究》263-268 页。

六

1937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主席。10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巡视团，由朱开铨任巡视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基层检查、督促边区政府政策法规的执行，了解基层情况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其间他曾受命到陇东和三边地区组建这两个专署的领导班子，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作了大量工作。

1938 年 3 月，朱开铨受张国焘打击报复，被调任边区政府民政厅二科科长。12 月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朱开铨为建设厅副厅长，主管农业。根据陕甘宁边区可耕地不多，粮食和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朱开铨向边区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延安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边区政府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任命朱开铨为延安农业学校校长。农校设在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朱开铨把建设厅内具有农林专业知识的 20 多名知识分子和一批等待分配工作的工农干部调到农校，担任老师和管理工作。朱开铨带领大家一边办学，一边开垦荒山，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培植果树，养猪喂牛，当年就见

到了成效，除自给自足以外，还有不少富余的粮食和副食。当朱开铨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表扬农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的路子走对了。

1940年2月，朱开铨被任命为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

陇东地势平坦，盛产小麦，俗称“八百里秦川，顶不上董志原的边”，是个屯粮养兵的好地方。但是，驻在这里的三八五旅却反映吃不饱饭。朱开铨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吃不饱”是因为用小米的标准供小麦造成的。当时边区政府定量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小米能吃饱，45斤小麦磨成面粉就不够吃了。经过认真核算，他建议1斗小米折1斗4升小麦发给部队，获得边区政府的批准，从而解决了红军到陕甘后困扰了几年的陇东部队吃粮难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

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庆环行署与陇东行署舍并，成立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朱开铨作为边区政府代表暂留陇东抓征粮工作。1941年2月，朱开铨完成全部征粮任务后，返回延安，于同年6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2月1日，朱开铨参加了党校的开学典礼，听取了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朱开铨在中央党校一面学习文化、理论，一面参加整风运动，先后担任十一支部、六支部的组长，通过学习，“思想上进步了，理论上提高了，自己可以做笔记了”。^①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朱开铨从党校回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45年4月至6月，朱开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候补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开铨接到边区政府的命令，重回陇东任晚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1946年2月，原专员马锡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级法院院长朱开铨被任命为专员。

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十几个旅驻扎在陇东，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947年春，朱开铨调回边区政府做战争动员工作。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我和边区政府、西北局一道撤往山西临县的

碛口。”^②毛泽东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边区政府也没有过黄河。但老弱病幼撤到山西。

1947年6月，刘邓大军过黄河，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这时，刘少奇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号召，从南方来的同志要作好思想准备，积极配合大军作战。朱开铨考虑自己对南方人熟地熟情况熟，便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提出回南方工作的要求，得到林伯渠的同意和刘少奇的批准。1947年11月，朱开铨调离了边区政府，被中组部分配到中央后方委员会土改训练班学习。训练班设在山西临县的三交镇。1948年4月，学习结束后，朱开铨迁到河北省平山县小米峪村（距西柏坡只几里路），准备南下江西。1948年12月，又迁往河北省石家庄市。

1949年2月，朱开铨南下经郑州到开封，遇到在中央苏区时就很熟悉的中原人民政府主席邓子恢。邓子恢直截了当地要朱开铨留下来帮他安置淮海战役受伤的5万伤残军人，并任命他为中原人民政府荣誉军人管理处处长。

这时，接待荣誉军人的条件很差，粮食、运输工具、住宿条件都得不到保证，有些伤残军人甚至没有床板睡觉，都在那里埋怨，工作非常难做。朱开铨一面深入到伤残军人中去做稳定思想情绪的工作，给他们讲红军长征时克服困难的故事；一面积极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要求邓子恢提供物质条件。他每天要安排500人，送他们回原籍。送走一批，又来一批，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妥善地将这5万多伤残军人安置完毕。任务完成后，朱开铨登上南下的列车，经徐州、蚌埠，向江西进发。

①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②朱开铨：《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存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

七

1949年6月，朱开铨抵江西省会南昌，回到了阔别15年的故乡。7月，

奉中共江西省委之命，赴上饶接管专员公署。一个星期完成接管后，原准备派他去景德镇工作，这时赣南已解放，中央决定他任瑞金专员公署专员。他经吉安到赣州返瑞金，首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松山村。他的家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民团 3 次抢掠，弄得一贫如洗，母亲也已离开人世。朱开铨强压着心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怒火，眼望着熟悉的山水田园，决心治理好这一方土地，把家乡建设好。由于瑞金县城较小，可供机关的用房很少，把地委和专署设在瑞金，困难很多。于是，朱开铨等向省委提出将地委和专署移到宁都。获批准后，瑞金专署改为宁都专署。1949 年 9 月，朱开铨被任命为中共赣西南区委委员、宁都地委委员、宁都专署专员兼法院院长、专署中共党组书记。

宁都地区是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面对着为祖国解放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英灵，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朱开铨一上任就办三件大快人心的事：

一是公审和枪决反动官僚、恶霸地主、土匪头子黄镇中。黄是国民党宁都专署专员，在所辖各县鱼肉百姓，作恶多端。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封他为豫章山游击司令，率匪徒 2000 余人盘踞地形险要的翠微峰负隅顽抗，被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 1 个师和 1 个重炮营强攻擒获。宁都地区法院举行公审大会那天，周围 7 个县都派代表闭赶来参加，朱开铨作为审判长，宣布将黄镇中判处死刑。

二是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当作“AB 团”“社会民主党”错杀的革命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作为烈属优待。

三是创办宁都专区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共招收 600 名烈士子弟入学，朱开铨亲自担任校长，并经常到学校作报告。

1952 年 8 月，朱开铨调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厅党组书记。在民政厅工作期间，朱开铨抓了几项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统计了全省的户口和人数，进行了人口普查，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统计了全省烈军属的户数和人

数，为更好地开展优抚工作打下了基础；三是筹建革命烈士纪念堂和民政招待所，为缅怀革命先烈提供场所，为来南昌办事的烈军属和优抚对象提供住宿条件；四是 1954 年全省大水灾，朱开铨多次深入防洪救灾第一线，部署救灾工作，妥善安排灾民生活，组织灾民重建家园，使灾民顺利地度过了难关；五是查找中央红军长征时寄养在中央苏区群众家里的孩子，帮助他们尽早回到父母的怀抱，对父母均牺牲的则按烈士后代妥善安排；六是将各地区烈士子弟学校全部并入江西工农中学，集中人力财力办好工农中学。该校共培养了近 2000 名烈士子弟，除一部分由省人事厅分配工作外，大部分考入全国各类高等学校，不少人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骨干人才。

1955 年 4 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朱开铨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党组书记，仍为江西省委委员。在这个岗位上，朱开铨工作 11 年。他按省委省政府指示，主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整顿，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学习和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建立正规化审判制度，在审判工作中，执行合议庭制度，禁止一人办案独自定性；执行回避制度，与案件当事人有亲友关系者，不准参加案件审理；执行廉明公证制度，禁止收受礼品，不准吃涉案人的酒席；对于死刑案件合议庭报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再报省政法委员会审批后才能宣判死刑；制定和实施避免误判的工作程序。经过 1955 年到 1956 年的整顿工作，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开始走向制度化轨道，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经过 10 年努力，省高级人民法院形成了廉明公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审理案件工作中，做到了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来量刑定案；制定了刑事、民事案件审理程序，显著提高了案件审结质量和速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全面走向正规化、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开铨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横遭批斗和迫害。他的家被造反派抄了 30 多次，几乎被洗劫一空。

1969年春，朱开铨被“解放”。1973年初，他被安排为江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春节前夕，他率春节拥军优属慰问团到鹰潭慰问，在招待所看到邓小平夫妇坐在接待室里。互相打过招呼之后，邓小平风趣地问：慰问团“慰不慰问我啊？”朱开铨说：“当然要慰问，还要特别的慰问呢。”他把招待所的负责人找来，妥善安排了邓小平夫妇食宿。这是朱开铨生前最后一次见到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开铨先后担任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常委、副主席，致力于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1984年，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率先申请办理离休手续。198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江西视察工作，专程前往医院看望朱开铨，并与他交谈两个多小时。198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朱开铨享受省长级待遇。朱开铨离休以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江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心改革开放事业，严肃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积极支持江西省委、省政协的工作。

1993年1月16日，朱开铨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享年92岁。

文稿汇集

要件

万急

发理治劲光

理治劲光并转省委：

甲：中央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管辖保安庆北华池各县并向西发展，省一级设吴起镇，原陕甘所管其他各县及关中韩澄两辖委统改归陕北管辖，红泉设中心县委管延长宜川红泉在县甘洛驻中央巡视员指导甘洛麇县中宜工作，虜施与延安合并虞施城南划归甘洛。

乙：陕甘宁省委以李富春为书记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朱开铨王子宜郑自兴揭俊勋诸同志及省委省苏各技术人员，均调陕甘宁少共省委、除李庆业留在甘济外余均调回中央。

丙：理治……

丁：理治梓铭子宜开铨先来中央一谈

党中央

十七日廿三时

通知

五月廿三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

以李合邦、朱敏、黄罗斌、朱开铨、郭炳坤、王月明、陈路中、白向银、高郎亭、孙作宾等十人为陇东地委委员，并以李合邦、朱敏、黄罗斌、朱开铨、郭炳坤等五人为常委。此致。

陇东地委

西北局常委办公厅

五月廿四日

中 C 西 NO395 林罗台来 F 西 NO474

附注已抄 ABCDEF 中

等级 AA 组织类 1949。10。15

江西部分主要干部配备情形

中央：

江西某些主要干部道新设备如下：……。

二赖西南行署以黄光任主任、钟民任副主任，朱开铨任瑞金专员。

三……

……

华中局

发林罗

内容：同意西南干部增补

华中局

十月十五日

电悉。同意：

（一）赣西南区党委增加钟民、刘建华为委员，刘任区党委组织部长、罗孟文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区运部长（二）……，朱开铨任瑞金专员。

（三）……。

中央

十月廿七日

朱开铨致邵主席的信

邵主席：

本月四日信奉悉：所示邵克晓邵克仁不在地方系视，亦不在宁都，不知是否很早在军队中介至赣州解放军官团受训。

此致

敬礼转邵家坂

朱开铨

十一月廿一日

邵鼻浓王先生：

请把邵克尧克仁所在地址通讯处查实再设法去找。

朱开铨致邵主席的信

——关于寻找寄养革命儿童

邵主席：

来示奉悉到宁都禾丰，会昌白俄一带寻找寄养革命儿童，我们一定尽力去找，找到之后把他接来转至省府。

此致

敬礼！

朱开铨

十一月十二日

阅

祝你成功

式平

宁都分区代表朱开铨的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宁都分区代表团，详细的听取和讨论了陈司令员及范副主席，邵主席关于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施政工作报告，事事报告及财政报告。我们谨一致表示同意与拥护，一年来全体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支前、剿匪、反霸、减租、生产建设、统一财政、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极显著而巨大的，正如邵主席在工作报告中所已指出的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和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各界人民的热烈支援与全体干部的努力，特别是毛主席并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我们更将充满着坚强的胜利信心，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针，更加紧密的团结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定将会战胜一切困难，向胜利前进。

我宁都分区过去是老苏区，曾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无数人民为了土地，为了民主自由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军参战，英勇奋斗，曾粉碎敌人多次进攻，为国家做过伟大贡献，当红军北上抗日之后，那里的人民，在国民党匪军和地主特务的联合进攻下，又曾做过不断英勇顽强的斗争，曾遭到过敌人残酷的屠杀，活埋人数不下二万之多，地主恶霸又夺去了农民分得的全部土地，烧毁了农民不少的房屋使数万人民离乡背井，使数十万亩良田荒芜，但他们却永远记着共产党毛主席，他们保存着苏区时的文件，印信，票子，公债券和抚育革命干部遗留的子女，直到现在，解放之后，全体人民真是热烈诚恳拥护和支援着人民政府解放军，因此，给了我们开展各种工作上予很大的便利。

近一年来，仅县区各级人民政府共已收缴了壹万贰千余枝反动武器，消灭土匪大小五十八股，共三千余人，并在各种工作进行中，使三十余万农民自觉自愿的参加和团结在农会的组织里，从地主富农手里减退回了壹千壹百五十余万斤租谷，同时由于各县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协助，及

全区壹百五十万人民的努力，在救灾治水调整工商业，恢复发展农工业生产，并召开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等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也是极重大的，广大人民为了未来更美满的生活已在全心全意的拥护着人民政府，在目前迫切要求分配土地和更好的民主生活，曾瞻前顾后，使我们感到喜悦和责任的重大的，同时使我们再一次更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上级党政领导的正确。是的不可否认，本分区在过去的工作中曾有过缺点或错误，也正如杨尚奎政委所指出的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我们正在贯彻整风学习，并已收到相当成效，藉以克服偏差改进工作，只有这样在不断的前进中不断的发觉和改正错误与缺点，我们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巩固已得的胜利。

最后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邵主席关于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施政工作报告。

宁都分区代表团代表朱开铨

宁都分区代表朱开铨的发言稿

主席、各位代表！

宁都分区代表团一致认为，陈政委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是完全合情合理，周密而详尽的。它适当的满足了农民要求和照顾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并完全符合于中央土地法之精神，所以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并愿予全力争取其贯彻而斗争。

根据陈政委提出的书面报告，宁都分区今冬将有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和人口进行土改。我们已在这方面做了组织农会，训练干部、土改试点等必要的准备工作。

各地经验和事实都充分证明地主阶级绝不会自动退让这一历史舞台。而且他们是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阴谋手段来阻止与破坏土改工作的进行。因此，就必须提起我们全体人民和干部的严重注意，和准备在必要时予正当方法对敢于进行破坏伟大土改运动的地主特务分子给予应有的处分和镇压。

我们全体干部除应该知道我们在为着人民事业的斗争中，已曾做过重要贡献，我们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忠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作风，已为广大人民所爱戴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牢牢记着：我们曾有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偏差和错误，这偏差和错误是可以而且是必须克服的。让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伟大土改运动中，更坚定立场，掌握政策，克服偏差，发扬优良作风，更进一步的再一次的来考验锻炼我们自己。

土改是场复杂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使全体农民阶级强同的团结起来，并使他们知道如何去同地主阶级斗争和取得胜利。这就是陈政委在报告中所已明确指出了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密切地结合着农村生产的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我们去顺利的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全体代表们！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江西省委省府的坚强领导下，为祖同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而前进吧！

胜利必属于人民，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自由与富强万岁！

梁厅长：

电示敬悉：所批示各项情形陈述如下：

一、城市借款因本分区无中等城市、均是小城市，又是中央苏区多年以来不仅农村破产连城市亦破产，同时本分区是最后解放的八个县中有五个县有相当的股厂，社会情绪尚未安定城市才开始复业，生意很小，所以由李庭序同志来南昌报告后回来再布置。

二、宁都分区谷子折米不一，过去所一百斤谷子为一石，能作米七十五斤。

这次我们规定谷子每石壹百四十八斤作米柒拾陆斤（糙米）一机米九成二机米八成半三机米八成。

宁都分区在习惯上不收什粮将来至明年春收时有麦子可研究折法。

三、秋收情况才布置下去正在调查研究中。

四、冬衣已通知各县预算准备在十一月初来财厅领取。

五、作军鞋的指示今天才收到文件，还未布置：一般说在环境稍普遍稳定可以完成且积量也不差的现在就要布置下去。以上各项因专署只有我和一个民政科长两人，现民政科长有病所以一切无头绪请你派一科长来，并将银行税局公司机构建立起来尽早恢复市面顺利流通人民币以改善人民生活。今特报告。

此致

敬礼

朱开铨

十月十五日

方主席：

老根据地重点乡确定是正确的，但因乡数太少有的还不合理，各地地区群众不断来信要求增量调整因此我们准备适当增加一些乡数，有的专区县与县之间可以进行调整兹将我们的具体意见提供如下：

一、南昌专区原分配四十八个重点乡，其中靖安县八个，萍乡没有，据从靖安县调整三个给萍乡，南昌专区总数不变。

二、抚州专区原分配五十个重点乡，其中黎川十六个，太多拟抽出八个，乐安十七个，拟抽出八个，广昌二个拟增加六个共八个，宜黄原来没有拟分配六个，崇仁原来没有，拟分配四个，以上共增加十六个，本专区正好调剂，原五十个乡不变。

三、九江专区原分配 35 个，不变

四、赣州专区原分配 137 个重点乡，其中安远县三个后另行增加三个，共六个。石城县二个，后另行增加三个，共五个。会昌县三个后拟行增加五个共八个。其余按原分配数不动，赣州专区实增加十一个重点乡。

五、上饶专区原分配九十个重点乡，其中贵溪县十个，拟增加五个共十五个，其余不变，上饶专区增加五个重点乡。

六、吉安专区原分配五十九个重点乡，其中遂川县四个，后增加二个，共六个。吉安县六个，后增加四个共十个，万安县一个，拟增加四个共五个，永丰县二个拟增加三个共五个，其县不动，吉安专区实增加十三个重点乡，以上共增加重点乡二十九个，连前四一九个，共四四八个重点乡。

上述意见是否有当请予批示：以便遵照执行。

呈

邵主席

方主席

朱开铨

三月七日

邵主席：

奉你指示，要将老关系人员训练后工作写一报告，送谢部长，根据我们所了解材料整理出来了，当否，请审批为盼。

致以

敬礼。

开铨

五月廿二日

送还朱厅长，即由民政厅向谢老报告，并代吾向谢老问候。我不会回信了。

阅

式平

五月廿三日

交工西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厅长发言记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江西的老根据地是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领导下，从原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开始创造起来的，到了一九三〇年就形成了大块的根据地。由于有大革命时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南昌八一起义的革命影响以及长期残酷斗争的经验，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很高，阶级觉悟也很高，大批的群众参加了红军，老根据地的人民与革命事业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在同优势的阶级敌人长期反复斗争中，老根据地人民贡献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过光荣伟大的功绩，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在长期斗争中，江西老根据地人民所受的摧残也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采取了最毒辣、最残酷的手段，对老根据地进行了毁灭性破坏，奸淫掳夺，烧东抢劫，无所不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杀，见屋烧，石头也要过过刀。在搜长的十五年中，江西老根据地人民遭受了极端残酷的蹂躏，广大农村破屋、田地荒芜，人民颠沛流离，陷于贫困死亡的绝境。根据现有材料统计，江西在一九二七年是二四〇〇万，现在只有一七〇〇万人，少了捌百万，有的县剩下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口，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欠江西老根据地人民的一笔血债，原中央苏区其中八个县经初步的典型调查即有两万余人被国民党残杀，瑞金的大柏、武阳区一次被活埋的六百余人，兴国梅窑区被杀的五百余人；弋阳七区一次被毒杀三百余人，虽然全省尚无确实统计数字，最低估计被敌人残杀的有五十万人以上，在监狱中，集中营、劳役队被打死，饿死的还不在于其内，房子被烧的也无法统计，仅在过去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山区，百分之五十的民房被烧掉，赣南之油山共有一千五百余户，即有一千二百余户房子被烧掉，许多地方造成无人区，弋阳全县大部农村被抢光、烧光，人民财力的损失更无法估计。在国民党的十五年反动统治下，老根据地人民，特别是烈军属在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所受的严重摧残，非言语所可以形容，正如

所谓“老弱死于沟渠，壮者逃散于四方”。这种严重摧残的结果，便使江西老根据地的极端贫穷，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陷于十分低下的境地。

但是江西老根据人民并没有对敌人屈服，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毛主席和红军，他们采取了许多积极的办法与敌人斗争，支援着在敌后活动的游击队，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存了大批的苏票，公债票，管票，党证，残废证，家属证收各种文件，布告，书籍等等。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无限热爱，也表现了他们对敌人的极端痛恨，他们保持与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锻炼出了高度的组织性，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些都是江西老根据地的特点。

由于江西老根据曾以极大的人力支持了革命战争，因此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占了总人口的一个很大比例。拟现有统计，全省共有烈军属四十三万余户，一百六十余万人，以瑞金县例：全县人口廿二万六千余人，烈军属即有二万七千余户，八万五千余人，超过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全省在乡革命残废军人一万三千余人。连烈军属在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烈军属共有土地四百二十八万余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百分之十一。这些数字说明了我们优抚工作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我省人民的无上光荣。

解放以后，中央、中南和省的党政领导对本省老根据地都十分关怀和重视，从政治上、经济上多方面的加强对老根据地人民进行扶助，自解放起省里不薪地组织了各种座谈，访问，召开烈军属代表会，组织学习，培养干部开办烈士子弟学校，宣传老根据地对革命的贡献等，特别是一九五一年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在谢部长率领下，在我省深入各个老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又邀请老根据地人民代表进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给予老根据地人民精神上极大的鼓舞；去年我们又举办了老革命关系人员训练班，学员共一千余人，培养老根据地建设干部和密切与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上，都有很大作用；另外，我们对老根据地人民，从解放起，就发放了很多抚恤救济并且在扶助生产、组织代耕，兑换苏票等工作上，也获得了很多成绩。我们把恢复老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当作是恢复老根据地的基

本环节，我们认为：只有生产彻底恢复了，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和可靠的保障，因此我们多次的发放了生产补助金，帮助购买农具、耕牛、肥料，等等，在这些补绅款中，我们还规定抽出一定比例的数额，修补一些房屋，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另外又修了许多大小水利，如瑞金的东华坡，就是千年来未曾修好的水利，解放后，才修成功了，对群众生产情绪鼓舞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好。

.....

最后，谈谈对这次会议的感想，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有很大成绩，对我教育很大。我完全同意中南民政……。

谢部长，五月八日拟邵主席的信“关于老根据地老关系训练”问题，主席指示我们办了，望将材料送上请并代为向谢老问候。

致以
敬礼。

附报告材料

同意并送上附件四

朱开铨
五·二六

据弋阳县报来请增加重点村八个，即：

1、烈桥乡二个——涂家村、宣家村。2、直源乡一个——谢玩村。3、火桥乡一个——樟树墩村。4、大港乡一个——石垅村。5、东港乡一个——韩家村。6、洪家乡二个——内洪村，外洪村。这些村和过去我们同意，将坂乡的团林村划为重点村情况相似。根据弋阳县重点乡情况来看，如果要他们自己调整是较为困难的，因此，我们同意他们增加八个重点村，可否请批示。（附弋阳县报告一件）。

此上

邵主席

朱开铨

五·十六

郑部长：

十月廿日来电敬悉，兹将所询各点报告如后：

一、中南民政会议以后，黄厅长回厅即在本厅工务会议上进行了传达，民政科并在科务会上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此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县长联席会议和省府行政会上，黄厅长都作了传达。十月十八日省政府召开第十一次省府专员会以后我亦作了传达，以上是我们贯彻会议的简单情况。并将各专员留下作了具体讨论。

二、关于我们职权问题：省府已决定在今年年底全省人代会应一律代行大会职权，我们的具体计划是首先在各专区中选择四十四县于九、十月间召开会议，以讨论查田生产布置秋征为中心，并代行大会职权，截至目前为止，决定在十月前代行的已在四十五县，已确定会期的有萍乡、进贤、丰城、靖安、上高、南昌、宜春、新建、临川、资溪、黎川、宜黄、广昌、南城、吉水、吉安、永新、莲花、宁同、德安、广丰、浮梁、鄱阳、上饶、乐平、九江、修水、龙南、赣县、云都、宁都、崇仁、弋阳、铅山、贵溪、婺源、南康、天国、瑞金、遂川等四十二县。其余尚未代行的县、市在年底的一次会上全部代行完毕。

三、本厅已派出六个工作组（共十三人）分赴各专区配合专署赴各县区配合专员赴各县协办工作，此外省协商委员会、省参事室、省人事厅亦派人同往。确定每专区选一县为重点，赣州专区为赣县（组长为本厅厅长室焦国海同志，十月十三日出发），上饶专区为广丰（组长为本厅民政科付科长刘坤同志，十月廿三日出发），南昌专区为萍乡县（组长为省协商委员会秘书长邓鹤鸣同志，十月五日出发），抚州专区为临川县（组长为本厅民政科梁扬同志，九月廿八日出发），九江专区为九江县（组长为本厅优抚科副科长曲中顺同志，十月廿三日出发），吉安专区为吉安县（组长为本厅社会科副科长孙盛海同志，十月廿五日出发）。以上各组除了参加重点县的会议外，其他各县的会议，只要时间上、力量上允许，均拟普遍参加。

重点街已选定南昌市三区广外街，拟搞居民委员会，现正在准备中。

乡的建政，目前各县区正拟结合秋征后的土改复查进行，重点乡尚未确定，因本厅主要力量集中搞县，乡的建政，准备十月底搞乡的工作。

以上做法，是否有当，请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朱开铨

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

朱开铨厅长关于江西省四年多来民政工作

的总结及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经第五次全省民政会议讨论通过，并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省府第一九八次行政会议批准

一、对四年多来民政工作的估计和检讨

四年多来，全省民政工作，在中央、中南、省委、省府和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与全体干部的努力，无论在政权建设，拥军优抚，扶助老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安置复员转业军人，教养贫苦无依的残老孤幼，改造游民乞丐，战勤和民工建勤动员以及地政、户政、禁毒、贯彻婚姻法、平反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起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偏差和缺点，必须认真地加以检查和纠正，现将四年多来几项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 在政权建设工作上，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各项社会改革的完成，我省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已逐渐建立和健全起来，全省六市、八十二县、一个特别区和九千七百六十八个乡、镇已普遍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除九个县外其余均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一般并已形成了经常制度，一九五三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又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普选工作，至去年十一月止，全省已有四千零十八个基层单位召开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

全省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一般均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广泛的发扬民主，认真的审查政府工作和各种重要措施，并能集中广大人民的意志和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作出正确的决议。提高了广大人民管理国家政权的

积极性，提高了广大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保证了党和政府各种政策法规的贯彻，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的胜利完成，从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也就越加健全和巩固了。

四年多来政权建设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由于我们对民主乃是力量的源泉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基本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的旧民主观点与形式主义的影响，有的地方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与中心工作对立看待，有的地方将人民代表会议与一般干部会议同样看待或合并召开，有的地方在与中心工作对立看待，有的地方将人民代表会议与一般干部会议同样看待或合并召开，有的地方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未能充分的组织代表讲座，对代表提出的意见与提案，未能很好的加以处理与交待。其次，对城市工矿区的政权建设，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检查，对工矿区政权的工作方针、任务、职权范围、组织形式等，尚无成熟的经验，对各矿区政府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亦未能及时解决。最后，对于乡政权建设的具体指导也做得不够，有些乡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权力机关”，乡干部还不善于运用各种政权组织去进行工作，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各种工作委员会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在优抚工作上，我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地区，由于长期战争的结果，全省共有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一、四四七、二六二人，约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四年多来在发动群众性的拥军优属工作中，帮助和组织了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生产建家，对于一些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则发动了群众进行代耕（一九五〇年享受代耕的占烈军属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廿六，一九五三年为百分之廿五强），代耕的方法在不断的整顿下逐渐由轮流派工进到大、小包耕与工票制，并进而发展为较完善的互助组代耕。此外四年多来并发放了大批实物补助，用在优抚事业的经费，共达一千五百七十一亿元，享受实物补

助的烈军属每年平均达卅余万人，对于烈士、军人子女入学问题，除教育部门有所优待外，还专门办了五所烈士子弟补习学校（现合并为三所）和一所工农中学（烈军属子女），在这些学校中受过教育的，前后已达三千余人。一九五三年又拨发了四十六亿专款用以补助全省有困难的烈士、军人子女就地入学。对革命残废军人一般均给予了抚恤和救济，并办理了两所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现有八四二名荣军在校学习，对五万三千余复员转业军人进行了适当的安置，使他们参加了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

对于占我省二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地区的老革命根据地，四年多来，进行了访问、抚恤救济、扶助生产、各种贷款的优先照顾，兑换苏票，开办烈士子弟补习学校，召开烈士、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开办老革命人员训练班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中央访问团到本省各老根据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访问，并邀请了老根据地人民代表进京参观国庆节观礼，更大大的鼓舞了老根据地人民，大大密切了党和政府与老根据地人民的关系，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地位，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根据中央、省委、省府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采取“重点扶植”的方针，以四一九个多为重点，在文教、卫生、银行、交通、农业、水利、粮食、合作等部门大力配合下，进行了与办小学、建立医疗所、发展交通、拨款救济、扶助生产、收购土产一系列的工作。四年多来发放老根据地人民生活补助金，即达三百〇六亿元之多，使老根据地的生产得到逐渐恢复，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从而大大鼓舞了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说：“毛主席人在北京，心还挂念着我们”，我们决心响应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来感谢毛主席的关怀。如永新军属特等模范李页里带头组织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购粮中带头将全社二万五千斤余粮卖给了国家。瑞金烈属刘来娣不仅是老根据地烈属中的一面旗帜，而且是积极发展生产的一面旗帜。

四年多来优抚工作的主要缺点是：由于对优抚工作是一项重大的长期

的政治任务认识不足，对于做好老根据地工作和优抚工作与巩固人民军队、增强国防力量、保障生产建设的重大意义体会不够，有些地方，至今对老根据地还缺乏长期建设观点，甚至有些干部不联系过去历史、割断历史看问题，不重视老根据地老干部在群众中的作用，对那些没有做坏事、品质好的可用老干部，不仅重视不够，引用不多，尊重不足，团结不够，而且有的开始用了一下，以后便一脚把他们踢开。这样便削弱了党、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引起部分老根据地老干部与群众不满。有些地方对平反工作还没有很好贯彻。对革命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也还关心不够，他们存在与要求的问题缺乏及时认真负责解决的精神，致使部分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与复员转业军人的困难本来可以解决的而未获得安置和解决，特别是有些地区还存在着“优近不优远”“优生不优死”和需要代耕未代耕，不需要代耕而代耕的偏差，如一九五三年万载县漕源乡，全乡有七十九户烈军属，其中有六十九户是烈属，只有三户烈属享受了代耕，而有的军属可以不代耕却也代耕了。在代耕负担上有些地方也还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现象。我们对于如何贯彻调整代耕负担，做到人民合理负担的政策，缺乏系统研究和及时深入检查，对于贫苦的孤寡烈军属合户工作，虽然及时纠正了，但这种脱离实际的决定是错误的。对于优抚经费的使用，有些地方在发放时一再拖延，层层积压，本来应该而且可能解决的问题，未能予以及时解决，致使应该用的优抚费，未能及时用下去，对于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与教育还缺乏经常认真检查和耐心的教育。现在全省尚有约一千五百余复员转业军人未行安置妥当，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及疾病等问题应适当解决而未予以及时解决，有的甚至推来推去，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和部分群众对我们不满。

（3）在救灾与城市社会救济工作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农村经济破产，水利失修，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的情况，因而，在解放后救济工作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四年来各级民政部门在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共发放了一、一五〇余亿元的救济粮款，并根据中央指

示的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组织了群众生产自救，战胜了灾荒（如余干县一九五二年连续遭受了水、旱、风、虫等灾，全县受灾人口有七二四〇六人，由于该县领导上对防灾备荒生产救灾工作重视，进行了充分的防灾、救灾的准备，采取了扩大冬种面积、播种早熟作物，发展各种副业生产，组织信用合作社和提倡自由借贷等办法，基本上克服了灾荒的困难）。有的地方并结合生产救灾工作进行“组织起来”的教育，发展互助组，发挥了组织起来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南昌县在一九五一年抗旱中，曾组织了二千六百四十七个抗旱组，参加群众达七万人，组织了水车二七、六〇〇部，因而抢救了四十九万余亩田，该县小蓝村，因组织了六个车水大队，不断地取水灌溉，不仅免于旱灾，而且保证了增产任务的完成）。

在城市救济工作方面：我们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江西省分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先后接收和整顿了为救济机关和帝国主义津贴的所谓“慈善”机关八十六个，并根据“分散安置、面向农村”的方针，先后安置游民，妓女和教养贫苦无依的老幼孤残共一一、七〇九人。目前全省尚有救济机关三十七个，现有收容人员二、六一七人。此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全省共选送了战俘一〇三、七六四人。在同时期内安置省内外灾难。民二一一、八二九人。对于城市弃婴现象采取了“本母自养，政府补助”的办法，基本上作到了消灭弃婴现象。如南昌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平均每月收容弃婴一三〇名，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只收容了一名。对于一般城市贫民的救济，除可能动员回乡生产的动员回乡外，并推广了上饶市有劳动力的城市贫民组织“居民劳动服务队”的经验，在不与工人利益抵触原则下从事城市建设工作。对于遭受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必须予以临时救济者，一般均给予了临时救济，对于城市中的游民、妓女、乞丐、小偷等也在收容后给予劳动改造。这些工作，在配合城市的社会改革运动，恢复与发展生产以及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年来，在救济工作中的缺点是：缺乏具体指导和检查与及时总结经验，有些地区对于“生产自救”的方针贯彻不够在发放救济粮款时，只管发放，不问生产，单纯救济脱离政治教育，甚至有的地方将救济粮款平均发放，这样就使“发放救济的过程，就是组织生产的过程”这一口号在某些地区没有很好贯彻，造成部分受灾群众依赖救济的心理和闲难得不到及时解决。也有些地方，对救灾和救济工作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关心人民疾苦，竟有个别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后，领导上不加重视，灾民连种子都没有，生产工具损失大半，生活极端困难，可是却仍与非灾区一样布置查田定产。民兵冬训、民工建勤等，使群众无暇生产。还有一些地方，过分夸大灾情，不深入调查研究，甚至过去个别地方将救济粮款挪用于其他事业方面，这些现象，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克服和防止的。

（4）在地政工作上，四年多来主要是配合土改委员会、发证委员进行颁发土地证。截至目前止，全省已完成发证的乡计九、〇五二乡，占应发证总乡数百分之九〇、一九。填写土地证登记册及申报表达二千万份以上，经过发证，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经过发证，一般地消灭了黑田，在发证中并会同有关部门解决了不少土地纠纷和地改遗留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农民内部团结：如广丰县在发证中就解决了典当纠纷三八七件，财产继承纠纷七〇六件，租件纠纷四一三件，界址纠纷一、〇二五件，山林水利纠纷九四〇件，同时将遗留下来的水塘三、九六〇口，山林九、五五〇亩，房屋二、九九七间，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配合了各市地区部门办理了征用土地的工作，南昌等市区内工矿、铁路、交通、国防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事业九十二个单位，征用土地面积共七千三百六十八亩。赣州市工矿、机关、企业及文化事业等十六个单位征用土地面积共四百六十八亩。基本上保证国家各项建设的需要，同时也适当的照顾了当地人民及土地实际工作中创造一些关于地政工作的经济和办法。对土地改革中遗

留 65 有关土地方面的问题，缺乏予以系统的研究，和主动去解决问题以致地政工作至今尚未很好放开，目前存在的山林、河港、草洲、水利等纠纷还不少，尚有待于我们积极主动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5）在贯彻婚姻法上，自婚姻法颁布以后，各级民政部门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地进行了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一九五三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从干部到群众，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学习与宣传，批判了婚姻问题上的旧思想、旧制度、旧习惯，从而树立了新思想、新制度和新风气的阵地，有力的支持了人民群众争取婚姻自由的正义斗争，因而使社会风气有了很大转变。现在各地民政部门已将贯彻婚姻法工作列为经常工作之一，遵照政务院指示建立了婚姻登记处的计有十八县，没有建立专门机关的县区，一般都有专人负责。但是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工作，过去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极不平衡的，婚姻法宣传月运动过了之后，各地一般都很少结合其他工作进行宣传，因此，少数地方至今因婚姻问题而死亡的现象仍未完全停止。今后继续普遍经常而深入的贯彻婚姻法的宣传，仍然成为我们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以上就是我省民政部门的几项主要工作成绩和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和缺点。这些偏差和缺点有的是属于我们领导上对政策研究贯彻不够和某些政策思想不明确所产生的，有的是各级民政部门等政策具体研究执行不当所产生的。我们四年来，对各地贯彻情况缺乏有系统的深入调查研究，工作的计划性较差，有了计划又贯彻不够，缺乏及时认真的检查与有系统的总结和交流经验。对上级及党重要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我们也缺乏认真的研究，特别是对上级的请示报告制度，也做得不够。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在工作中尚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倾向。这焉值得我们注意和克服的。

二、当前民政工作的任务与我省建政工作中几个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已从恢复时期进入到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毛主

席指示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同样也是照耀我们民政工作的灯塔，我们必须以它为出发点，以它为指针，来部署自己的工作，使民政工作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一步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为保证和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的决议，就是总路线在当前民政工作上的具体化，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贯彻，根据这一决议和省委、省府指示精神与本省当前具体情况，今后民政部门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在政权建设方面：必须认识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今天对政权建设工作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官僚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使国家政权更好的领导和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

（1）在各级党、政和各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争取于本年三月底以前完成全省基层普选工作，并遵照中央规定充分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召开市、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普选运动中，充分发扬民主，展开政府工作人员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监督和批评，充分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达到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自觉地热烈地参加选举，划清选民资格界限，分清敌我界限，保证好人当选；保证人口调查统计及时，正确统计清楚和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四个基本要求，并有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城市、集镇、工矿区政权建设工作为生产服务的经验，加强县的民政工作，健全基层政权，使之适合于领导与保障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少

数民族地区，应协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提高自治乡的政权建设工作，促进其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便于工人阶级对国家实现其领导，便于最大多数人民集中和实现其意志和能够充分发动广大人民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的最好组织形式，也是党和国家代表人民和依靠人民逐步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任务，引导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幸福之路的最有力武器，必须使之健全和巩固起来，并经常以这种观点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为了领导和保障国家各种建设工作的顺利，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族人民发挥其政治积极性与生产积极性，提高人民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加强对农业和手工业者的教育，巩固工农联盟，以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与改造，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以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教育人民警惕和揭发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行为，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不仅是整个党和国家的任务，也是今后民政部门工作的指针和出发点。

(1) 在党、政领导下，督促检查下级人民政府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检查下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按照中央规定及工作需要及时召开，人民政府的重大工作是否交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政府委员会会议制度是否健全，总结推出好的经验，批评纠正错误倾向。

(2) 研究改进行政区划及地方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的领导方法，和组织形式，使之符合于当地经济、政治等条件及民族情况，便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事务和自己的事务。

(3) 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收集人民群众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施行及对政府工作特别是对基层政权工作人员作风的意见及时反映给党、政领导机关，并提供改进的意见。

(4) 在党、政领导下，担负一些有关同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及其他具体工作。

(5) 与各级有关部门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密切配合，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除了贯彻这一指示外，根据目前我省建政工作的具体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1) 乡级政权的组织和制度，必须结合普选工作，切实加以整顿和改进。把过去农会代替政权的形式迅速转变过来，纠正某些干部认为乡村政权就是农民政权的错误观点，使他们认识乡村政权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乡村政权尚面对着个体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是不可能的。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乡村政权的建设工作，各级民政部门应把这一工作切实做好，乡政府主席委员，必须是具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干部，才能领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

(2) 乡人民政府各委员会的组织，在反“五多”时有的已经取消，有的已经合并，为了适应目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需要和便于广大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人民自己的事务，在乡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下，一般应按生产建设、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查等方面分设工作委员会，各委员会应在一人一职原则下吸收乡人民代表、积极分子及有专长的人参加工作，各委员会工作任务范围、职责等，应立即由省统一规定。

(3) 乡村半脱产干部的经费，中央过去规定每乡三个半人，今年规定三人，但各地使用多不一致，有的三人用，有的五、六人或七、八人用不等，影响乡干部工作与生活。应立即作适当的统一规定。

(4) 本省矿藏丰富，现有萍乡煤矿乐平锰矿西华山、大吉山钨矿[△]等。这些较大规模的工矿区的政权虽已建立，但如何为工矿企业服务，各地认识还不一致和不够明确，工作上还不能密切的配合，有时还有各自为政或不协调的现象发生，必须立即摸清情况，进行研究并先选择一、二个区进行试点，创造经验，然后逐渐推广。

(5) 我省山林地区较多，而这些山区又与闽、浙、皖湘、鄂等省交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匪特和漏网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可能利用为隐藏之所。加之目前区乡级机关，均在平原地区，工作人员很少上山，有的地方，几年来群众尚未见到工作人员的面，因此这些地区工作表现十分薄弱。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产的安全，为了彻底肃清残存的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平原地带的区、乡划大些，山陵地带的区、乡划小些，适当的把现有的区、乡行政区划加以调整。山区地带的区、乡政府（特别是区政府）应搬在山上较为中心的地方去，以加强山林地区的工作。

(6) 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除了加强南昌、赣州、九江、吉安、景德镇、上饶等市的政权建设外，对于各县城之城关区（镇）及全省较大之集镇（如抚州、樟树、河口、鄱阳、鹰潭、唐江、邓家埠、吴城）的政权建设亦必须加强。过去所划之镇级政权太广，而且层次太多，必须重新加以调整。各市镇应以中央即将颁布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通则”与“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通则”完成建立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办事处的的工作，已经建立者，应加以整顿。除南昌市可设市、区两级及街道办事处外，其余五市皆设市、区两级或在市以下只设街道办事处。

全省镇级政权依据人口多寡分为三种：第一种，相等于县的镇（如抚州）；第二种，相等于区的镇（如樟树、河口）；第三种，相等于乡级的镇。其在一万三千人口以下的镇不设街道办事处，一万三千人口以上者可酌设街道办事处。但无论何种镇，镇级政权均为基层政权，过去有些地方以居民委员会为基层政权者，必须予以改变。

(7) 全省水上船民约十余万人，虽然经过水上民主改革，但反革命分子仍可能隐藏在水上进行活动。因此，除加强水上公安机关及水上派出所工作外，并须根据河港系统，有重点的在要口上设立九个水上区人民政府。

(8) 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工作，铅山、贵溪两县畲族的集居地区，应进一步提高自治乡的政权组织与制度，并切实促进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散居在全省各地少数民族，应贯彻党和人民政府民族政策，并尊重其风俗习惯，我省因无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此项工作，建议由省府办公厅负责管理。

(二) 在优抚工作方面：这一工作是一项光荣的长期政治任务，特别对于鼓舞人民武装部队士气，增强国防力量，保障祖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民政部门必须在各级党、政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切实做好这个工作，认真解决贫苦烈、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生产与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发动和组织他们积极从事生产，参加各项建设事业与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帮助他们搞好生产，逐步建立家务，达到生产自给，并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作好上项工作，必须：

(1) 把发动与组织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积极从事生产，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动员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作为今后优抚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方向。在农村，一方面应注意对他们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鼓励他们积极从事生产，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一方面又应教育农民和互助合作组员尊重他们，欢迎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对于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的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应鼓励和培养他们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民兵组织、基层政权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中的骨干。在城市，凡是有就业条件的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应商同人事、劳动部门尽速为他们介绍就业，或因地制宜帮助组织有销路的小型生产，以达到劳动自给的目的。纠正单纯救济和单靠介绍工作来解决问题观点和做

法。

(2) 继续整顿代耕工作，确实保证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贫苦烈、军属的土地得到代耕、对于服勤面不合理的现象必须予以解决和纠正，在互助合作运动没有基础的地区，应努力推行固定代耕方法；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基础的地区，亦应说服互助合作组员，根据互助合作组大小和应负担代耕多寡，保证产量一样高，分配给互助合作组织代耕或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使代耕工作与互助合作组织相结合。在老根据地，今年可先将烈、军属最多，代耕负担最重的（如兴国、瑞金、宁都、永新、弋阳、会昌、雩都、修水、铜鼓、萍乡等）县，有重点的以乡为单位，调整代耕负担，在保证烈、军属缺乏劳动力或无劳动力必须受到代耕的原则下，暂定每个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年负担七个工的标准，超过七个工者，由政府附加粮及中央之补助款予以补助，上述各县应迅速作出计划报省，进行重点试点，秋季进行检查一次，然后逐渐推广，其余烈、军属较少的县，仍照固定代耕办法进行。

(3) 对贫闲而无劳动力的烈、军属，除进行代耕外（特别是烈军属），应遵照优抚条例和中央、中南、省委、省府指示精神，实行对烈军属以定额、定期的实物补助办法，一般在一年之内评定两次，保证分期发放。对烈士、军人子女入学补助，一般只规定小学，并与实物补助同时评定，分期发给，但在原则上以真正贫苦烈士遗孤和无依无靠的贫苦军人子女为主，特别照顾文化落后的山陵地区。个别已入中学者，除有优先权享有人民助学金外，尚有特殊困难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评定，按学期予以补助，过去所办之烈属实习学校及工农中学，原则上今后不再招生，一般达到中学程度，即行结束，转为一般学校。

(4) 为了加强各县优抚工作，根据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规定精神，先在兴国、瑞金、宁都、永新、弋阳、会昌、雩都、修水、铜鼓、萍乡等县增设优抚科。

(5) 过去对老根据地工作方针，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并且获得了很大

成绩，根据目前情况除继续加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育外，今后对扶植工作上，应对“全面照顾，重点扶植”（即重点村或重点户）为方针，各县应根据对革命贡献最大，受反动派摧残最严重，解放后经济恢复最慢三个标准，认真研究，选择重点，做出具体计划报省审查。并根据困难多的多补助，困难少的少补助，已达上一般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的，则不再补助的原则，分别予以扶植，切实解决老根据地群众自前生产与生活中的困难。在补助中，主要应放在解决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上，以便使之建立生产基础，进行长期建设。同时建议银行、贸易、卫生、文教、交通、合作等部门，亦本上述方针，做出具体计划，配合这一工作。对于老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代的不少老干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应有足够的认识，这是增强党、人民政府与老根据地群众的重要环节各乡各项工作及领导工作，并应根据中央今年转发邓子恢同志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的报告和所指示的四点予以切实执行。

（6）加强对荣誉军人的政治教育工作，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培养模范人物，积极组织和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建设，遵守政府法令，密切联系群众，参加各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同时认真负责解决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尊重，对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应贯彻提高文化，培养就业条件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方针。对少数尚未得到安置或还没有安置妥当的复员转业军人，应继续贯彻“就地安置”的原则，设法予以安置，生活上的困难，对少数不适宜农业生产而具有其他工作条件者，应商同人事、劳动部门尽可能予以优先就业的便利。同时必须加强对复员转业军人的法纪教育，对个别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分子，应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予以适当的处理。

（三）在农村救灾工作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备的防灾设施，自然灾害的袭击在相当时期内尚难避免，而农民个体经济的抗灾能力又极薄弱，农村鳏寡孤独和失去劳动力的农户也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对于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农民遭过灾害，更应设法救济。因此，必须以最大

劳力做好农村救灾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以保证和恢复生产力，战胜自然灾害的威胁，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各级民政部门必须：

（1）及时掌握灾情，确立经常的灾情统计，认真执行报灾制度，以提高救灾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

（2）在农村救灾工作上，应继续贯彻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充分积极发动受灾群众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战胜自然灾害。政府的救济粮款，必须重点使用，并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保证及时发放，既要防止脱离生产的消极救济，养成群众单纯依靠救济的心理；又要防止把救济工作脱离了政治教育的偏向，切实纠正发放救济粮款不结合组织灾民生产及把一切生活困难户都由政府包下来救济的错误思想。今后发放救济时，必须划清使用范围、对象、标准和时间，不合乎救济条件的，一律不救济；不属于救济粮款开支范围的，一律不能从救济粮款内开支。在发放上一定要实事求是，既要防止平均发放，又要防止过分集中的偏向。

（3）对全省去年受灾地区和常年贫困地区要结合当前统销工作摸清情况，并配合各有关部门，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积极作好春耕准备，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预防春荒和夏荒。

（4）大力协助各个生产建设部门，开展群众性的防灾工作（如防洪、防旱、防虫、兴办水利等）。在不影响乡农业生产原则下，应组织有劳动力的灾民参加，但工资不得过低，更不应动员灾民的义务工。对于老根据地、贫瘠山区的恢复建设工作，应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予以扶助和救济。

（5）在解放后，有的地方还办了积谷和义仓以备灾荒的，在春耕生产前，应进行清理和整顿。各地的积谷和义仓，有条件的地方，应逐步使之转为信用合作组织，以后不再提倡办义仓。

（6）各级民政部门应认真检查农村救灾政策的执行情况深入下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和交流经验。

（四）在城市救济工作方面：

（1）对目前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和贫民以及游民等，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协同救济分会，按其有无劳动力积极与稳步的分别予以教养、救济或劳动改造，严防一下包下来错误观点，原则上对于有劳动力而无固定收入不能维持生产的贫苦市民，应主动与劳动、建设等部门取得密切联系，积极组织他们从事各项基本建设与市政建设以及各种互助合作的手工业生产。对丧失劳动力而又贫苦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应采取亲邻相帮和政府扶助的办法，辅之以适当救济或定期定量的实物补助。个别残老孤幼虽发给了救济，仍不能生活者，应给以收容。对一般贫困市民因遭受临时灾害或发生疾病、死亡、生育等而不能生活，除亲邻相帮仍无法解决者，应给予临时救济，扶助他们从事临时或季节性生产，劳动部门转移来的丧失劳动力的失业人员，也应按以上情况分别处理。

（2）一般贫苦市民急性传染病或临时紧急外伤需要急救者，应由卫生部处理。患一般疾病者，应自行就医。患长期慢性疾病者，应说服其本人在家休养。个别生活十分苦难者，可酌情予以救济，足以致命的急性病（如急性肠胃炎、逆产），本人确无力医疗者，可酌情补助其就医治疗。

（3）各城市现有生产教养院，应在今年上半年继续积极进行审查、清理和整顿，改进管理方法，加强干部思想领导，严禁打骂、虐待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对已收容之残老及儿童，应依照其各种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予参加半工半读，或施以文化教育与可能的技术教育。

（五）在贯彻婚姻法工作方面：贯彻婚姻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社会改革过程和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必须把这一工作列为经常工作之一。民政部门在贯彻婚姻法工作中的主要业务是切实做好婚姻登记工作。根据政务院“关于普遍建立婚姻登记机构的指示”，各地应继续建立与健全区婚姻登记处，指定专人负责，划清业务范围。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办理婚姻事务的任务是：（1）掌握婚姻政策的正确贯彻；（2）指导婚姻登记工作；（3）调查并研究婚姻法的贯彻工作；（4）受理人民有关婚姻问题的询问事

项。区婚姻登记处的任务是：（1）办理结婚、离婚及恢复婚姻登记；（2）以批评教育的方针调解违犯婚姻法一般规定的案件民事纠纷；（3）协同司法部门和民主妇女联合会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并经常检查和研究婚姻法的执行情况。

（六）在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方面：目前在普选工作中，民政部门应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在农村由乡人民政府负责，每年结合农业税征收工作，对人口出生、死亡、迁人、迁出统计一次，由县综合向省报告一次，城镇、工矿、水上区由公安部门负责，当地民政部门根据公安部门材料每年作一次全年人口统计数字上报。随着普选工作结束，使全省人口数目能及时作出比较精确的统计，作为今后各项建设工作的重要依据。

（七）在地政工作方面：

（1）加强地政工作，健全地政部门的组织，目前首先以研究处理关于国家征用土地问题为重点，根据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各种实际材料，提出本省的具体实施办法，以保证国家土地政策能适应城市建产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以及将来农业集体化的需要。对土地被征用后，有关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必须妥善的安置和解决，克服目前建设用地中某些混乱现象。

（2）迅速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土地改革遗留的有关土地问题。特别是其中有关山林、水利、草洲问题，应依据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九五三年八月发布的“关于认真解决山林问题的指示”精神和各地具体情况，分别妥为处理。

（3）农村颁发土地证后，应认真保管地证存册，办理土地统计，并认真处理土地转移登记等问题。

（4）完成全省颁发土地证工作：本省尚未颁发土地证的地区，争取今年夏季前结束，已经结束发证地区，如存在有填写错误以及重复或遗漏等偏差者，应结合中心工作进行一次查对。有的县（市）土地房屋登记册尚

未编造完竣，亦应抓紧时间赶办完成。

（八）在民工动员工作方面：为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级民政部门应负责协同有关部门进行关于国防建设与重大经济建设中动员与征雇农村民工的动员工作。民工的组织领导由使用部门负责，民政部门应注意与有关部门协同处理平衡劳力负担、民工待遇以及民工安全、卫生等问题。过去群众对国家的负担，由于紧张的战争和斗争的环境，在群众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虽然有某些不合理现象，还是履行了对国家的义务，但今后人民的负担应该完全按照法令的规定，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不得在国家法令的规定以外，征用人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提高我们的学习

我们知道“国家机器是阶级专政的武器，它不能像工业机械那样，从敌人手中拿过来，就可以现成的使用，而必须彻底打碎旧的，从新全部建设新的”。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任务，并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现在正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时期”（列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虽然不是经过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我们就不可能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保证我国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

根据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决议，今后民政部门的任务，将日益繁重。民政部门的业务范围又广，不仅包括建政、优抚、救灾等主要业务，而且

还包括行政区划、民工动员、婚姻登记、人口登记、社团登记等工作。过去我们曾经存在的一些残余的资产阶级旧民主观点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民政工作中的影响进行批判后，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仍未能完全克服。因此，今后在民政部门的干部，必须继续不断发扬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才能在民政工作中树立和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民政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特别是加强在职的民政工作人员训练。必须在人事部门统一计划下，制定全省训干计划，保证贯彻执行。目前我们在实行普选人民代表大会的具体工作中，在城市工矿区政权如何为工厂企业服务的具体工作中，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具体工作中，已经遇到了许多新的十分生疏的问题，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已经干分不够用了，已经暴露了我们在许多方面并不是什么“内行”而是“外行”了，我们全体民政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从头学起，首先是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组织中去，深入到工厂、矿山、街道、水上及农村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深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根据不同具体情况，掌握工作重点，抓住各项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前进，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工作中的缺点，不断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胜利地完成上述各项任务。

以上是否妥当，请予审查指示。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

第五总分团江西分团工作报告

一九五四年二月

一、根据中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组织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决议，及中南区慰问团第五总分团的指示，在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省协商委员会和省抗美援朝分会决定组织了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五总分团江西分团，负责慰问本省境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公安部队，铁道部队，军医院以及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的革命军人和在荣校学习或休养的革命军人。……慰问团的成员包括了本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工农业劳的模范、革命烈军属模范和各阶层人士等。分团设八个大队，各县均设有分队，全体代表共约九百七十余人。此外还有三个京剧团及一部分电影队，各地方剧团，杂技团也都踊跃参加了慰问了演出。我们自二月十七日起在全省境内展开慰问活动，至三月初基本结束慰问工作。……根据分团直属八个大队的不完全统计，共召开慰问大会一次，座谈会六十一一次，个别访问二十八次。另京剧、地方剧、杂技、越剧，电形慰问演出一〇六场，参观人数共十余万人，并赠送部队锦旗四百货余面（包括县），慰问信一万一千余封信。……现在我们。可以兴奋地向大家报告说：全国人民和全省人民嘱咐我们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到了，我们已经胜利地把祖国人民对于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和深情厚意传达到了，光荣地完成了这次慰问工作的任务。

二、…………。

三、…………。

四、在这次慰问中，人民解放军的种种英勇事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国人民以有人民解放军而自豪。七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

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光荣道路，已经锻炼成为一支百战百胜的英勇无敌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

第五总分团江西分团团长

朱开铨

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通报）

（54）厅民字第九一五号

事 由：通报新建县石贺乡建立“专职联系制”的经验，希参考

主送机关：赣南行署、各专署、各市、县、庐山特区、抚州镇人民政府

抄送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法委员会

新建县石贺乡在普选运动中建立了“专职联系制”经两个多月来的试验，证明这一工作是适应目前农村情况的，这一工作制度的建立，不但有效的克服了设乡干部的忙乱现象。有力的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而且能够使部门工作与中心工作密切配合进行并积极为中心工作服务，乡村干部也因各有专职而能逐渐熟悉本身业务，培养独立进行工作的能力。今后，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必将不断高涨，农村工作内容亦将日趋丰富，改造乡的工作制度与领导方式，充分发挥乡级政权的作用。特别是培养乡村干部独立地进行工作的问题，便成为当前乡村政权建设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因此，特将石贺乡建立“专职联系制度”的经验发给各地参考，希有重点的推广，并在实践中使这一经验更加充实完善起来。

厅长：朱开铨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印）

批转朱开铨同志关于购粮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赣州给省委的来信

地委、县委：

朱开铨同志这个报告，虽有了些过时，但其中对于总路线某些错误宣传的批判和工作作法上某些急躁图快的批判是很必要的。这两种情况不但赣州部分地区严重的存在，而其他地区亦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各级党委要注意检查、批判，和采取有效办法加以克服，这对保证顺利结束购粮和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的关系。

江西省委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

省委：

我们十一月十八号返回赣州，听了地委派到几个县检查工作同志的汇报，关于购粮面等政策问题已有电报报省，不再重复。兹就目前赣州专区情况，报告如下。

据地委统购办公室负责同志谈，目前全专区已普遍转入第二步（自报评议）较早的，龙南、寻乌已超额完成任务，会昌、兴国、定南、龙南五县已进入组织送粮。据十二月十九日统计，全专区已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七十点零三。运动的发展有三种情况：第一种稳健：经过比较充分的思想教育与层层摸底，开始好像慢一些（宣传动员一般十天左右，少者七、八天，多者十三天，最多十五矣），后来快（自报评议，组织送粮，有的只四、五天就完全人仓），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比较深刻的教育，卖出的粮食真正是余粮；第二种慢慢来，机械的按照三个步子的时间，对宣传工作重视，但没有掌握群众情绪，群众已很不耐烦，要求送粮的受到了限制；第三种急躁图快：乡村干部没有动员好，群众抵触思想没有消除，干部不摸底，层层逼，走过场，真正余粮没有卖出。第一种情况是多数，第二种情况是

少数，第三种情况也是少数。从整个专区来看，绝大多数地方，对思想教育比较重视，作到了家喻户晓，搞得比较细致，为今后进行各项工作初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赣州专区第一步（思迫教育动员）的作法，大多数地区抓住了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训练乡、村干部，通过他们再向群众宣传。对乡、村干部，通过他们再向群众宣传。对乡、村干部的集训，一般经过三、五天的总路线，互助合作，两条道路以及购粮的报告和讨论，对粮食情况进行了摸底（一般有乡村干部自己的底和个别访问，算总账的底）基本上解决了大部分乡村干部的思想问题，他们表现情绪高、劲头大，完成任务有信心，并达到了干部自报卖粮的程度，如宁都背村乡集训的六十个干部，有四十二个基本上打通了思想，这四十二个当中除十多个确无余粮外，其他都自报卖余粮给国家（还有十多个有余粮没有打通思想的，以后逐步个别的解决），少者二、三担，多到二十余担，他们再向群众宣传，理直气壮，效力很大，宣传的比较深、透。兴国采取了黑板报、广播筒、唱山歌、采茶灯、个别串连等方法宣传总路线，动员群众卖粮给国家，这样，群众自报的不少，完成任务比较顺利。还有一部分地区到乡后按照系统开会，半天几个钟头就讲完了，大道理多，很零乱，三言两语就转到“要卖粮食给国家”，甚至有些冒的宣传。如宁都青塘乡有个乡干部向群众宣传说：“每人除一百五十斤谷外，一律要卖给国家”，还有的乡干部说：“把自己的粮全部卖给国家，自己要吃向国家买，由国家保管，连老鼠吃也吃不到自己的粮”，零都有一个乡开会宣传卖粮食，群众问卖多少，乡干部说“按公粮比例增加一倍半”，龙南有一个国营商品的干部吴文旦向群众宣传说：“总路线就是消灭你们农民”，有的讲过渡时期好比坐船“互助组是撑船的，单干户是往后拖船的，反革命是砍船的”，因而也引起一些误解，有的群众把谷磨成米隐藏起来，有的问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是否像“地主一样管制改造零都是一个农民准备在银坑买一条牛，听说“明年就要到社会主义”，牛也不敢买了。会昌一个孤老把三千斤粮卖给国家，买了棺材和衣服，等着进养老院。这些地方

的情况，大部分经发现后补课纠正。另外，据宁都等地的情况看，有些干部在工作方法上认识不全面，有的认为：“购粮只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调查不调查也能完成任务”，有的认为：“购粮只要把底摸好，宣传不宣传都可完成任务”，因此，有的直到现在对本乡本村情况心中无数，有的是有粮卖不出。

根据刘建华同志在瑞金、宁都等地的了解，和我们所听到情况，第一步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规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道理（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等）易懂，涉及到个人利益时（卖余粮等）难通，乡干部比较易通，群众比较难通，贫雇农比较易通，中农、富农比较难通；无余粮或余粮少者易通，余粮多者难通。算账打通思想的办法有三：1、算工业品日用品等的价格逐渐降低的账，如信丰九区廊下乡贫农肖成禄算了一个账，一九四七年他家有八口人，年吃盐一百斤，需要一千斤谷，现在一年吃一百斤盐只需要二百四十五斤谷，这样算了账后大吃一惊，决定把七百五十五斤谷卖给国家；2、算农业生产逐年提高，互助合作的账；3、算粮食奸商的账，说明国家掌握粮食的好处，奸商掌握粮食的坏处。再加上社会主义美景的宣传，才能鼓舞群众。

第一步工作时间，不要拖得长，时间拖得长了，会影响群众生产，冷淡群众情绪。有些地区群众说：“总路线就是卖粮”，有的说：“今天总路线，明天总路线到底什么时候卖粮”。根据我们的了解，一般一个乡有十天左右的宣传动员就可以达到大多数群众对党的总路线、购粮有了基本认识，基本打消对购粮的怀疑和顾虑，已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达到了这样程度，就能够转到第二步，不必机械的搞到十五天。南康、瑞金有些干部不掌握群众情绪，认为评议完了就没事做了，硬等十五天是不妥当的，地委已予指出。

第二步自报评议的作法是：先自报后评议。在第一步思想动员基础上，乡、村干部，大部分贫雇农和余粮少的中农及个别富农，采取个别发动自报可解决，如宁都坎田乡采取个别动员，串连自报，全乡四百七十二户，

自报二百五十六户达总户数百分之五十四，完成任务也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说：“政府帮助了我们，现在又为了搞社会主义，我节省下，也要卖几担谷给国家”。兴国塘石乡谢持于说：“我家少蒸一担谷的酒，吃粗一点节约三担，这样就可以卖四担谷给国家”。自报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各地还都有一个小部分（即贫雇农中的少数余粮户，中农，富农中的大多数），个别串连时不能自报，这一部分人多数能在第一次自报评议时自报，最后还有极少数还不能自报，必须在摸清了底以后，再作个别动员，争取其自报，然后再用小会和大会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用群众的力蛰讲道理，进行批判，促其卖粮，如龙南会龙乡元和村，在评议收尾时有三家重点户石观福等不老实自报，摸底一千斤，自报六百斤，有个别动员也不报，于是就布置召开评议会，会上群众说：“给他算，算都算得到一千斤。”贫农石家洪说：“你现在不卖粮，将来你偷着卖，我瞧着你的”，最后石观福才说：“不要算，不要算，我卖一千斤”。往往有些党、团员和干部是重点户，群众就看他们的行动，如赣县一个卫生科长，家是中农，群众说，“看他卖不卖粮”。许多地方都首先打通了干部、党、团员的思想，培养了有余粮卖的积极分子带头，赣县还发动了“老关系”，烈、军属卖出余粮，龙南通过学生教员动员家庭卖余粮，收效很好。各县一般采取了先易后难，层层带动，最后突破落后村重点户的办法。

第三步组织送粮工作，多数地区采取了边自报，边评议，边送粮的做法，如定南三亭乡干部自报卖粮两万多斤，第二天就组织送粮入仓，信丰安息区各乡干部带头一天入库十几万斤，一方面带动了群众，消除了群众顾虑和观望态度，一方面节省了时间，免得将来一起送粮拥挤。只有少数地方采取自报评议完毕后再组织送粮。

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各县销售粮食数字有增加，零都县水头圩一天竟销售四千余斤（过去是两千多斤）比过去增加一倍，有些地区可能还有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是有些人恐慌，怕明年买不到粮，而多买粮食，另一方面个别地区购粮工作作得不尽公平合理，如在龙南我们干部问到两

个农民卖粮有什么意见时说：“乡干部说了，前方催得紧，不卖不行”，有一个说：“今天卖掉谷给国家，明天可以到合作社提米回”，现在这手卖粮那手买米的情形已有出现。再如兴国都田乡芦西村，在自报评议后，发现有九户将口粮卖给国家，当即发现纠正。地委对此情况，已重视研究。

目前全区的情况是：小县任务少，完成快，如寻乌、龙南、会昌等县已超额完成或接近完成，赣县、宁都、南康等几个大县任务完成较差，担子大，地委已决定，将已经完成任务的县的力量抽出一部分，增援几个大县。地委要求全区必须全力争取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日前全部完成任务，我们看，是有把握的。

朱开铨

十二月二十二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报告（53）

厅民社字第八〇六号

事由：检送丰城县第十区爵塘乡二村春荒调查材料报请核示由

主送机关：江西省人民政府

抄报机关：省政法委员会、省财经委员会

抄致机关：省农林厅、省财政厅、南昌专署

据丰城县人民政府元月廿九日（53），民社字第七号呈以“去岁曾发生各种自然灾害，某些地区曾不断发生火灾，烧毁了不少房屋、农具和口粮，据实地调查部分灾民在生活上已发生了严重问题，如三区杜家乡二村劳模杜书生家四口人，土改时分到四亩田，是新作田户，已两天没吃饭了。又十区爵塘乡二村到现在止就有卅六户九十七人无法生活，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现象。……据各区电话汇报，目前无法维持生活的灾民共有八千零四十二户，二万三千零四十一人，吃到禾熟不影响生产需救济人民币廿一亿三千五百九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二元，请给予及时救济”等情。查该县去年是丰产县，虽曾遭受一些自然灾害，但灾情损失从未见报，而今年春荒缺粮现象有些严重，其中必有原因。为了查明情况，经派本厅社会科孙盛海等同志前往该县第十区爵塘乡实地了解。二村目前没吃的只有廿四户六十六人，群众搞各种副业生产，加上各种收益及自由借贷、节约渡荒等，可解决一部分，最困难户和丧失劳动力的还须积极设法解决。与所报材料虽有些出入，但荒情还是严重存在，除建议县府迅将省拨的火灾救济款及今年预拨的农村救济款，重点发至重灾户，积极领导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及将查田定产、征粮情况整理出全面材料报省外，谨检附丰城县第十区爵塘乡二村春荒调查情况 1 份。报请核示。

附：调查材料 1 份。

厅长朱开铨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

方主席：

上饶专区送来拟修建革命先烈黄道同志之陵墓图样和所需经费壹亿叁百余万元一事，经我们研究基本上同意该区的意见，当否，请批示。

附：陵墓图样一份，估价单一份

此致

敬礼

朱开铨

三月三日

汇报

临川、黎川、贵溪等县根据省府三月十八日寅字第十九号电报指示精神，依照各该县需要将山地区乡划小平原乡划大的情况，提出调整计划，并请增加区，乡数（黎川要求增加两个区、六个乡，贵溪要求增加一个乡）。查中南一九五二年七月分配本省一万个乡，今年二月十四日省编委会分配各县市计九八二三个乡，尚余一七七七个乡。经我们研究，意见：根据下而所反映的情况，除拟由省掌握五十个乡作为机动数外，其余一二七七个乡可以补发分配到山地较多而原来乡的平均面积又较大的县以解决其实际困难，各地乡数洋附表是否有多请予指示谨上

方主席

朱开铨

四月廿日

朱开铨厅长在全省城市救济工作

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草案）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一日

同志们：

这次城市救济工作会议从六月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已开了八天，即将结束了，出席这次会议的除有南昌、赣州、九江、上饶、德镇、吉安六市外，尚有庐山特区和十九个一万人口以上的城镇，计：梅山镇、樟树、河口、泉江、康乐、宜春、永丰、冰溪、鄱阳、乐平、宁都、鹰潭十二镇，瑞金、黎川、南城、南丰、丰城、萍乡余干七个县的城与镇。以上共廿七个单位、省政法委员会和有关单位也派了人员参加，此外，并有中央内务部谭锡三科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南办事处吴秘书等五同志出席指导，总计六十余人。“会议的中心内容主要是传达和讨论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总结报告，并着重总结、检查了本省一九五三年城市救济工作，确定了今后城市救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此次会议由于有了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文件的依据，省委、省府领导的重视，中少内务部、中南救总办事处出席同志的指导，以及到会全体同志的认真努力，因此，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志们一致认为收获很大，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习了政策，提高了对城市救济工作的认识：这次会议由于学习了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文件，强调了以总路线的精神来检查和衡量我们的城市救济工作，因而使同志们对城市救济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都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普遍地认识到城市救济工作与总路线的关系，也认识到了只有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进行工作，才不会犯错误。有些单位原来认为组织城市贫民生产自救只有在大城市才可以进行，小城镇无法组织生产自救，只是政府的事，只有政府出头或由政府出资，由政府来组织各种生产，组织好了，再吸收一部分贫民参加，没有注意到如何在积极方面去发动与

鼓励贫民自己多想办法，多找门路，以自食其力。现在认识到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只能助长城市贫民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认识到这些不依靠组织群众生产和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而单纯依靠政府救济去解决问题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包下来”的做法，这些做法是与生产自救、劳动互助的方针相违背的，因而也是与总路线相违背的。这次会后，同志们对这一点是更加明确了，因而也就提高了工作信心。

第二、经过大家认真的讨论，充实了一九五三年城市救济工作总结，明确了今后城市救济工作的具体方针、任务。有很多同志在会前感到工作摸不到边，不好办，通过这次会议后，明确认识到在城市救济工作中一定要贯彻“生产自救，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并树立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加强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表示有信心把工作搞好，这是很好的。吉安市民政科黄科长说：“过去工作有些糊里糊涂，现在才知道城市救济工作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他深刻地批判了过去工作中有时存在着单纯救济的做法，揭发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对收容人员的生活标准规定过高、救济款发放不得当，有积压、浪费及平均摊派现象等，同时表示今后一定进一步把城市救济工作做好，事实上也是这样，只有我们真正领会了上级的政策、方针，那我们就有了武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必将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第三、交流了经验、明确了具体做法：会议中除小组讨论外，并在大会组织了典型发言。如赣州市介绍了组织贫民生产自救的经验和教训，九江、南昌二市就过往人员的处理和救济款发放工作，上饶市就游民改造工作作了经验介绍。此外，并请中南救总办事处吴秘书介绍了中南区城市救济工作上的经验，这对到会同志今后开展工作以具体的帮助。事实告诉我们：要做好城市救济工作，就必须服从总路线的精神，按照政策办事，认真负责，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办法，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做好城市救济工作的重要环节。

第四、会议上除提出城市救济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外，对民政、优抚、

地政、财务等方面亦广泛的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不少具体问题，归纳起共有××条，这些问题都一一作了交待，多数已得到了解决，同志们都反映：这次会议上我们带来的意见都提了，主要问题解决了，感到很满意。

总之，我们这次会议收获是很大的，但是缺点也是有的，主要是：我们事前对市、镇救济工作情况深入摸底不够，以致使总结材料内容不够充实与全面，今后任务提得不够具体。都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纠正。

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认识到我们做好城市救济工作就是为总路服务，城市救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来进行的，否则就会使工作迷失方向和失去意义。如何为总路线服务呢？那就要首先开展对消极救错误思想作斗争，进一步对无法维持生产的贫苦市民组织其生产自救，鼓励他们参加生产劳动，使其自谋生活，这样既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又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与社会负担，同时也给国家增加了财富，这就是为总路线服务。也是我们做救济工作同志一种光荣任务，我们要认真负责把他做好。

二、关于组织贫苦市民生产自救问题；必须坚持“都要劳动”的原则，对城市贫民中无法维持生活而有劳动力者，应动员鼓励他们生产，自谋生活、自找出路，所谓组织贫民生产自救，不是把贫民组织起来开工厂、搞企业，而是根据生产条件的不同、根据贫民劳动条件的不同，从事多种多样的劳动生产。

其办法首先是依靠群众，从现实出发，依靠原来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有什么生产可搞就搞什么，他们全都心里有底。组织贫民参加基本建设、市政建设的粗工作业，如搬运砂石、挑挖土方及修公路，并可搞竹器、小型加工，如磨谷、推米、做鞋、养鸡、养鸭、种菜以及其他粗工作业生产的办法，对已经搞好起来的企业性质的生产，有条件交，争取交出去，暂时不能交出的则应很好地改善经营管理，把它搞好争取交出去。

三、关于贫苦市民救济工作：应坚决贯彻“生产自救、群众互助，并

辅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南昌、赣州、上饶等市强调生产自救，因而缩小了救济面，并且解决了问题，这一经验应继续巩固提高，在这一工作上应注意三点：

（1）救济对象：首先是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予以必要的救济，对不能维持生活的贫苦市民以及因水、火灾害或疾病、病故、生育等事故需要救济者，予以临时救济。

（2）救济标准：根据第三次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规定和本省具体情况，无论临时救济、长期救济、季节性救济，均采用按家庭人口数目递增的计算办法，规定南昌及庐山特区每户每月一般不超过四万至九万元，上饶、九江、景德镇、吉安、赣州五市及抚州镇，每户每月一般不超过三万至七万元，小城镇（五千八口以上的小城镇）每户每月一般不超过三万至五万元。

（3）及时适当的发放救济款，严禁贪污浪费现象；①组织力量深入调查，摸清情况，这就是抽调一定数量的干部配合各区、街，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组织工作组，首先进行政策与业务学习，统一政策思想认识然后展开工作。调查方法：划定街道分片包干，在原有救济户的基础上进行侧面调查与正面访问。这样调查摸底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②由工作组和居民干部具体研究调查材料，进行排队分类；③召开群众大会，反复宣传救济方针政策，强调领了救济应积极进行生产，以典型事例，表扬积极进行生产，以典型事例，表扬积极生产自救的好人好事，批判平均主义和依赖救济思想，并结合劳动态度进行评比，补充修正，通过名单，并对懒汉、二流子确实生活困难的虽给救济，但应加强劳动教育，发动群众监督他把救济款用于生产，避免浪费；④张榜公布，可以使周围群众对救济户进行必要的扶助，并监督其从事劳动生产，同时也是防止贪污，浪费的办法之一。

（四）关于生产教养工作：全省六市的生产教养机构，根据会议精神，应继续加以整顿，并争取在九月底以前整顿完毕。在收容人员中，凡是有

家可归有亲可靠的同其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后，可资遣回家生产劳动；对反革命分子，惯盗、惯窃及其他刑事罪列出名单，连同其罪行材料及在教养院中表现等，送交公安、司法部门处理；对有条件者应设法帮助其自谋生活，对不满十六岁的应坚持半工半读的原则，对过去个别地区企图培养他们升中学、大学的一种“包下来”的片面的，不从现实条件出发的观点，必须坚持加以克服。在处理过程中要慎重，不能草率从事。在没有教养机构的地区，今后不再设立，已设立者，应尽量安置。

整顿生产事业：（1）已有生产单位有发展前途的应交当地财经部门，暂时交不出去的，应加以很好管理，（2）成本高、原料、销路有困难的应改业；（3）性质相同的企业应调整合并；（4）对游民、生产自救性质的人员和工人，应予以不同的待遇。对生活标准过高者，应适当给予降低。

（五）关于对过往人员资遣工作与贫民疾病治疗问题：

（1）资遣工作是一件细致而复杂的工作，可以仿效南昌市和上饶市处理过境人员的办法，即：为了防止伪造证件、骗取路费等现象发生，必须对过往人员进行认真审查和细致分析情况。如首先审查证件章戳是否伪造，是否按指定路线而行，都须一一核对验明，其次对过往人员的来路、去向、态度、籍贯、口音都须详细考虑研究，经验证明，这样做是发现问题的办法。对于发给了路费的人加强与交通部门的密切联系，采取“发车票不发现金”的办法外，并将车票交给护车同志保管，待下车后发还，这可强制过往人员按照指定路线行走，免得再行流浪、乱跑而浪费国家经费。

（2）关于贫民疾病治疗，今后民政部门不再负责介绍，家境贫苦有病无法就医或是因病生活困难可酌予救济。

最后，希望同志们把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同志们回去首先要将会议的情况向领导上汇报。要想把工作作好，首先要得到领导上重视和支持，但必须要求我们自己去争取。工作中不但要善于发现问题，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多向领导报告、请示工作要主动，这样，可以经常得到领导的指示，工作就好做得多了，这是我

们应有的工作态度。其次，工作中总是会遇到困难，但我们决不能怕困难，我们应当多调查研究，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只有自己有信心，有决心，专研业务，学习政策，就会克服困难。

（二）把这次会议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先应根据具体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呈请领导批准召开一定会议传达，市可召集区、街民政科（股）长会议传达，镇可以自己先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召集居民委员会民政委员传达布置下去，并要加以督促检查，以便贯彻施行。

（三）要求七月底将传达布置情况以及工作计划报厅，以便使我们能掌握各地贯彻会议的情况，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便把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圆满地贯彻下去。

以上便是同志们回去迫切需要做的几件工作，希望认真研究执行。

签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于

民政厅（54）民社字第〇〇九号

省府十一月八日以（54）府农字第二四号通知附发江西省一九五四年复堤堵口工作计划，关于复堤堵口经费中说：要各地切实遵照执行。经阅后，认为计划中第一部分复堤堵口经费：“总共需费一九、六二六、〇〇〇万元，据请中央投资一、四〇〇亿元，其不足的五、六二六、〇〇〇万元，据请结合救灾经费使用，分配时未分别分配，使用时由县统一掌握，报销时分两笔账报销。总的要求作到既恢复了圩堤，又救了灾”交待的不够明确。中央虽核准我省今冬明春灾区救济经费为一、五〇〇亿元，而今冬只拨给我省八二七亿，这次我们分配下去是六七七亿，除九月十三日予拨一四一亿外，实际发下的救灾款只有五三六亿，比复堤堵口经费不足数五、六二六、〇〇〇万元相差二六六、〇〇〇万元，这样叫下面“达到既复了堤，又救了灾”事实是有困难的。省府十一月五日“关于复堤堵口及救济经费分配”的电报中关于复堤堵口经费差额是这样说的：“此项差额数字，各地应在不减少应修土方，不降低原计划土方单价的原则下，从核实土方工程积极提倡节约的原则下，力求节省一部。确实不足，可把灾区的复堤堵口工作与救济工作结合起来，节省一部分救济经费，以支援复堤堵口。”“但各地在修堤使用经费时，还是先用复堤经费，以后必须将救济经费移一部分用于复堤者，应作出计划，报告省府批准。”

根据电报精神，复堤堵口经费的差额，主要是从核实土方工程一极提倡节约来解决，确实不足，可把复堤堵口工作与救济工作结合起来，节省一部分救济款以支援复堤堵口，为与复堤堵口计致中所说的是有出入的。据南昌专署民政科长电话报告，该专区初步决定把百分之六十的救济款，移做修堤堵口用，怕救济工作没有保证，要求省里明确救济款使用范围。我们意见：要用救济款应有一个制度，应规定先用完复堤堵口经费，不足

部分经报省府批准调用若干救济款去补足复堤堵口经费。同时救济款主要还应使用在救济方面，在配合复堤堵口工作的基础上，也要做好救济工作，达到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和不因生活而自杀，出卖儿女的现象。为此，我们希望省府考虑，通知各地按电报精神执行，并修正复堤堵口计划，否则可能在复堤堵口工程方面产生浪费，或者急需救济的得不到救济，即可能产生冻死、饿死人的现象。妥否

谨呈

邵主席

朱开铨

王主任：

我于十一月五日起赴鹰潭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八五〇三部队，就便检查了有关鹰厦铁路修建方面的问题，并与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及到工地指示工作的同志交换了这一工程的意见。除目前整个征用土地及民工动员的情况另有专题报告外，特将我所了解的目前工作中存在的许多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请予及时处理：

一、关于民工动员方面：按照铁道兵提出的计划，共需民工九千人参加修建工程。自今年十一月起至年底止分批动员六千人。第一批余江、东乡两县民工一千人已于十一月四日进入工地（因在县审查不合格退回一部分，实到九百三十八人）。就这一千人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都非常不足，特别是物资供应上存在问题更多。如：

1、思想准备方面：据了解余江、东乡两县在动员民工时，从政治上动员较差，从经济上来动员多，如说一个月可以拿二十几万元（事实上没有这么多），生活好，又有戏看，又有电影看，结果民工到了以后，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的首先就松劲了。

2、组织准备方面：由于时间仓促，组织也不健全，民工大队的干部第

一天到县，第二天就到部队接受任务，干部本身对任务都不明确，整个组织都没有事先很好搭起一个架子来，大队干部甚至连人数都掌握不起来。党、团组织也没有一个底，有的干部弄得头昏眼花。

3、物资准备方面：民工所需的工具非常缺乏。如镰刀、斧头、锯子、锤子、铁镐、筐子等都没有，向群众借又借不到，因此最初几天，一千人做工的只有二百多人，后来八五〇三部队设法借了一些出来，情况稍有好转。在吃饭问题上，民工的伙食单位多，因带的是小锅、小灶，分散起来做饭、吃饭，时间不一致，每天差不多到上午十点钟才能陆续进入工地，耽误很多时间，再加上技术不熟练，工作效率很低，住的问题也因准备不足，临时由部队让出了三百多人的住房。

4、物资供应方面：部队和民工都有困难，特别是民工困难多。

首先是粮食供应方面：民工目前的工地是在上清，离约六十余华里，尚可通公路，再往前去，圳上、耳口等地不能交通越加不便。粮食供应很成问题，一千民工一天，约需二千斤粮食，要民工自己来运是行不通的，雇人送也不是办法，因为粮食供应不上，民工有时吃稀饭。

在菜蔬的供应方面问题也很大，从部队方面来看，因为当地菜蔬不够供应，他们已经派人到华北去运来，民工吃的菜，在鹰潭，能供应，但运到上清一带，价格很贵，如白菜要卖到一千一百元一斤。影响民工伙食。食油原规定每人每日为四钱，后国营商店改为每人每日二钱，其实只供二钱。民工反映不够吃要求每人每日按五钱供应。猪肉供应问题，部队有时用汽车拉一些猪去供应部队，民工条件，因此到工地后就没有吃过猪肉。原规定资溪要收购七百头猪，实际上连十七头也收不起。

部队和民工都要求给一些黄豆，一方面可做菜，一方面准备建立几个豆腐坊。鹰潭合作社也要求给三十万斤黄豆、三十万斤绿豆，专财委没同意。

煤油的供应很成问题，贵溪县在下半月要全部脱销，专财委拨了十五吨来，指定供应部队，民工用的煤油没有明确规定如何供应。

黄烟的供应也很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甲乙级的烟多，丙、丁级的特少，供不上。

贵溪、资溪一带群众有吃海带的习惯，据说不吃扁桃腺就会发炎，最近从汉口运去了三千斤，指定供给部队和民工，今后这一方面还要保证供应。

由于供应上和其他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未能解决，因此民工思想混乱，情绪低落，甚至发牢骚，前几天已跑了三个。民工质量也不够好，个子小而弱，其中有余江县邓家堡犯人家属宋任泉，他有个叔父及二个哥被处死刑，母亲自杀；又有二个保长，其中有熊春扬并当过替察长。东乡县有一土匪徐宝和、巡官刘永清等。这些问题如不迅速解决，估计还可能有人再跑。

二、征用土地方面：铁路的设计计划部队还没做好，做好后还要交给铁道兵部鉴定，以后再交给我们。公路因任务急迫，部队是随测随修，地方上的准备时间较少。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征用土地的同志与部队的测盘队和部队负责征用土地人员一起，测定后即进行工作，因此一般问题不大。但目前贵溪县正在全面布置随征带购工作，对如何结合支援鹰厦铁路的修建工程注意不够。因此区乡干部多以“中心工作太忙”，不能参加征用土地工作；其次，在上清附近，有四家房子，因工程需要先拆了，没有进行安置补价，这样是不妥的，极易引起群众的疑虑甚至不满，使我们的工作陷于被动。

三、省筑路委员会办公室的人员配备问题：现在工作日益开展，办公室机构却不够健全，现只有正、副主任二人、科长四人、一般干部十六人，还有一些主要干部和一般干部没有配齐，影响工作。

根据以上存在问题，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省筑路委员会办公室应迅速健全起来，干部请人事厅迅速配齐。

（二）由于支援鹰厦铁路修建工程的任务牵涉到许多部门工作，各有关部门应将如何开展本部门的工作，作一次系统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

体计划，特别是有关粮食、物资供应的位，更要负责保证部队与民工的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并急需设立二辆专用汽车。

（三）贵溪、资溪两县应根据工作需要，把供应点迅速设立起来，现在，贵溪县已设立了九个供应点，但物资缺乏，资溪县的供应点未设立，其干部问题本身无法解决，请抚州专署予以配备。我们意见，应请抚州专署切实解决。

（四）民工大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应事先准备好，首先以上干部应由各地按照省府指示事先抽调好，中队以上的架应事先组织起来，最好在前一星期先搭好大队部的架子，筹备工具、灶具、工棚等工作，以便一接受任务即可行动起来。分队、小队的干部，是由不脱产的干部担任，也应在事先即有准备，各地，袖早晚时间开会，进行政治教育，重视民工的质量，了解情况，就地解决一些困难。现在部队已派了四十多个排以上干部到民工大队协助解决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另外，部队还准备每一大队派一个营级的技术干部起参谋作用，在大队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同时还准备采用换工的办法解决民工技术不熟练的困难。

（五）工具问题：原则上非消耗性的工具（如扁担等）可由民工自带，其余工具可做出计划，经大队向铁道兵领款购买，或向部队借用，一切均应在事前准备好，以便进入工地即可施工。

（六）党、团组织应健全起来，需建立一个党委会来领导。在工程进行中注意建党、建团，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七）据了解：上清附近发现土匪特务活动，急需予以剿灭，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证部队和人民的安全。

另外，我因十六号要去北京开会，请李杰副主任对以上问题负责及时处理。

省民政厅，朱开铨

十一月十五日

省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九日胜利闭幕后，我同大家一样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是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的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五中全会的重点在于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五中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都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都是有益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五中全会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选出的总书记，书记处书记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具有卓越工作能力而又比较年富力强，有很高威望的领导同志。这充分显示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现在设立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党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能长时期地更好地得到贯彻，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能加速实现。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增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这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完整准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我们的党是有勇气有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失，误和挫折中进行学习的。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也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我们的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两个文件，使全党认真地学习和具体的执行有了依据。今后通过学习执行十二条准则就能使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

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是非常及时必需必要的。五中全会关于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宪法中取消四大等项决议和决定的措施，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发展。

五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重要决议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们要响应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号召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工作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二大召开！

朱开铨

3月5日

红军长征路上的回忆

大事记

1934年10月15日，从瑞金县云石山出发，经麻地、郭坑，观音堂、石埠、岭背到达古田区住下待红军开路，10月18日从于都过河到新陂圩住下待红军打开路，10月25日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鼓陂封锁线，构筑有坚固堡垒、粤军拒守。

10月27日，渡过大余河（章水）11月3日红军从城口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汝城与城口之封锁线）

11月15日，红军通过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粤，路封锁线，湘军拒守）。

后连克临、加禾、兰山，零陵、江华、永明等县城。

11月22日，红军渡过肖水（湘江上游）

11月15日红军通过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粤汉铁，路封锁线，粤军拒守）。

11月29日，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12月上旬，攻占湖南边境通道城，军委在通道城开会。

12月14日，中央在贵州黎平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三五年

元月3日，红军强渡乌江成功，22名勇士先占领渡口，大队红军增援。

元月5日，遵义解放，向湘江前进。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匪帮急忙调派四十万大军，三路追击堵截：一路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湖南军阀何健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全县一带，沿湘江布防；一路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集中于兴安、灌阳一带布防；一路为国民党中央军和湖南军阀的部队，分别跟在，红军的后面追击。李宗仁白崇禧怕红军进入广西桂林，自动放弃，兴安、灌阳防线，将兵力南移富川、加

县、恭城一带。红军在 11 月，下旬顺利到达湘江东岸。11 月 2 号，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的湘江东岸与白崇禧何健薛岳之部激战一星期，敌人决战。长征以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了逃跑主义的方法，处于极端被动状态，而又硬拼硬打，夺路突围，部队，损员很大，又得不到休整，战斗力空前减弱，若采用正面直顶的，办法和优势敌人打硬仗，势必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元月 11 日开群众大会。

毛主席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遵义革委会成立。

元月 15 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

元月 24 日，红军经过桐梓松坎到上城给敌人刘湘教导师，（三个旅）严重打击。

2 月 11 日，占领云南省以北扎西县（威信）。

2 月 25 日，红军占领要隘娄山关。

2 月 27 日二次攻占遵义城，红军歼灭敌军吴奇伟二个多师。

打败了敌军，但红军损失惨重。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领导结果。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错误领导越来越不满，要求改变领导。湘江战役，这种要求达到了顶点。

12 月上旬，红军攻占湖南边境通道城。军委在通道城召开会议。毛主席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

毛主席英明主张为大多数同志赞同。

此时，蒋介石匪帮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若不放弃原来计划，势必与五、六倍于我的敌军决战。

3 月 19 日，红军从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

5月8日，红军渡过金沙江。

5月11日，红军到会理。

5月30日，红军渡过大渡河。

6月14日，红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6月16日，一、四方面军汇合。

6月18日，两河口开会。

6月27日，红军过第二座雪山梦笔山、到达卓克基。

6月30日，渡过梭磨河。

7月2日，过第三座大雪山长板山。

7月6日，过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7月7日，过第五座大雪山拖罗冈山。五座大雪山夹金山最高，拖罗冈山最长。如果走不早、走不快的话，就走不完。

8月1日是（八一宣言）。

8月5日，红军到毛儿盖中央开政治局会议。

8月24日，红军过草地。

9月12日，在包座河的救济寺开灭胡宗南一个师。

9月17日，攻占腊子口。

9月20日，到达哈达铺。休息二天。

9月25日，红军渡渭水河。

9月26日，红军攻占榜罗镇。

9月27日，在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29日，占领通渭县。

10月3日，通过会宁、静宁间的陇海铁路线。

10月7日，红军通过平凉固原封锁线、击溃敌人七师四个，骑兵团、越过六盘山。

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陕甘革命根据地。

1981。6。12

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的经历

朱开铨

1942年1月至1945年6月，我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在此做一个简要回顾。

1941年初，我从陇东的三边回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说：“你的身体不好，目前暂不分配工作，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担任领导职务的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理论水平低的人担任领导职务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现在有时间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要求去党校学习。我对高自立说：“只要你同意，我还有地方去的，我想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又去见毛主席，提出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愿望。毛主席很高兴地说：“学习好哇！这个想法好得很嘛！”

我把见到毛主席的情况转告高自立。几天后，我又见到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邓发，他说：“瑞金佬，你现在没有工作了，我也没有工作了，我已接到命令，调离中央党校另行分配工作；你打算干啥啊？”我说：“准备到中央党校学习。”他说：“现在不行，这期学员就要毕业了，正在做总结，要去也要等下一期开学。”1942年1月，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毛主席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彭真任教育长（后为副校长兼教育长）；设校务部（主管行政事务和生活）、教务部（主管学习）；教务部下设总支委员会，有十多个支部，每个支部设书记、学习干事、生活干事各一人。每个支部有七到八个学习小组。所有的学员都编入各支部。当时中央党校分六个部，一部的学员都是地、师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和各地参加七大的代表。我在一部十一支当小组长。

毛主席题词“实事求是”是校训。党校对学员的要求很严格，学习和

生活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张。所有学员都住校，经支部批准的少数人，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

有一次返校途中，我被几位执勤同志拦住，问我为什么不扎皮带不打绑腿？我说：“皮带没有了，绑腿也早就坏了。以后没发过。”又问“你是哪个部门的？”我说：“中央党校一部的。”有一位想让我走，其余几位不同意。当时联防司令部在延安有一条规定：所有军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外出都要扎皮带打绑腿。他们把我带到联防司令贺龙同志处，向贺龙汇报后，贺龙问：“听你的口音是江西人吧？”我说：“是江西瑞金人。”贺龙叫我坐下，问我的经历后，高兴地叫警卫员煮大米饭、腊肉香肠和鸡蛋，留我一起吃饭。贺龙告诉我，他是南昌起义带部队到瑞金时加入共产党的。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毛主席讲话，这篇讲话就是《整顿党的作风》。整风运动从此开始。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整顿党的风气，这次整风主要是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还要对干部进行审查，审查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就讲清楚，不是肃反。毛主席还说：“现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知识分子还不如大师傅；大师傅会杀猪，而这些人则只会吃肉。”当时，对毛主席讲有一些知识分子不如大师傅的话并不理解。通过深入学习，才知道那是指王明及其追随者，并不是指整个知识分子阶层。

开学典礼结束后，我上前给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问：“你也在党校学习了？”我说：“是！”毛主席问：“我刚才讲的话你听了没有？”我说：“听了，只是我的理论水平低。”

毛主席说：“现在开始学习就好了。”

过了十几天，总支委负责人对我说：“按毛主席指示，经总支委同意，发给你一张中央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以便出入延安各级党、政、军机关。这是出于工作需要，是党对你的完全信任，要妥善保管。如果丢失，立即报告。”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丰产期，毛主席针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存在的

问题，及时作出了理论上的研究和回答，不断发表针对性很强的理论著作，都是我们党校最先学习，其间我们学习了如《整顿党的作风》《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等内容。同时，党校还组织学习了很多马列主义经典理论著作。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也经常给我们讲课，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很大。

在中央苏区时，毛主席受王明错误路线排挤打击，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创办中央苏区苏维埃大学，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毛主席亲自给我们上政治理论课和军事知识课。重点讲了土地革命的问题、怎样建立红色政权、怎样划分阶级、怎样执行土地政策、怎样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发展生产、怎样发展经济、怎样打游击战及运动战等等。

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毛主席对我们大家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原则，什么叫民主？开会大家发言，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讲。集中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你提出的意见被多数人否定了，可以保留，你认为自己的意见对，可以在下次会上重新提出来，但言语行动一定要服从，要执行多数人的意见和决定，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讲到军事知识时毛主席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不能盲目硬拼，地方武装应以游击战、伏击战、袭击战为主，能大量伤亡敌人，自己不伤亡或少伤亡；当一个指挥员，不是要你去挖工事，去送信，是要你分析了解敌情，敌情清楚了，才好下决心。有胜利把握的仗不打，犯右倾错误。没有胜利条件的仗去硬打，就要犯‘左’倾错误。”

我经过中央党校四年多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政治思想理论水平提高很大。

1942年上半年，西北局书记高岗规定，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不准自由行动，向组织交待问题。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陈正人的爱人彭儒向我请假回家，我向支部报告同意她回去。高岗打电话给彭真说我干扰西北局的整风工作。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时没吭声。过了几天，就又派了一个组长。十几天后，支部书记说：“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还是你当组长吧。”我说：“我这个组长不是撤掉了么？”他说：“没有哇，谁宣布撤了？只不过是另派了一个组长来。”我说：“有组长就行。”由于我坚决推辞，1943年初调我到一部六支任小组长。这时整风学习阶段基本结束，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受康生影响，在短时期内称之为“抢救”。1943年下半年，重点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在此之前，多数同志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了解，只限于亲自经历过的有局部的不完整的粗浅认识。学习提高了我们彻底清算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自觉性。

在审查干部时，中央规定，领导作的结论不算，一定要小组会通过的结论才算数。审查是先写简历，交待自己过去的历史，再联系实际，检查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对重大政治事件表明态度，然后小组成员集体讨论，对有疑问或交待不清之处询问，小组全体通过再报总支审批。

我记得毛主席在中央苏区讲过，最无能的人才搞逼供信，有问题的人你打他有什么用？没问题的人你打他还不是乱讲。我在审查干部时，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采取的方式方法得到校部和毛主席的称赞。

我这个组有一位学员，叫王生，是湘鄂赣省的保卫局局长，在党校时叫XXX。在肃反中有极左的表现。红军长征，他留下打游击。有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后化装返回时，被敌人岗哨搜查出两发子弹，被当成特级要犯突审。他受刑不过终于自首，并答应给敌人提供情报。他是参加七大的代表，我们组对他交待的情况有疑问，我就向其他湘鄂赣来党校的同志调查，原来他在根据地时是个很有审问经验的人。支部研究采取攻心政策，启发教育，让他把问题讲清楚。支部找他谈了一个多月，他还是没有讲。我想对他不能逼得过急，就耐心地反复谈党的整风审干政策，经常晚上约他到延河边谈心。终于有一天，他主动约我到延河边，向我交待。他

一见面就大哭，然后边哭边交待说是从郴州执行任务回来时，被查出两发子弹经不住严刑拷打向敌人自首，并答应给敌人提供情报。我问：“你给国民党提供过什么情报”他说：“以前没有，这次到延安开会，国民党派了两个人来，把我的学习资料抄了两份。”我向支部汇报后，就调他到临时支部，调到那里的多半是被审查出了问题。由于他主动交待问题，根据问题实质和他的态度，处理结果是取消七大代表资格。后来，他在东北战场牺牲了，用鲜血洗净了这一历史污点。

我调到六支当小组长，资深位高的同志较多，而我要给他们作审干结论，对他们的历史都要审查，既要查清历史，又要团结同志。特别是六支的支部书记朱瑞也在我们这组。他是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31年宁都暴动领导者之一，红五军团政委。有红七军团政委乐绍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陈光；同刘志丹、谢子长一起闹革命的老同志崔田夫，河南省的一个地委书记王国华，石家庄来的两位七大代表，还有一位陕北的老同志，连我九个人。

我就请小组先从我这个组长开始审查，我先写简历，再讲自己的历史，联系实际检查自己思想和工作，表明在历次党的重大事件中的政治态度。

我出身于江西瑞金县合龙乡一个贫农家庭，幼时读了两年私塾，16岁就挑起养家重担，租种地主田地为生。农闲时经常为商人挑脚到广东和福建，受那里农民运动影响，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同年由农协主席共产党员杨华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参加革命是恨天下不公，这个社会里穷人到处受欺压。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支部书记杨华昌被捕，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上山秘密活动。朱德与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合龙乡党组织负责人杨寿宝将我召回，1928年10月，经杨寿宝和朱甫庭介绍，我重新加入了组织，候补期三个月。1929年春我参加武装暴动，任瑞金县红色暴动队中队长。1931年3月任瑞金县合龙乡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1932年4月任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11月任瑞金县云集区党委书记。1933年6

月任长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0月任中央苏区苏维埃大学二大队指导员。1934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1934年4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委员、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6月任粤赣省会安工作委员会主任。1934年9月任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中央工作团干事。1935年1月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1935年2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政务科长、中央工作团干事、十二团地方工作组主任。1935年10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1936年2月至5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5月任陕甘宁省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7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1938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二科科长。1938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副厅长兼农业学校校长。1940年2月任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长。1942年1月到中央党校学习。我个人陈述两天，第三天是小组询问，共询问了三天，对我的审查是一致通过的。

乐绍华问：“你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哪里？”我答：“杨华昌被敌人杀害，杨寿宝和朱甫庭红军长征前都牺牲了。”陈光问：“听说云集区是查田运动的试点，你是怎样做的？”我答：“那是1933年2月，我向毛主席汇报云集区工作难以开展，毛主席两次提出在云集区进行一个查田运动。他说查田不是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亩田，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发动群众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要搞清他们的剥削情况，核实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只有斗争取得胜利，才能做到合理分田。毛主席带王观澜到云集区叶坪乡搞查田，派罗境瑞带中央七十多人的工作团到古集区一、二乡搞查田，云集区委负责第三乡查田，我带区政府在其他五个乡查田，经过一个月，云集区查田运动试点成功。毛主席亲自总结，指出查田运动成绩很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培养出300多名积极分子

和干部，肃清了封建势力和半封建势力，纯洁了党、政、赤卫军，划清了阶级阵线，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解决了 1930 年和 1931 年分田不合理的现象，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加强了经济建设，支援了革命战争，最大的成绩是扩大了红军。在八县查田运动誓师大会上，云集区查田运动的试点经验被介绍推广。”

崔田夫问：“谁可以证明你 1934 年 2 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团当巡视员？”

我答：“毛主席可以证明，在一起的王首道和周月林巡视员也可以证明。”这个时期毛主席处于被王明“左”倾路线严重打击的困境，但他仍然关心和教育我。当我说对民主集中制还不太清楚时，他说，这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原则。什么叫民主？开会大家发言，有什么想法、意见都可以讲。集中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你提出的意见被多数人否定了，可以保留。你认为自己意见对，可以在下次会上重新提出来。但言语行动一定要服从，要执行多数人的意见和决定，这就叫民主集中制。还有一次毛主席讲到联系群众问题，联系群众不是要天天到群众家里去，而是看你的政策和方法是不是符合群众利益，联系群众要有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符合群众长远利益的，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毛主席还对我说过，比如你是一个指挥员，群众把生命都交给你，你不好好侦察，不好好分析问题，怎么能当好指挥员呢？当指挥员不是要你去挖工事、去送信，是要你去分析了解敌情。敌情清楚了好下决心，有胜利把握的仗不打，犯右倾错误；没有胜利条件的仗硬打，就要犯‘左’倾错误。这实际上是对王明路线的批判。”

陈光又问：“你为什么离开毛主席到粤赣省？”

我答：“是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命令我立即到粤赣省任职。”

乐绍华问：“你是怎么从粤赣省到红军参加长征的？”

我答：“1934 年 6 月，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毛主席到粤赣省找我谈话，要我当会安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务是守住高排为中心的二十

多个区乡地域，保障红二十二师后路不被切断，指挥粤赣省会安独立营，三个游击队二百人，会安工委自的保卫队五十多人，共约七百人的地方武装。我们的敌人是广东军一个正规团和六百多人的民团，约五千多人。毛主席首先讲重要性，高排丢失，麻州就会被敌占领，右水也易失守，红二十二师将受敌前后夹击，导致会昌丢失，不仅粤赣省很危险，也严重影响中央的安全。其次讲军事原则，毛主席说，调查敌情，敌人有多少，是新部队还是老部队，有什么武器，有多少。调查社会情况，群众情绪怎样？生活怎样，有什么谣言。打仗要对群众负责，情况明白了，就要下决心，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群众的命都交给你了。像你们这样的队伍，打游击战最好，能大量伤亡敌人，自己不伤亡或少伤亡。打游击战和伏击战不打正规战。有条件时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按照毛主席亲自教我的战略战术，我指挥部队打了两个胜仗，除我一人负轻伤外，部队别无伤亡。并缴获到一些部队急需的枪支弹药、粮食、布匹和食盐。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部队士气，很快扭转了高排的被动局面。最重要的是，达到了毛主席对会安工委的军事战略要求目的，有效地钳制住广东军一个正规团，保证了红二十二师的退路不被切断。

当时会安工委驻守高排，一无粮，二无钱，三无筹款筹粮对象，四缺弹药。向粤赣省政府要粮要款，答复是就地筹取。高排位于交战前线边界地带，地主、富农和商人早已逃光了。向粤赣省军区要弹药，省军区答复，向敌人要。我到高排的第二个个月据群众报告和侦察员的核查，我们面对的广东军一个正规团，大部调往筠门岭，增援攻打红二十二师，留守团部天心圩只有一个正规排和一个民团排。当晚我召开会议，布置夜袭敌团部战任务。我说：“广东军主力去朗岭打红二十二师，我们今晚就去袭击它的团部，敌人只有两个排，乘夜袭击是可以消灭掉的，到天心圩四十多里山路，天不亮就可以摸进去袭击敌军。”独立营营长说：“我同意朱主任的意见。”政委说：“朱主任，你这是冒险，会不会是敌人捣鬼？”政委还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苏维埃大学毕业的，校长是毛主席。”

政委又问：“你学的是什么？”我说：“学政治，土地政策，也学军事。”参加会议的保卫队和游击队负责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因为怕有异议延误了战机，我决定撤销他的政委职务，由我兼任政委。部队立即奔袭敌军团部，可惜赶到敌团部天已大亮，部队迅速击溃敌军两个排，捣毁了敌团部。如果当晚没有发生争执延误时间乘夜袭击，就可以全歼敌团部两个排。在此次战斗中我们缴获了紧缺的枪支弹药和大量的粮食、布匹，特别是几千斤宝贵的食盐。这些重要的给养物资我们组织人力挑运了一整天，到太阳下山才挑完。我们还打土豪筹款几百银元。1934年9月调我任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任中央工作团干事参加长征。

崔田夫说：“你讲一讲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的情况。”我回答：我在遵义县完成任务后，到第三军团第十二团地方工作组当主任，1935年10月长征到陕北吴起镇，王观澜同志在路旁大声叫：“开铨同志，你停下来，不要走了。”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中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成立陕甘省和陕西省。决定调你到陕甘省筹建省政府。”我说：“我还是想留在部队工作。”他说：“是毛主席提议你到陕甘省，你是省委七个委员之一，担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中央考虑培养当地干部，所以省政府主席由本地人担任。你要搞好团结。”我问：“毛主席怎么知道我还在啊？”他说：“主席对你一直很关心，一路都在问你，你的情况他知道。”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代？”他说：“主席讲陕甘边根据地是全国唯一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长征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才能站住脚，一要搞好团结。”1935年10月，我到陕甘省就职。1935年12月初，直罗镇战役干部总结会后，毛主席赶到陕甘省，他说：“我到省委听完汇报后就要回瓦窑堡，你给我找个向导。”我就派陕甘边来省政府工作的罗培兰同志找一个可靠的向导，为毛主席带路。我向毛主席汇报省政府的工作后说：“天都黑了，住下来明天走吧。”主席说：“现在情况很紧急，很像中央苏区肃反，这里的肃反搞得也很厉害，连刘志丹同志也抓起来了，

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根据地县以上干部都被抓起来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要赶回瓦窑堡处理这件大事。”陕甘省是在陕甘边区根据地的上扩大的，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毛主席党中央解救出来以后，派往关中特委，路过陕甘省时，我请他推荐陕甘边区区县干部并介绍敌情，对陕甘省和后来的陕甘宁省舒有很大的作用。

1936年4月底，毛主席到陕甘省听我汇报工作，他问：“看过三国没有？你知道刘备、诸葛亮为什么会失败吗？”我说：“没有看过三国，听过刘备、诸葛亮的故事。”主席说：“诸葛亮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但是不培养当地干部，总是关云长、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上将，最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怎能不败。所以中央要培养使用陕北干部。”1936年5月17日，撤梢陕甘宁省成立陕甘宁省，我任陕甘宁省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马锡五任陕甘宁省政府主席，他和罗梓铭介绍省政府干部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批准结婚。

王国华问：“你从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到民政厅二科科长是为什么？”

我回答：我当巡视团主任时，张国焘为拉拢我，对他的警卫员交待，不管朱主任什么时候来，都不必通报，直接进来就是，我知道他是反毛主席党中央的，但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一直很警惕。有一次陕甘宁边区专员县长会议快结束时，他提议请国民党考察团主任到会讲话，我在会上带头反对，他很嫉恨。有一个晚上十二点多，我向他汇报工作，推开门就看见张国焘和国民党考察团的主任，黑着灯坐在一起。一见到我，二人大惊失色。1938年3月，张国焘利用职权调我到民政厅二科当科长，我向中组部长李富春反映张国焘是打击报复，李富春说：“他现在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不便改正他的决定，你还是先去，以后组织上再做安排。”1938年底，我调边区建设厅任副厅长。这个时候王明回到延安，搞起右倾投降主义，延安也有“四个一切”标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统一

战线高于一切。”这二件事都说明，虽然毛主席正确路线已经恢复，但王明路线和张国焘坚持反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行为仍然不止。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结束。

我自述历史和认识，回答询问进行到第五天，小组全体表决通过。

当时的整风审查干部是很严格彻底的，中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自己的历史和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我记得周恩来讲的加天，上午他坐飞机从重庆来，下午就到中央大礼堂讲话。当时在座的只有我们 200 多名高级干部。周恩来一开始就讲：“延安整风搞得很好，挽救了许多同志，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过去对毛泽东同志的看法，是彻头彻尾的错了。”态度诚恳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历史问题交待得很清楚，认识非常深刻。大家听完他的讲话，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问题，他的发言就被一致通过了。周恩来还要求中央把他的发言转发给党内高级干部，中央在大礼堂当即宣布：周恩来同志的发言已经得到与会 200 多高级干部的一致通过，范围仅限当天参加会议的同志知道，不再发文和传达。

延安整风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通过这次整风，我认识到“左”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1945 年上半年延安整风结束。

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情绪格外高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原定 1939 年召开，因为那时党内思想斗争还很激烈，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还没彻底清除，党内还存在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决定先在党内整风，在全党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再召开七大。

结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后，我回到边区政府参加党代会，在党代会上被选为出席七大的候补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

任弼时同志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毛主席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线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毛主席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通过了新修改的党章，确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制定了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毛主席致七大闭幕词后，充满信心地预测，很快战胜日本已不成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向解放区进攻打内战，最多五年的时间，我们现有的一百万军队就可以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夺取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

1945年6月11日七大闭幕不久，抗日战争就取得胜利，解放全中国仅用三年，比毛主席预计的五年缩短了两年，这就是七大的重要作用。七大使全党思想空前统一，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七大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

朱开铨

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是我们在中央苏区坚持对敌斗争较为艰苦的一年。自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四次“围剿”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从全国各地调集百万军队，并出动五十多万，东路从福建会宁，南路从广东，西路从江西吉安东固，北路从江西南丰，分四路对中央苏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面临强大的敌人，我红军战士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决心为保卫工农利益、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苏维埃而英勇战斗。

敌人向我中央苏区猛扑的重点，主要是在北线广昌，但其他三路也不懈怠。负责进攻我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一线的敌人是南路剿共总司令，

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队伍。而肩担保卫南大门重任的是我红军二十二师。在形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中央号召根据地各行各业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红军，打退敌人的进攻。苏区上下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了。

那时，我在粤赣省政府当土地部长（驻会昌松树排）。一九三四年六月间，毛主席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驻地会昌文武坝，代表中央检查指导省委工作。听到毛泽东同志来到的消息，我很高兴地去看望他。一跨进门，就看见毛主席正聚精会神地伏案审阅文件。听到我的脚步声，主席回转头来。我连忙上前，向他敬礼、问候。毛主席脸上挂满了亲切的笑容，同我握手，说：“你到这里来很好。”随后，我陪同他到省政府土地部。他问我在会昌干什么？我说：“张闻天同志叫我来粤赣省当土地部长。”接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端坐在毛主席身边，听他精辟地讲解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他的卓识远见，使我们深深为之心折。

几天后，毛主席又将我召到省委。我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说：“省政府土地部的工作我已经干了两个月，基本情况都了解了，毛主席问我，这个地方的查田运动搞得怎么样？”我说：“查田运动只有少数地方开展了，还不深入，不普遍……。”毛主席认真地听着，截住我的话说：“要抓紧，查田运动要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你要把在瑞金云集区搞查田运动的经验带来。”接着，又问我：“这里的阶级斗争，农业生产怎么样？”我说：“这里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地富互相勾结，经常捣乱。农业生产情况还不错。”毛主席听了我的情况介绍，沉思片刻，对我说：“你挂一个土地部长的职务，人不要在土地部，工作由副部长主持，你去会昌当县苏维埃主席。这个县很要紧，原来的苏维埃主席不能用了。”于是，我听从主席的指示，赴会昌任县苏主席。

毛主席经过一些时候的细致调查后，不久就给会昌县写了一封信，对如何发展苏区大好形势，深入开展查田运动，都作了具体的阐述和指导。我记得信的内容有六个方面：（1）要普遍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分清阶级阵线；（2）要发动群众搞好阶级斗争，要纯洁干部队伍；（3）要做好扩大红

军的工作；（4）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5）要搞好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的封锁；（6）要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接到信后，我们立即召开县委、县苏领导干部会议，由县委书记林行彬同志宣读了这封信。与会同志无不欢欣鼓舞，一致表示要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由于当时还挂着土地部长的职务，部里的一些事情还需要我过问处理，所以每隔五、六天，我便要回土地部一次。有一天，我回到土地部，碰巧遇见毛主席从省委步行来了。看到主席风尘仆仆，行色匆匆的样子，我心里猜测他专程来此，必有要事。果然，毛主席将我上下审视一会，神情严肃地问我：“你这所房子朝哪个方向？”我平常不注意，一时理解不了毛主席问话的意思，随口答道：“左手靠出太阳的方向。”毛主席微笑着说：“左手出太阳就是朝南。一个干部要有这种常识，要辨明方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主席教育我要站稳立场，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主席又问我：“高排的事你知道吗？”我以为主席只是指那里的领导机关三次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就说知道。主席说，那里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第一，高排区子弹少，面对的敌人超过我们许多倍；第二，那个地方不用苏票，没有银元、铜板买不到东西，筹款对象都跑了，无法集资；第三，那里的粮库没有粮食，队伍吃饭很成问题；第四，不仅地主、富农、恶霸、赌棍、商人跑到敌占区去了，就连他们的亲戚，一部分群众也跟着走了。高排只剩下两家豆腐坊、一家饮食店、一家卖猪肉的。

听了主席的话，我才意识到高排问题的严重性。主席接着说：“高排很重要，它距会昌只有六十华里。如果敌人占领了高排，再进一步，一路插向右水，一路直指麻州，占领了这两个地方，会昌就很危险。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一紧张，势必影响中央。同时，敌人占领了麻州、右水，切断了交通，堵绝了红二十二师的供给线，使之腹背受夹击，红二十二师也就坚持不了斗争了。”

主席所说都是符合实际的。我曾到过高排，那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布置在高排周围的敌人有陈济棠的一个旅（一个团在安远县天心好对付高排，一个团在筠门岭攻打红二十师还有一个团在茶梓旅部设在安远县城），装备有轻重机枪、迫击炮；重石和天心还有土排的民团。形势险恶，斗争尖锐，给我们工作的开展带来重重困难。

毛主席微蹙眉头，继续说，“为了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保卫党中央，高排一定要配备足够的力量。昨晚省委已作了决定，准备将会昌县一级机关撤消。今后各个区委、区政府分别直接向省委、省政府请示报告。原来省委提出要省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长刘挺辛，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挺，财政部长谢 XX 三个部长中的一个去高排，他们都说没有经验，不愿意去……”听到这里，我为这些同志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不愿挺身而出感到痛心。我说：“省政府有许多部长，三个部长不去，其他部长也不去吗？经验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而是要在斗争中不断取得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饱含着信任的眼光，望着我频频首肯。我完全明白了毛主席来此的意思，不待他点破，就站起身来，坚定地对他说：“如果信任我，那就请主席派我去。”毛主席也站起来，双手按着我的两肩，深切地注视了我一会，连声说：“我信任你，我信任你，你去就好。”

为了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度过难关，我向毛主席提了三点要求。第一，高排每天需要一千五百斤米，要省苏维埃送一个月粮来；第二，拨三百块银元供买菜、买盐；第三；要省军区支援一万发子弹。毛主席说：“好！”但后除送了一千发翻造子弹（这种子弹打了退不出弹壳，卡在枪管里，故战士们都没有要，退了回去。）外，一粒粮、一块钱也没有送来，这是由于当时的环境确实十分困难。

我们就在这种处境下成立了粤赣省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主任由我担任，成员有秘书钟桂华、总务管理员王书安、机要员朱开铨、特派员刘××，委员赖鸿顺、刘景辉（兼高排区委书记）、刘德发、部海山、刘之义，保卫队长范喜标。端午节后的天，我们整好行装，向高排进发。

到了高排，事情确象我们意料的那样，非常棘手。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

四处造谣，搅得群众人心惶惶，不象过去那样支持我们了。我们不仅吃，用的东西一无所有，就连军事装备还不如敌人的一个民团，局面不知从哪里下手打开。

夜晚，我独自一人盘桓在屋内，心中猜测着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领导机关连续三次被敌人包围。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还是执行政策有偏差？我决定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把几天来调查研究的情况凑拢一块，进行分析，一比较，我们发现过去所采取的政策太左了。在社会政策上，过去我们采取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就逼得地主拼命；第二，在财政经济政策上，对地主、反革命罚了一次又一次款，对富农也多次征款。地主、富农只得逃跑，断绝了经济来源；第三，我们对商业经济采取了一种自杀政策，苏区的商人不准出去（怕给敌人透露消息），外边的商人也不准进苏区（怀疑他们来探消息），造成苏区的东西出不去，白去的东西进不来，自己封锁自己；第四，我们的干部政策，采取的不是鼓励、教育、提高的方针，而是有了一点错误、缺点，就扩大化，开会斗争，进行打击。再加上当时过左的肃反，今天怀疑这个书记与敌人有勾搭，明天怀疑那个乡主席与敌人有牵联。一怀疑就逮捕、拷打、杀害，弄得干部人人自危，无心工作。我们还调查了高排的圩场，原来有一百多家店铺，由于我们盲目怀疑，抓的抓，杀的杀，多数离开了高排，仅剩下四家。这些都说明过左的政策给我们的革命工作带来深重的危害。我们又摆了摆敌情，研究敌人进攻我们的时间，发现敌人以前三次进攻，都是在农历十五、十六的晚上两点多钟。敌人的企图一个是消灭我们的领导机关，再一个就是消灭独立营（独立营主要是对付安远方向的敌人，归粤赣军区指挥）。

我出了我们的工作、政策上的差错，摸清了敌人活动的规律，我们会安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紧密团结，分头在高排所属的高排、天心、水东三个区深入群众，开展耐心、细致的群众思想工作、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因为在高排经常受敌威胁，我们在高排圩中住了几天后就转移到南布村。那里物质条件虽好，条件虽好可是地形却不行，于是

我们选择了朱方围。朱方围后面的山势陡峭，树木苍郁，能坚持对敌斗争，敌人进攻时可以马上登山隐蔽。

时间转眼到了农历六月十五、十六，按照敌人的规律，又要进攻来了。我们会同独立营以及高排、天心、水东三个区的游击队，召集赤卫队的负责人商量如何对付敌人。敌人装备有轻重机枪、迫击枪，与他们硬拼是不行的。大家纷纷出点子、献主意。针对过去一开枪，就引起敌人的迫击炮、轻重机枪猛烈轰击，造成我方人员重大伤亡的教训，我们便决定打一次不开枪的仗，并且要打赢，要造成敌人的大量伤亡，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我们布置赤卫队，敌人来了不要阻挡，放他进来。每隔几里路设置一门敬菩萨的土炮，看见敌人在数里远的地方就打一炮，这样互相传递消息，有半个小时我们就能得知敌人来了。工作委员会还发动广大群众寻挖大块石头，砍伐松木，锯成圆筒，从会昌的朱方围一直到安远的官溪、老鸦石，在敌人必经之道的两旁险要山头，二十多里路上，埋伏着一千多名战士和干部群众，堆满了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和几百斤重的松树筒。我们就用这种土办法配合部队，对付武器弹药充足，气焰十分嚣张的敌人。

月夜，大地泻下一片银辉。薄雾象轻纱似地缭绕在茂盛的树林，弥漫在田野的上空。我们用藤条悬吊捆好松树筒，静等敌人的到来。虽然劳累了几日，有些疲乏，但一想到要消灭敌人，大家又斗志饱满，情绪激昂。

敌人用民团开路，广东军阀队伍殿后，大摇大摆地来了，看他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满不在乎的样子，根本没料到我“恭候”他们。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一齐动手，砍断藤条，让松树筒、大石头顺着山坡往下雷鸣般滚去，打得敌人哇哇乱叫，只听见底下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我们一干完即刻换一个地点继续战斗。敌人损失惨重，又摸不清我们藏匿暗处的情况，唯恐全被聚歼，无心恋战，胡乱朝砸石头、滚松树筒的方向放一阵枪炮，便急忙抬着尸体，败退回去了。天亮，我们下山察看只见一路血迹，沿途丢弃了许多子弹。

这一仗，敌人没占到任何便宜，而我们却无一伤亡，打败了敌人，保

住了高排，取得了胜利。我们进行了总结，认为这种打法是比较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今后我们还要发挥因地制宜的威力对付敌人。从此，敌人的反动气焰被压了下去，我们的士气大大提高。

战斗胜利后，我立即赶到省委向毛主席汇报。晚上九点钟见到他，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听完我的汇报后高兴地连声笑着说：“打得好，打得好。”我还在主席面前发牢骚埋怨省政府一个钱也不给，一颗粮也不送，逼得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主席望着我，满意地说：“这就好，革命本来就是逼出来的嘛。”一番话，立刻冰释了我心中的不满情绪。是呀，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有哪样是现成的条件等着我们呢？不都要靠自己去闯、去创造吗。毛主席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回答没有了。毛主席鞭策我继续干出成绩来，正欲离去，他又问我：“谁叫你回来的？”这下可把我问住了。谁也没叫我回来，是我自己赶来汇报的。主席听了立即认真地说：“你是那里的指挥员，没谁叫你回来你就擅自回来，今天晚上出了事怎么办？”我一听，汗都冒出来了，说：“我不懂得，过去我们是有困难就可以找上面汇报，这次我也没考虑许多，就跑来了。”听罢主席的话，我和通讯员连夜赶回了高排。第二天，我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主席，你对我的批评是对的。过去我不懂，现在知道了一个指挥员不能随便离开岗位。昨天晚上幸好高排没有出问题，今后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毛主席回信说：“认识到这问题就好，有什么事就派专人送信来。”

经过我们的努力，高排区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我们会安工作委会的成员经常分头到下面区里、游击队、独立营了解情况，鼓励斗志。一天，我和另一位干部、通讯员三人从老鸦石回高排，途中遇到一位小白脸年轻人。这人不买东西，不卖东西，又不象仲田的，引起我的警惕。我赶上他，拍拍他的肩问：“你是从哪来的，到这边有什么事？”他“喂喂喂”地不吱声。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照旧“喂喂喂”装哑巴。我想这人行迹鬼祟，不能轻易放走。便决定将他带回朱方围，交给特派员去弄清他的身份，并嘱咐不要打他。谁知两天两晚仍无任何结果。我又让裁判员去审问，

他还是装哑巴。莫非真是个哑巴？我仍不放心。这天，我想了个办法。买了半斤猪肉，一碗豆腐，切了一些毛芋，放了一两盐。早餐和中餐都没有给“哑巴”吃，也不给水他喝。直到晚上才把这些很咸的饭菜递给他。他饿了一天，狼吞虎咽地全部扒了下肚。随后我带了一壶水去，“哑巴”见了，“喂喂喂”地要喝水说，我对他说：“你不是哑巴，你把事情交代清楚，你要喝多少水都行。”他一个劲地装聋作哑，我不理睬他。天快亮时，我走进房间，趁那“哑巴”酣睡之际，朝他耳边狠劲扇了一巴掌。只听见“哎呦”一声，那“哑巴”情不自禁地发出声来。这下我非常高兴，他终于证明自己不是哑巴。我叫他坐起来，那年轻人愣了半天，坐起来说：“我要喝水。”我说：“喝水可以，交代三件事：第一，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第二，是谁派你来的？第三，你来的任务、目的是什么？”那年轻人聋拉着脑袋，交代了自己是天心圩敌人团部派来的。任务是到高排找饮食店老板。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个交通站。我追问他饮食店里藏有什么东西，他说在店的墙壁夹缝中藏有盐、钱、布匹。另外，他还交代了设在小龙口的一个交通站。我们立即赶往饮食店，搜出敌人隐蔽在那里的大批物资，破获了敌人暗藏的交通站。

担负着保卫南大门重任的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失陷后，撤至罗田、河墩一带，处境更为险恶。敌人进攻高排吃了亏，便集中兵力对付红二十二师，将驻守天心圩的一个团调至筠门岭。为了减轻二十二师所受的压力，大量消灭敌人，更加有效地保卫自己，我们会安工作委员会研究了下一步的战斗部署，决定选择时机，扩大战线，主动配合红二十二师，出击敌人。我们甄选了十几位本地可靠的干部、贫农团主任，每日假装挑米、豆子到天心圩去卖，侦察敌情。这天，派去侦察的两位同志得知天心圩的敌人只留下一个排，其余全部往筠门岭开拔，就一直尾随敌人。见到敌人宿营，立刻赶回来向我们报告。我想，敌人轻视我们，天心圩既然只留下那么一点敌人，这正是我们袭击的绝好机会。我当即召集独兑营连以上干部，高排、天心两个区游击队的队长开会，布置战斗任务。正当众口一词，赞成

袭击敌人的时候，独立营的政委，表亦不同意，说这是冒险，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我针对他说：要革命、要打仗就要担一定的风险，四平八稳的仗是没有的。战士把生命交给了我们，如果我们领导指挥得不好他们的生命就要白白丢掉。这次战斗我们摸清了敌人的情况。不是冒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心中急如火燎，政委仍不同意，战机万不能贻误呵。我斩钉截铁地作出决断：“独立营政委由我来兼，走！”我率领独立营，两个区的游击队、一个区保卫队共七百多人星夜奔赴天心圩。由于拖延了时间，我们到达天心圩，东方破晓。留守团部的敌人一个排闻风逃走了，民团二个排的武装也缩进了离圩数里远的土围子，不敢露面。我们占领了敌团邱缴获了几万斤粮食，一千多斤油，两千多斤盐。除此，还用对反革命分子及大地主的罚款买了几千斤盐。当天下午，我们就胜利地撤回到老鸦石了。

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物资，我们工作委员会就在高排建立贸易栈，以便发展苏区经济，沟通苏区和白区的贸易往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无钱可以用粮油等实物交换。我们还通知瑞金、会昌、于都到这里来买盐，一块钱三斤半，帮助一些地方解决了吃盐难、买盐贵的困难。

经过两次战斗，我们提高了士气，巩固了内部团结。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物质上缴获了敌人一大批给养，补给了自己，方便了群众；军事上我们不断骚扰敌人，使之不能有效地进攻红二十二师，而自己无一伤亡，为配合红一十一师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做出了贡献。

会安工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打开了局面，使高排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八月至九月份，这里的形势天天好起来，吃用的东西及其他物品完全自给自余。书记刘晓、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以及粤赣省军区的负责同志都先后到过这里，对我们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抗日救国，红军不得跟着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受中央之调令，离开高排，跟着毛主席，加入了长征的伟大行列，胜利

前进。

摘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回忆查田运动

朱开铨

毛主席逝世的那些日子里，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毛主席一九三三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八县贫农团代表会上讲话的照片，我见到后感到十分亲切，它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四十多年前在瑞叶坪开会的会场里，使我又回想起毛主席当年亲自带领我们开展查田运动的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苏区人民热烈欢庆粉碎国民党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不久在红都——瑞金又迎来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会上庄严宣告中国第一个工农兵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当时党中央正处于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之下，他们否认革命处于低潮，轻视和污蔑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热心城市工人罢工斗争和攻占中心城市，以实现他们所想象的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毛泽东同志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一九三二年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夺了他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领导权。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又开始发动了第四次革命“围剿”，形势变得逐渐严重起来。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担任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主席，而云集区叶坪乡正是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的所在地。当时云集区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工作起来困难很多。在一九二二年红五月的扩军运动中，有两万八千多人的云集区仅扩充到九名红军。上级下达的其它任务完成的也不好。从这年四月到十月，云集区换了四个区委书记，十一月份上级让我兼任区委书记，自己的担子就更重了。

为什么云集区的工作推不动呢？我到下面去开会摸摸情况，人总是不齐，就是来了也很少发言。后来，我下乡就不开会了，而是找些成份好

历史清楚工作又积极的党团员个别谈话，慢慢地大家才把心里话讲给我，原来大家对一九三〇年和三一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一九三〇年六月那次分田，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还是三等田，而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这年年底政权丧失后，穷人连分得的坏田也失掉了。一九三一年三月政权重新恢复后，六月份又进行了一次分田，群众反映跟上次一样。我从积极分子那里还了解到，有些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混进了区、乡的党、政组织，掌握了一部分大权。那些隐瞒起来的地主、富农经常写诬告信，对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打击陷害。这些人自己有文化，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写状子，有的人还出钱雇人写。写好状子，他们又利用同族同姓收买拉拢一些人在状纸上签名盖章。更可恨的是，那富人还请人私刻好多图章，有的老表被他们私刻图章盖在状纸上本人还不知道。当时中央有个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局长是陈紫峰，在苏区设很多控告箱。控告局接到状子，认为这是“民意”，不。做调查就乱处理，使一些积极分子受到了迫害。叶坪乡前两任乡主席就是因为得罪了地主、富农，一个被冤杀了，一个被撤职查办了。当时还了解到有些一主富农正在策划写信控告叶坪乡新任乡主席朱先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分子和群众不敢讲话，不敢做事，动荡不安。

我感到这些问题很严重，应该解决，而自己又无法解决是，我到县委去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在问题不得解决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很沉重又很着急，觉得这样下去不知又会有多少党的好干部，积极分子遭到迫害。怎么办呢？最后，我想到去找毛主席。

毛主席在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后，有一段时间在汀洲养病。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有个与毛主席住同村的积极分子告诉我说，毛主席已从汀洲回到了叶坪乡陂区村。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心想这回可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可又一想，怎样才能见到毛主席呢？毛主席能够见我一个普通的区干部吗？能够听我讲一个区的情况吗？去找毛主席下边的人会不会把

我挡回来？这一系列的问题又产生了。想来想去，感到要解决问题我非得找毛主席不可，先写封信试试看。

我家祖辈没有人念过书，我靠人家帮助读过两年私塾，会写几个字。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区政府办公室里写了信。

“敬爱的毛主席，你好！我到云集区当苏维埃主席已经十个月了，什么工作都开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分田不合理，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问题长期不得解决。本来我应向毛主席写个书面报告，但是因为我文化水平太低，想向您口头汇报，不知毛主席时间是否方便？请批示。此致，敬礼！，信写好后交给通讯员小曾，让他送去。他听说信是送给毛主席的，就瞪大眼睛问我：

“这样高的领导，怎么送法？”

是啊，怎么送呢？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到中央政府总务厅找袁科长，请他带你去。”

毛主席住的地方距离我们区政府只有三里多路，小曾走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回来了。我急忙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说：“没有见到毛主席。听袁科长讲，毛主席昨天晚上工作了一夜，正在休息，信由他转交。”会不会有回信呢？什么时间才能回信呢？这些问题又挤入我的脑海。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看积极分子送来的调查材料，听到有人突然喊“报告”，我急忙起身开门，进来一位红军战士，送来了毛主席给我的回信，我真是喜出望外。毛主席要我第二天下午三点到他办公室去。我真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快就回了我的信，还要马上听汇报。我的心里乐开了花，云集区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二月十五日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快步来到陂区村。毛主席住在一幢村堂里，我走进房间时，他正在埋头看文件。我见他身穿一套旧灰布干部服，脚穿一双黑布鞋，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一把木制靠背椅和几条长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堆满书籍的书架，几个书箱和二铁制文件箱。我的脚步声惊动了毛主席，他见我来了、放下文件站起了身。

我赶紧站直身体向毛主席敬个礼，然后跨前两步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说：“主席，你好！”

毛主席连声答道：“好，好！”主席让我坐下。

我坐下后，望着毛主席，此时此刻有多少要说的话一下子都卡住了。毛主席看出我有些紧张，便不慌不忙地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一边划火柴，一边先开口说：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吧？”

“收到了。”毛主席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我说话才渐渐自然了。我接着说：“我文化低，不会写报告，想做口头汇报。”

毛主席说：“可以，可以。”

我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云集区概况。云集区东西长四十华里，南北宽三十华里，有九个乡，四千一百多户，两万八千多人，其中地主九十户，富农一百三十户。我还把土地、物产、群众生活情况等都一一做了汇报。

毛主席问我：“为什么工作开展不起来？”

我说：“群众反映三〇年六月分田不合理，穷人分得少，离村远，大多是三等田。而隐瞒成份的富人分得田多，离村近，都是好田。三一年六月第二次分田与三〇年分田一样不合理，群众意见较大，又长期不得解决。”我还汇报了有些能说会写的地主，富农混进党支部、乡政府，贫农团、赤卫军，掌了权，这是群众发动不起来工作不好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主席说：“你们云集区的区委书记是谁？”

“从三二年四月以来云集区共换了五个区委书记。他们是杨衍槐、曾海堂、谢仁良、钟吉林，从三二年十一月由我兼任区委书记。”

毛主席又问：“云集区九个乡，哪个乡的工作最难开展？”

“叶坪乡最难开展。”我回答说，“叶坪乡前两任乡主席，第一任叫刘善隆，被人控告，后来以贪污罪被处以死刑。第二任乡主席刘XX，也被控告乱打土豪，结果被撤职查办了。第三任乡主席就是现在的朱先琪，是个雇农，人比较好，因为害怕控告不敢大胆工作。”

毛主席问：“控告的都是什么人？都往哪里控告？”

“控告的多是地主、高利贷者的亲友，或者是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公开的地主、富农不出面控告。他们多数都告到中央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陈紫峰那里。”

毛主席又问：“各乡是否都有积极分子小组？都有多少积极分子？”

“各乡都有积极分子小组，一、二、三乡各有五个积极分子，四、五、六、七、八、九乡各有四个，共有积极分子三十九人。”

毛主席问：“叶坪乡有哪几个积极分子？”

“叶坪乡的积极分子是朱先祺、谢标、朱先和和曾守辉四人。毛主席还问到云集区有哪些剥削形式，如何划分的地主等等。对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静静地听不时地点火吸烟，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

毛主席听完我的汇报后，肯定我的汇报有调查，有分析，也提出了问题。最后他把问题归结为三点：第一，三〇年和三一年两次分田是和平分田，土地革命不彻底；第二，主要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去斗争地主；第三，基于前两点使得一些地主、富农分子隐蔽下来，有的还混进了党、政、群众团体中来，混进贫农、中农队伍中来，造成阶级阵线的不清，干部队伍的不纯。毛主席气愤地说，阶级敌人控告积极分子就是向革命队伍进攻。毛主席最后表示：这些严重问题必须解决。并要我回去后把三十九名积极分子召集起来，第二天下午六点钟他要亲自到我们区政府听他们的汇报。我听了后高兴地说“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

我在赶回区政麟路上，感到心胸开扩多了，三步并做两步走。到区政府后，我连饭都没有吃，急忙找了几位可靠同志，让他们马上到各乡去通知积极分子，第二天到区里来开会。

二月十六日按照分工区委财政部长胡会湛负责欢迎工作，特派员骆春辉，裁判部长熊永松、军事部长谢成永负责主席的保卫工作。为了做好准

备，有些同志在整理汇报材料，有的同志在布置会场。开会的厅堂被打扫的干干净净，桌椅被擦饰一新，连主席要走过的街道也打扫一遍。下午五点多钟，各乡的积极分子早已来到，大家聚集在区政府门口欢迎毛主席。我一个人准备到陂区村去接毛主席，刚走出一里多路就看到毛主席已经迎面走来了，后面跟着几位战士。待走近后，我给毛主席敬个礼。毛主席微笑着问我：“开会的同志都到了吗？”

我说：“都到了。”

毛主席说：“好！我们快些走吧。”

等在区委门口的同志们见毛主席过来后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一边向大家鼓掌招手，一边笑着问同志们好。

汇报会由我主持。我说，毛主席在百忙中到我们区委来检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这时大家又站起来热烈鼓掌，表示对主席的欢迎和爱戴。主席向大家招手，要大家坐下。

第一乡的谢世煌、朱开机两人先汇报，他们说已查出该乡有三家漏划地主，还有八、九家需要进一步调查。他们感到积极分子太少。还谈到该乡有些坏人很猖狂，私刻很多图章，向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诬告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已经查出前云集区区委书记杨衍槐，共产党员杨省三等人就私刻了一百多人的图章。

第二乡的胡会湛汇报已查出有三户是漏划的地主、富农，还有十户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个乡有个叫黄道文的地主分子已经混入党内，与一乡的杨省三经常在一起干坏事。

第三乡的宋自发、钟文波汇报说，该乡的乡主席谢瑞兰就是个地主，还可能是国民党员，他对我们是个大障碍大威胁，积极分子队伍难建立，群众工作难开展。

毛主席说，混进党政机构里的坏人不少，工作开展不起来的障碍就在这里。有些人可以先撤销他们的职务，查清他们做的坏事之后再做处理。诬告积极分子就是反革命破坏活动，该逮捕的逮捕，该法办的法办。

其它各乡的积极分子有的揭发了区政府教育部长朱云龙是地主，有的揭发区工农检察部长刘麟三有问题，他们在下边破坏区委领导，谩骂积极分子是“流氓小组”，还去找陈紫峰共同打击积极分子。有的还揭发少共区委书记周邦仁也是地主。这些乡也都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

会议从下午六点一直开到深夜两点，毛主席认真地听了大家的汇报，感到满意。毛主席对隐藏在区、乡党政组织中的坏人的调查情况特别重视。对叶坪乡的情况询问的最详细。最后毛主席讲了话，肯定大家情况了解的具体，汇报得很好。他要求大家抓紧办好三件事：第一，要扩大和组织积极分子的队伍，每个乡要从现有的四、五人扩大到二、三十人，这样就可以带动全乡的群众。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地调查、核实地主、富农的罪行材料，已经查清楚的，要整理好材料，还不太清楚的要抓紧调查核实。第三，要做好广泛发动群众工作，要让群众自己起来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揭发地主、富农的罪行。毛主席说，你们先搞十天，过十天我再来听你们的汇报，相信大家一定会作出成绩。

会议虽然开的很晚，但到会的同志没有丝毫的倦意。当大家起身送毛主席的时候，主席说：“大家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大家还是送出一里多路才止步，望着毛主席的高大身躯在，灯亮光的照耀下远远离去……”。大家谁也不想睡觉，又不约而同的回到区委研究了如何贯彻毛主席的三点指示，当散会的时候天色已经发白。

会后，我们区委派了一些可靠的同志到各乡去帮助工作，各乡的积极分子听了毛主席的话，劲头很足，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进一步扩大了积极分子队伍，批评分田中存在的合理现象，揭露坏人的罪行。四、五天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乡积极分子队伍一般都达到十人左右，有些漏划的地主、富农得到了核实，他们的嚣张气焰也有所收敛。有些地主分子害怕了，给积极分子送礼，遭到拒绝。控告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事情少了。总之，形势很好。

在毛主席听取汇报后的六天，我第二次向他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毛主席听过后高兴地点点头，并让我提醒大家，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大的斗争还在后面。

二月二十六日傍晚，毛主席在检查完其它区的工作后第二次来到我们区政府，街道两旁早已聚集了欢迎的群众，有些老年人说：“这么高的领导人会来到我们这里，真是想不到啊！”

在会场上，毛主席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摆情况，提问题，到会的积极分子比上次多了五、六倍，很是高兴。毛主席在听汇报过程中，时而插话，时而记录，最后又做了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这次正式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他解释说，“查田”不是到田里去丈量有多少亩田，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众团体里的坏人检举出来，不管这些人是混进乡苏维埃里，还是混进区的、县的苏维埃里，都要查出来。要搞清楚他们的剥削情况，核实好他们的罪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毛主席告诉我们，真正打倒封建势力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还要打破房界、姓界，要反对包庇破坏活动，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只有斗争取得了胜利，才能做到合理分田。毛主席还指出，要把查田运动、检举运动搞好，就要组织革命力量，要依靠积极分子，要依靠贫农团。现在各乡都有十几个，二十来个积极分子，这很好，还要在斗争中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队伍。

毛主席针对积极分子初步发动起来以后出现的某些过激情绪指出，有些人偶然有点剥削，不能算富农。三〇年以前连续剥削三年以上者，算剥削者。管祠堂和公堂时间在一年左右的，不算剥削。我们要团结中农，对中、小工商业者要注意保护。毛主席还指出，消灭地主，是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封建剥削，不是消灭人。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是不对的。地主也要分给田地，让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毛主席肯定了大家已经做了四件事：第一，初步发动了群众；第二，

扩大了积极分子队伍；第三，各乡都初步调查清楚一些漏划的地主、富农情况，叶坪乡查清十五户，其它各乡也都有十来户；第四，反革命破坏活动开始压下去了。毛主席赞扬大家工作有了很大成绩，并要大家继续努力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公开地开展群众性的揭发检举斗争，要把封建势力、半封建势力斗倒。毛主席还要大家在合理分田的基础上把生产搞好，把工作搞好，纯洁党政组织，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革命战争，要把我们各个乡变成模范乡。

毛主席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力，说得大家眉开眼笑。虽然会开的比上次还晚，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最后毛主席宣布自己要亲自在叶坪乡搞查田运动试点，并且要组织些力量来帮助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争取三月份搞完，不影响春耕。会场上顿时情绪沸腾，叶坪乡的积极分子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其它乡的积极分子都说：“叶坪乡享福啦，毛主席亲自蹲点。”

散会后，积极分子们还有好多话向毛主席倾吐，恋恋不舍。毛主席越走越远，照路的灯火越来越小了，但是毛主席点燃在人们心中的革命火种，却越烧越旺，越烧越明。

二月二十八日，我到毛主席办公室汇报工作，毛主席告诉我从三月二日起派罗境瑞同志带领七十多人的工作团到云集区一、二两乡帮助开展查田运动，他亲自到叶坪乡，同时决定由我们区委组织力量到第三乡，其它五个乡由各乡自己先搞，待一、二、三、四乡搞的差不多了再抽调力量帮助去搞。为了把情况搞确实，把材料搞准确，更好地掌握政策，区委决定各乡要成立查田委员会。乡查田委员会可以划定地主、富农成份，要报经区委批准以后才能公布。捕人也要由查田委员会决定，报区委批准后执行。查田委员会由七至十一人组成，成员在积极分子中选拔。毛主席对我们区委的这些意见表示同意。

三月初，各乡的积极分子把调查核实的漏划的地主、富农材料在群众中公布，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斗争。工作团的同志在运动中注

意打消因红军与白军交错在某些群众中产生的顾虑，动员那些借钱、借债的贫苦农民克服房界、姓界的落后意识，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剥削罪行，跟他们作斗争。各乡在斗争中逐渐扩大积极分子队伍，逐渐形成了以贫农团为骨干的斗争力量，都相继选举产生了查田委员会，查田运动和检举运动在云集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主席在叶坪乡亲自到陂区村、庙背村、洗山堂等自然村找群众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常把各乡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对一些重要问题随时给予指示，我又及时把这些指示传达贯彻到各乡工作中去。这期间我几乎每两三天都能见到一次毛主席，亲耳倾听他的教导。我时常见到毛主席通宵达旦地工作，直到天明后才稍事休息。他的脸比较消瘦但精神很好。

毛主席要我们及时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的过“左”情绪，要我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不要害怕。他打个比方说，张三是中农，群众要划他富农，李四跟他一样，划了张三那么李四也就害怕了。毛主席说：“一定要注意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我们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让地主、富农混入贫农团是有害的，将自己的人划到敌人方面去同样是有危害的。”对于地主兼中小工商业者，毛主席主张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反对把工商业都一概没收的做法。他说，我们做干部的就是要随时了解情况和注意掌握政策。在群众对党的政策有某些不理解的时候，一方面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做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接受并争取掌握党的政策，这样查田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毛主席对各乡在查田运动中在纯洁组织的基础上发挥了贫农团的作用很重视。各乡注意把优秀的积极分子安排为贫农团的骨干，封建地主的房屋财产要盖贫农团的印，捕人也是贫农团出面，查田委员会的一些工作逐渐地都由贫农团干了。毛主席肯定了这样做很好。而毛主席对叶坪乡蹲点，就是在查田运动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把积极分子逐步充实到党政、赤卫军、少先队各组织中去，使贫农团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并健全了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意见传达到各乡以后，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叶坪乡的运动只用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全区的运动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在运动中纯洁了党、政、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组织，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敢于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骨干力量。全区积极分子最后达到三百六十多人。这些积极分子斗争坚决，懂政策，守纪律。他们在查田斗争中不包庇地主、富农，旗帜鲜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严格按照政策办事；对从地主家没收来的“浮财”不入个人腰包，大公无私，合理分配。他们有革命的觉悟，懂得斗争的艺术，后来很多人被毛主席送到苏维埃大学去学习了，更多的人参加了红军，为革命输送了新鲜血液。

经过清查，叶坪乡查出了二十八家地主、富农，连同原来的四家共三十二家，一乡的积极分子查出原云集区区委书记杨衍槐是地主，三乡查出乡主席谢瑞兰也是地主，查出区政府教育部长朱云龙是地主，同时还查出他们利用职权包庇其它地主的罪行。全区共查出地主九十一家，富农二十三家，没收地主土地二百一十亩，征收富农土地四十多亩，准备重新分给三一年分田得不合理的贫农。全区逮捕了六十多人，一乡杀了八个反动地主分子，二乡杀了一个反动地主分子，其它各乡都没有杀人。

当毛主席知道了全区查田运动的这些成果后，非常高兴。他问到，为什么一乡杀了八个人？

我说：“被杀的人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一乡的反动地主分子私刻了一百六十多人的印章，诬告了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是这次查田运动使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得救了。”

毛主席又问：“杀的人经过批准没有？群众反应如何？”

我说：“是经过乡查田委员会报到区委，区委批准后才能捕人，是由贫农团执行的。要杀的人，由区裁判部报县裁判部，再报送中央最高法庭批准的。群众都说杀得好。”

毛主席说：“那就好了！”

通过查田运动，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革命的热情大大激发出来了。有这样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四月的一天，毛主席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封信，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有事商量。我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主席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现在库存的粮食不多，吃不到新粮下来，让我们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三升米。云集区有两万八千多人，就可节约八百四十多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我回到区里后进行了传达动员，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出号召，家家捐献，人人出粮，三天之内共捐出一千多担，超过了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在云集区的模范作卿动下，全县其它人个区二十九万人民短时间内就巧九千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成了著名的“三升米运动”。

再一件事，是每年“红五月”都要扩大红军。在快到五月的时候，毛主席把我找到他那里去（这时主席已搬到沙洲坝去住了）他说，去年云集区红五月只扩大了九名红军，今年红五月能扩大多少？

我们区委已经有个估计，我把动员和估计的情况做了汇报。我说：“四百人有把握”。

毛主席说，四百人数字不算小啦，要做好思想工作。他还说，瑞金县要动员二千五百名，县政府负责人说动员不到这么多。

在县政府召开的扩红动员会上，有的区连一百名的扩红指标也不敢承担。毛主席听我讲了云集区动员扩红情况，然后毛主席在会上讲了扩大红军对于打败敌人反革命“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他说，瑞金要扩大两千多名红军，云集区承担了四百名，你们别的区承担二百名行不行？又过了几天，我把云集区。经过动员后可以扩大红军八百，的数字报到县里。县裁判部长说，不要讲大话。我说，你们还不了解查田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结果，云集区共扩大红军一千零二十名。

毛主席亲自对云集区的查田运动做了总结，指出这个运动成绩很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培养了一百多名积极分子和干部，肃清了封建势力和半封建势力，纯洁了党、政团组织，划清了阶级阵线，巩固了苏维埃

政权，解决了三〇和三一年分田不合理的现象，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加强了经济建设，支援了革命战争。毛主席还对云集区查田运动中的政策、方法、经验，做了总结。并称赞云集区成了模范。

为了把云集区的查田运动经验推向全苏区，一九三三年六月份毛主席亲自主持在叶坪相继召开两个大会，一个是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一个是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出席前一个会的是石城、宁化、长汀、会昌、瑞金、雩都、宁都、胜利八个县的县、区苏维埃主席和区特派员，约四百人。出席后一个会的是八县贫农团的骨干近千人。在这两个大会上毛主席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介绍了云集区查田运动的情况、成果和经验，肯定了查田运动的伟大意义，讲清了查田运动的政策、方法，布置了在八县开展查田运动的任务。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查田运动的开展对于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保证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讲话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说明我们自己应走的武装割据道路的时候，时而很有风趣地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那套做法给予讽刺，使大家很受教育。这两次会上，毛主席都让我坐在主席台上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在八县贫农团代表会结束的那天下午，在叶坪召开了有几万群众参加庆祝石集区查田运动胜利和在八县开展查田运动的誓师大会，会上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讲了话。前不久在这里曾召开过欢迎宁都起义部队的大会，可是这次的大会盛况包括出席人数之多，群众情绪之热烈都超过那次大会和在这里召开的其它的一些大会。

这次会后，中央组织了五、六百人的工作团到其它七个县开展查田运动，从云集区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积极分子在本县（瑞金）其它八个区开展查田运动。一个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的高潮迅速在中央苏区形成。

选自《革命回忆录 5》P14——30：毛泽东带领我们开展查田运动，人民出版社。

长征路上：湘江、遵义会议

向湘江前进。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匪帮急忙调派四十万兵力，三路追击堵截：一路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湖南军阀何健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全县一带，沿湘江布防；一路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集中于兴安、灌阳一带布防；一路为国民党中央军和湖南军阀部队，分别跟在红军的后面追击。李宗仁、白崇禧怕红军进入广西其老巢，自动放弃兴安、灌阳一带防线，将兵力南移富川、贺县、恭城一带。红军在 11 月下旬顺利到达湘江东岸。

11 月 29 日，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的湘江东岸与白崇禧、何健、薛岳之部激战一星期，打败了敌军，但红军损失惨重。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领导结果。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领导越来越不满，要求改变领导。湘江战役，这种要求到了顶点。

12 月上旬，红军攻占湖南边境通道城。军委在通道城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二方面军）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为大多数同志赞同。

此时，蒋介石匪帮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若不放弃原来计划，势必与五、六倍于我的敌决战。长征以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了逃跑主义的方法，处于极端被动状态，而又硬拼硬打，夺路突围，部队损员很大，又得不到休整，战斗力空前减弱。若采用正面对顶的办法和优势敌人打硬仗，势必有很大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改变方针，挽救了中国红军的前途。

12 月 14 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进行了整编。攻战黎平以后，红军又相继攻克了锦屏、剑河、台拱、镇远、

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

12月29日，毛泽东同志到黄平的猴场，到军委会开会研究抢渡乌江，攻克遵义，桐梓问题。

1935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渡过乌江，红军一军团第二师任抢渡乌江、攻遵义、桐梓先头师任务。1日，我军佯作架桥，吸引敌人火力，2日，进行第一次强渡，未成，后偷渡，因水流过急没有成功。3日，强渡成功，我22名勇士占领渡口，顽强抗击敌人增援，大军源源渡过乌江。

1月5日，遵义解放。毛泽东同志到遵义（贵州第二大城市）。

1月6日，遵义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伟大胜利，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遵义县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七人组成，委员名单，罗梓铭、毛泽民、丁伯林、周兴、陈云州、任移（遵义中学教员、当地人）、朱开铨，六人是长征干部，在一星期后，遵义工厂里来了一位做工人工作的，名叫邓金山，不是革命委员，因在当地工厂是有名望的人，给他副主席。

在1月6日群众大会上通过的七名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分工如下：罗梓铭任主席、毛泽民任人民财委会主任、丁伯林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周兴任人民肃反委员会主任、陈云州任工会委员会主任、任移任文化委员会主任、朱开铨任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

遵义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一）保卫中央会议安全。（二）保证遵义附近所驻各单位红军部队机关的充足供应。（三）保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

各委员会自己计划，保证完成各自的任务。

毛泽民：筹款，收集资财。

丁伯林：市内有良好的社会秩序。

周兴：在市内捕捉隐藏的反革命，特务分子陈云州：担任市内工厂和其他工人的调查工作，组织他们协助丁、周两个委员会工作。

任移：做好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红军伟大胜利、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工人、农民痛苦等。

朱开铨：土地人民委员，发动群众。宣传解放工人农民的痛苦。在遵义近郊封存发放了四仓谷，接受了群众一致要求到晚上七点到九点发食谷或打土豪。在城内打了两家土豪，都是晚上八九点钟打的。因为来仓库背谷的和到城内打土豪的群众多在十点左右来。群众不愿公开在城内没收土豪的东西财物。我们还有队伍在路上巡逻。

遵义革命委员会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比如：财委取得工人、农民、学生的帮助，筹到大批的款，主要是大烟土和其他贵重物品等。

武装人民委员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使反革命远跑，不敢在城镇扎营，社会治安良好。

肃反委员会得到广大群众支持，使反革命特务分子部分被捕，后使其部分逃跑城外。

工人开始不活动，以后邓金山安排了副主席，工人运动活跃起来。

文化委员会一直是很活跃的，十多天有 20 多人参加各个委员会，作用很大。

回忆与缅怀

回忆与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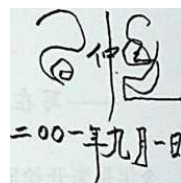
——写在朱开铨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

今年是朱开铨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日，我十分怀念开铨同志。我和开铨同志相识，已将近六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我就和他在陕甘宁边区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在当时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相交相知，情谊甚笃。

开铨同志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加入党组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在他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巡视员；陕甘省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巡视团主任等。他的一生严格体现了个人服从组织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一个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凡是和开铨同志接触过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对同志、对群众，他是一个敞开心怀的受人信赖的人；对事业、对工作，他又是一个不断求索、唯独不考虑自己的人。他的一生确实可以写照为：一身肝胆德高望重，百年奋斗鞠躬尽瘁，是一个赤心耿耿，壮心不已的老战士。

展望新世纪，我为有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而深感欣慰。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阐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

开铨同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胜利实现。



二〇〇一年九月一日

《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序

我和开铨同志相识，已将近六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我就和他在陕甘宁边区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在当时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相交相知，情谊甚笃。

开铨同志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加入查组织的老二辈共产党员。在他六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陕甘雀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巡视团主任等。他的一生严格体现了个人服从组织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一个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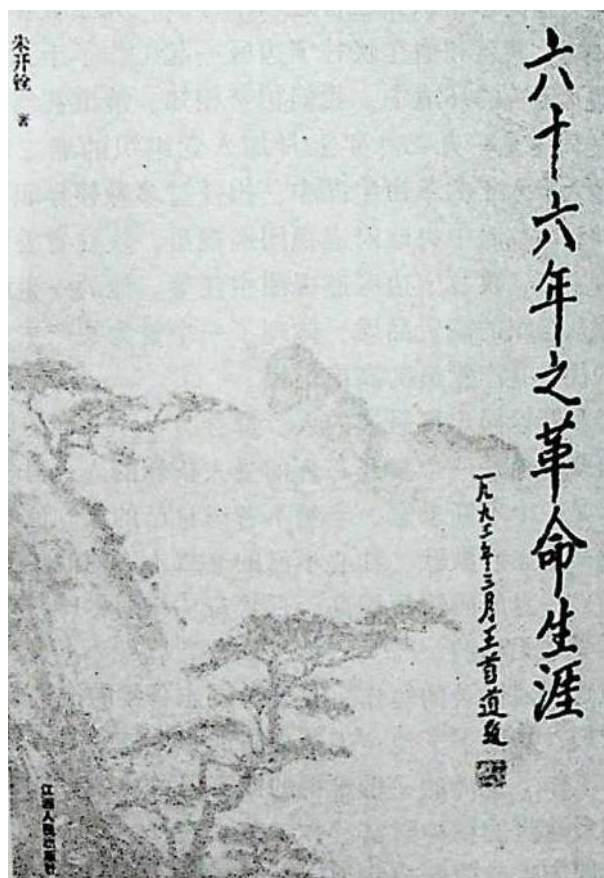
凡是和开铨同志接触过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对同志对群众，他是一个敞开心怀的受人依赖的人；对事业对工作，他又是一个不断求索、唯独不考虑自己的人。他享年九十二岁，是一个赤心耿耿、壮心不已的老战士。他的一生确实可以写照为：一身肝胆望重德高，百年奋斗鞠躬尽瘁。对此，开铨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完成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是开铨同志暮年的一个心愿。他离开了我们，却留下了他一生革命生涯和千百个老战友同他并肩战斗、工作、生活的一份难得的翔实记录，这是开铨同志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开铨同志生前曾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序，但未及出版他却与世长辞了。我写这篇短文，既是为这本书作序，也是我对于开铨同志的哀思和深切怀念。

习仲勋

一九九三年七月



王首道同志为朱开铨同志回忆录题写的书名。

纪念朱开铨伯伯

刘力贞张光

欣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主办的“江西党史资料”要为朱开铨伯伯出专辑。我趁此时写文，表达对朱开铨伯伯的崇敬之意。

朱开铨伯伯是优秀的江西儿女，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老前辈，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党的高级干部。从他的故乡江西瑞金参加革命开始六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正如习仲勋叔叔在为朱开铨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作序时评价他为“一身肝胆望重德高，百年奋斗鞠躬尽瘁”。

朱开铨伯伯 1926 年在江西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历经六十六年，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在瑞金中央苏区担任过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

部长，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长征中他担任中革军委五局特派员，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1935年，毛主席亲自指派他筹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并担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后担任主席兼土地部长、裁判部长、省政府党团书记、省委七个委员之一。1936年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裁判部部长。西安事变之后，红军驻西峰镇办事处主任。1937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七大候补代表。为巩固建设西北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6年5月26日在陕甘宁省，朱开铨伯伯和罗培兰姨姨经组织介绍结为夫妻。罗培兰姨是1933年10月参加红26军的，同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母亲同桂荣在写给江西省委组织部的一封信中写到：“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抄了我家，习仲勋同志派红军把我们全家接到陕甘边南梁根据地。从此我与女儿刘力贞就在红军队伍里，我在苏维埃政府参加后勤工作，领导当地妇女为红军做被服。仲勋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志丹同志是红军总指挥。罗培兰同志也是34年到南梁根据地的，她当时只有16岁，很能干，是苏维埃政府妇女代表，相当现在妇联主席。我们关系密切，经常睡在一条炕上，我把她当妹妹看待，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我们也住在一个院子”。到延安后，我们同住一排窑洞，习仲勋叔叔家也住在那里。我和朱洵（春麟）在延安保小学习，朱明（庆阳）、（延津）住在这排窑洞时就认识了，他们称母亲为“大姨”。到1934年陕甘根据地肃反受到王明左倾路线影响，进行肃反，因她是从外面来的，要抓罗培兰姨姨，母亲站出来说：“以后你跟我睡，谁想抓你，要先通过抓我再抓你，看谁还敢动你。”这样保护了罗培兰姨。

从1934年南梁陕甘根据地到1937年延安边区政府一排窑洞居住，至全国解放，开铨伯伯培兰姨姨先后认识我们父亲（刘志丹同志于1936年4月东征时牺牲于山西三交镇）、母亲、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朱开铨伯伯那种一身正气、实事求是的真正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弘

扬传承下去。

朱开铨伯伯六十六年的革命生涯，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前年江西省政协给我们寄来邀请函到江西省瑞金市参加开铨伯伯的回忆录赠书仪式。因当时身体原因未去，特发函祝贺。他的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翔实的记录了朱开铨伯伯从1926年参加革命，在瑞金参加反围剿，投身苏区政权建设，踏上长征路，胜利到达陕甘，建设陕甘宁边区，全国解放后回到江西工作至离体的点点滴滴，都寄托了朱开铨伯伯对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寄托了他对两个根据地老战友的革命战斗情谊。

现在回忆朱开铨伯伯的一言一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忠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实事求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和高尚情操。这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弘扬。我母亲健在时给朱伯伯、罗姨姨的回信中写到“新年后接到您们的来信，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使我们深切感到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革命友情是多么的深，是多么令人怀念，我们全家人衷心感谢你们的关怀……”。

壮丽征程前仆后继，宏伟事业薪火相传。

今天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把伟大的“苏区精神”和“南梁精神”发扬光大。

我们将以朱开铨伯伯对党对革命的炽热的情感为动力，追思和学习包括我们的父亲刘志丹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风范，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努力奋斗。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刘力贞是刘志丹、同桂荣同志之女（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

张光同志是刘力贞同志的爱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八十年代任《陕西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浅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衔接问题

朱春宁杨斌朱瑞华

在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75 周年之际，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厅）字（2008）21 号文件精神，朱开铃和罗培兰同志的后代与朱开绘同志生前的秘书杨斌同志一起，共同座谈朱开铨、罗培兰生前讲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成建制编入陕甘边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过，现将他们的这段亲身经历整理如下。

1935 年 9 月 18 日，中央红军攻占了甘肃省的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有一块刘志丹开创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就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立刻发现 9 月中旬刚成立的陕甘晋省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 26 军搞肃反扩大化，不顾敌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严重军事危机，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并已错杀 200 余人，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人心惶惶，各级政权机构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已经形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块土地革命战争中唯一仅存的根据地已陷入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之中。

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依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下决心打一个大的歼灭战，从军事上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保卫和进一步巩固这个全国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解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外部军事危机。

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内部政治危机则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从实际上解除左倾教条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1935年10月21日，毛主席命令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打垮尾追的马匪骑兵部队。战斗结束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即派曾在他身边担任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的王首道同志率中央红军一个连赶往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保卫局，及时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

1935年10月22日，党中央决定撤消极力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陕甘晋省，同时成立陕甘省和陕北区以及关中和神府特区。这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

毛主席提议，派曾在他身边担任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的朱开铨同志，担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中共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土地裁判部长，负责筹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持陕甘省政府工作，接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辖区域的政府机构，将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序列；组建陕甘省支前工作团，迅速开展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配合红一方面军打败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0月23日，中央红军行进至陕西甘泉县下寺湾时，毛主席派王观澜同志在路旁守候朱开铨同志，向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王观澜同志强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陕甘边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是关系到反围剿战略全局的决定性战役，要组织和动员陕甘边根据地的全部力量打一个大胜仗，中央红军才能在陕甘边根据地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第二次派朱开铨同志在危急的关头（注1），接管负责人被搞掉了的根据地的政权机构，重建领导机关，收编当地干部，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反围剿军事斗争。

1935年10月24日，朱开铨同志率从中央红军配属的警卫部队，到达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当地干部王生玉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总共只有八个人，在三孔窑洞里办公与居住，还不如中央苏区一个乡

政府的规模，凭这种现状难以承担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给陕甘省的战勤任务。朱开铨同志向王生玉同志转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要陕甘省迅速开展直罗镇战役战勤工作，组建支前工作团，首先要保障供给红一方面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五千人的每日粮草供应，在 15 天内筹足一个月的粮草随时调用，还要组织和动员战区群众支前参战，组成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转运粮食、弹药和伤员。王生玉同志面有难色的说：“我原来是硝皮工人，没有做过这些工作。”朱开铨同志又问：“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哪些同志负责供给红 26 军钱粮工作？”王生玉同志答：“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马锡五同志、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同志。”朱开铨同志说：“你要尽快把他们找回来。”王生玉同志说：“陕甘晋省成立之后，在我们陕甘边搞肃反抓了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还有一些干部到游击队帮助筹粮筹款就联系不上了，现在要找到马锡五和杨玉亭同志很困难，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军令如山，时间紧迫，只有找回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把他们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尽快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筹建陕甘省政府，才能迅速组建陕甘省支前工作团，有效地开展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朱开铨同志把中央红军带来的警卫队和干部分成小组，除执行勤务的人员外，都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六军是一家，已经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命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宣布撤消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区；中央红军将和红二十六军并肩作战，保卫陕甘边的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打败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副主席是中央红军来的朱开铨同志，欢迎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回来继续工作。有几个中央红军的干部反映，宣传了一个上午，群众还是说“解不下”[注 2]，尽管南、北方语言不同，一时没有明显的效果，朱开铨同志仍然要求大家坚持耐心的做宣传工作。为了尽快找到马锡五、杨玉亭等原陕甘边的干部，朱开铨同志做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通讯员的思想工作

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表示愿意带中央红军来的警卫队去寻找原陕甘边区政府的干部。

1935年10月初，在习仲勋同志的帮助下，罗培兰同志逃过了被捕被杀的劫难，安全转移到游击队。当年10月底游击队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下寺湾又到了一些红军部队，罗培兰同志便装到下寺湾察明情况，被原陕甘边区政府的通讯员指认出来，为防止出现意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派出的中央红军警卫队立刻悄悄围住她，采取突然行动下了她的枪。警卫队的干部问：“你是不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叫什么名字？”罗培兰同志被警卫队战士架住无法脱身，就大声说：“我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罗培兰，你们要杀就杀。”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通讯员马上告诉她，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下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陕甘晋省已经撤消，现在成立了陕甘省，从中央红军派来的朱开铨同志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他派省政府警卫队寻找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回来继续工作。罗培兰同志将信将疑的被带回陕甘省政府，朱开铨同志听了警卫队的汇报后立即命令警卫队的战士松手放开罗培兰同志，朱开铨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授权我负责筹建陕甘省政府，接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是中央红军找到的第一个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要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派王首道率中央红军去瓦窑堡解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现在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已构成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采取南进北堵、向北压缩的态势，企图将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一举消灭。中央命令陕甘省委、省政府组织支前工作团，全力以赴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反围剿。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首先把马锡五和杨玉亭同志找回来，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成建制同中央红军调来的干部合编，组成陕甘省苏维埃政府。”这是罗培兰同志第一次和朱开铨同志见面，朱开铨同志的话打消了她的疑虑，她相信这就是习仲勋同志开会布置要迎接的中央红军，立刻表示先联络马锡五同志。朱开铨同志在询问了罗培兰同志的资

历后，根据工作需要，任命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科长、支前工作团干事，负责联络、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人员到陕甘省来工作，同时命令从中央红军来的，卫队派两名干部带一个班协助罗培兰同志，并要求热情接待归来的同志。罗培兰同志立即启用陕甘边区紧急联络方式一鸡毛信，马锡五同志接到信后与杨玉亭同志很快来到陕甘省政府，并陆续联络了一些干部和游击队（独立营）。1935年11月初，在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干扰后，朱开铨同志代表陕甘省委、省政府提拔重用了一些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任命马锡五同志为陕甘省国民经济部长、杨玉亭同志为陕甘省财政部长，并任命了省政府各部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把陕甘边区苏维埃的干部成建制地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序列，及时稳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的情绪，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新筹建的陕甘省各级政权机构迅速地投入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

朱开铨同志布置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时指出，红一方面军是上万人的一大兵团作战，军情瞬息万变，陕甘省预设的供给站点不可能随处都有，根据在中央苏区的战勤工作经验，凡红一方面军在陕甘省战区发生的食宿、饮水、柴草、人工等费用，群众可以凭红军部队出具的欠款白条到陕甘省政府设置的兑付点足额领取现金，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红军就能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增加了红军的机动性，保持了轻装灵活打击敌人的优势，加上坚壁清野，只要敌军进入根据地，一找不到向导，二找不到粮食和水源，只有分兵运输后勤辎重，敌人将立即陷入行动迟缓、被动孤立的困境。

1935年11月8日，冒着漫天大雪，朱开铨同志率领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开赴邠县战区，支前工作团从中央红军来的干部较少，大部分是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与群众的沟通、动员和组织群众，陕甘边根据地的群众就象中央苏区的群众一样积极参战支前。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省保卫局长郑自兴同志指挥警卫队和各县地方武装游击队肃清匪特、收集敌情、封锁消息；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省少共书记揭俊

勋同志和杨玉亭同志负责筹集经费及加工储存粮食：马锡五和米裕德同志负责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帮助隐蔽红军主力部队、组织，导队、担架队和运输队、转运粮食弹药和伤员。朱开铨、郑自兴、揭俊勋陕甘省支前工作团主要领导干部以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韩明奎等为向导，到直罗镇附近实地选择安全的转运路线、估算往返路程和所需时间、选择便于主力部队隐蔽的驻地。郿县的石咀、凤凰头、张村驿、东村一带的群众家家户户把红军迎进家门，红一方面军的一万多主力部队就集结隐蔽在群众家里，敌人的飞机连续几天低空侦察始终不能发现张网以待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寒冷的冬天，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前得到了充分的休整，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

1935年11月21日至24日，毛主席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实现了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目标。

1935年11月30日，在陕甘省郿县东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毛主席高度评价了陕甘省委、省政府的支前工作，并列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四个主要原因之一。毛主席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中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的这样好。”[注3]这是对陕甘省委、省政府支前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历史的事实证明，陕甘省的支前工作确保了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供给，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成建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是成功的，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培养的陕甘边区干部队伍在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为兄中央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陕甘边根据地站住脚作出了宝贵的历史性贡献。

2009年8月12日

注释：

(1) 1934年6月，毛泽东同志派朱开铨同志任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主任，

兼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独立营政委，接管连续 3 次被敌人袭击、损失惨重的会安工委，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2 个团，保障了守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红 22 师的侧翼安全。

江西省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央苏区粤赣省赣南省专辑）24 页、197 页，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9 年 10 月，赣出字 88001 号。

（2）“解不下”是陕甘边当地方言，指听不懂。

（3）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364 页—365 页“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毛泽东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 年 12 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 年北京第八次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4）原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1 年 6 月第一版。

永恒的记忆在未来

江西省政协朱老原身边工作人员及省政协干部

功臣无需多言，时间会使他们的名字永恒，历史自会为他们塑起丰碑。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在为《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作序中写道：“我和开铨同志相识，已将近 60 年。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我就和他在陕甘宁边区一起工作了 12 年。在当时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相交相知，情谊甚笃。”并称赞朱开铨是一位“一身肝胆望重德高，百年奋斗鞠躬尽瘁”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们从西安咸阳机场换乘汽车，中午时分到达庆阳。第一位接待我们的便是党史研究专家曲涛教授。曲涛讲述庆阳史话，讲述朱开铨在陇东留下的许多为人称颂的革命业绩，如数家珍，表现出他对厚重历史文化的尊崇，并具有广博的史料研究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小时的交谈，我们跟曲涛一起兴奋，一同思考。

曲涛教授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党的历史的考证，对陇东党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些年来，他撰写出版了《陇东老区红军史》《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等大批党史研究著作，并参与撰写《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从而胜利地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任命朱开铨为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参加陕甘省的筹备工作。1936 年 2 月，朱开铨被任命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因此，在长达 700 多页的《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用了 32 个页码印有百余幅先辈们的照片，朱开铨的半身照片与 1936 年 5 月任陕甘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刊登在同

一个页面上，依然是那么动人鲜活。这些图片和文字对于所有的读者来讲，无疑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和精神震撼。

70 多年过去，这里依然作着这样的记载：朱开铨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虽然工作岗位经常变动，时这时那，可他不论干什么工作，身处何种环境，都能淡然处之，认真面对，始终用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忘我工作，不怕牺牲，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一次次成绩，用平凡抒写了伟大，用本色印证了信仰，其功留存史册，其绩永值学习。

有位中国资深外交官则说：“永恒的记忆在未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赴汤蹈火的共产党人，不仅留存历史，而且光照未来！

在朱开铨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熊国庆

多年以来，一直想提笔叙述对朱老的怀念之情，由于我当时在其身边工作期间，没有想到用笔记录下他那一段时间的点点滴滴，加上自己写作能力有限，这件事就一直耽搁下来。近期获悉省委党史研究室拟出版朱开铨专集，我觉得有义务把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的一些记忆深刻的、真实的片段，用文字再现出来，以表达对朱老的崇敬之情，完成我的夙愿。

朱老是位德高望重的江西瑞金籍老红军。他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意志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离休后，他依然非常关注国家的大事。生活中，他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对待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和爱护。我终身难以忘却那段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机缘巧合下，我开车经过朱老家时，朋友要我陪他登门探望朱老。初见朱老有点紧张和拘束，他身着青灰色的中山装，身材高大、魁梧、圆脸、浓眉，外形酷像毛泽东。与之交谈后，发现他平易近人，待人热情，和蔼可亲，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倒像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此后一有空，会和朋友或者一个人去朱老家探望他。

1984年朱老主动提出从省政协副主席职位上退下来，让年轻人士，经中组部批准办理离休，并开始在家中休养。后因病情加重，转住省人民医院治疗。1985年11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到江西调研工作期间，获悉朱开铨同志还健在，并住院治疗的消息后，他就专程前往江西医院看望朱老。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紧握双手，热泪盈眶，他们俩互致问候，相谈甚欢。随行的摄影记者抓拍到了他们那种感人的情景。令人惋惜的是到现在还没能查找到那一珍贵的胶片。因为朱老参加革命工作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正省级。他是经中央特批按省长级，配有专职秘书、

专车和司机。1989年，他的秘书杨斌同志代表省政协和朱老找我谈话，跟我说：“朱老想调你去给他开专车，你有何意见？”说实话，我有顾虑：第一，朱老是一位老红军，又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他年老多病，经常需要去看病或住院治疗；因为要配合糖尿病的治疗，所以必须每天早、中、晚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他送饭，还要上药房为他配中药。此工作虽简单，但长期坚持不容易，如有闪失还会影响朱老的情绪和身体健康。第二，当时原单位的领导不同意放我走，否则就收缴分配给的住房。

当我的父母亲见我有此顾虑，就动员我说：“朱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参加革命和长征期间吃了很多苦，他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应该去为他工作。他把你调去，也是对你的信任”。父亲最后又语重心长的说：“你的祖父在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那时我还不到两岁。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靠朱老这些革命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他在那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参加革命打天下，能活下来已非常不容易。你是烈士的后代，现已长大，有机会能为革命的前辈们做点事就不要再有顾虑。单位要你交出房子，那你就回家来与我们同吃、同住，家里全力支持你！有什么困难我们来克服”。在父母的劝说和鼓励下，我最后决定一心一意为朱老工作。

在朱老身边工作的第一天，他已住进医院。当时是杨斌秘书带我去的病房。杨秘书跟朱老说：“朱老，我已按照您的指示，把小熊从卫生厅系统借调到您身边来开车，手续都已办好了，以后就由他为您工作。”朱老对我说：“小熊啊，谢谢你来我身边工作。给我开车，会很辛苦的，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哦。”我说：“朱老您放心，既然来了，我就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负组织上委以的重任和您对我的信任，更何况我们全家人都鼓励我来您身边工作。”朱老欣慰的说：“那就谢谢了！”最后，杨秘书再次跟我交代了工作内容和提出要求，他说：“朱老身体不好，年事已高，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他完成回忆录的撰写工作，重点是共同做好服务工作。朱老对你很信任，好好工作吧”。

朱老的专车停放在省政协院内车库，而我家离政协有一段距离，无论刮风、下雨或下雪，我都要每天早晨6点前赶到车库开车去他家，给朱老送早餐；每天晚饭后，要收拾碗筷送回家，再把车停放在省政协车库，然后才下班。刚开始工作不久，就觉得枯燥、乏味；这种工作并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要得到组织上和朱老本人及家属的认可、满意，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检验的。我及时调整了心态和自己的生活节奏，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并坚持下来了。

在朱老身边始终能感受到他那和善、谦虚、平易近人和体谅他人的优良品德。他多次问：“给我开车，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我回答说：“就是每天早晨没有懒觉睡，早晨起床晚了或遇天气不好，会影响您用餐的时间。”朱老说：“早餐晚点吃不要紧，我可以让家里调整一下送饭的时间。但是，你若休息不好，不仅会影响自己的身体，还会影响行车安全，更容易给他人造成肇事伤害。所以，你必须立刻调整好作息时间，安全行车。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们年轻人去做。”朱老的话虽说简短，但对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却包涵在其中。每当想起此事，仿若昨天。他那朴实的语言和关爱之情让我感动，铭刻于心。

朱老还经常找我谈心，询问在原工作单位的一些情况，比如卫生厅下属哪个单位、职工多少、做什么工作、同志之团结吗等等。我一一回答，当朱老听我提到个别领导之间有矛盾，搞派性时，他问我：“那你是哪一派的呢？”我回答：“没有加入他们的派性。”他说：“那就对了。”他还说：“毛主席早就讲过，我们共产党不能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在瑞金革命斗争时期，党内领导人王明和博古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在党内排挤和剥夺毛泽东的权力，施行了残酷的肃反运动。以肃反的名义，杀掉了许多持不同意见的优秀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他们在军事上也不采纳毛主席的正确建议，使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军长征进入陕北根据地时，毛主席得知肃反扩大化，抓了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的消息，火速派人从刀口下救出他们。”朱老语重心长

地说：“我是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人，是亲身经历的人，回忆起此事我就感到非常的难过和悲痛。因此，你们现在的人要吸取血的教训，团结友爱，把工作做好。”

朱老严于律己，组织上配的专车除了生活、出行、看病，省里举办的一些重要公务活动用车外，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如遇到，与他有关的一些活动或事情，他就会委托夫人罗培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或秘书杨斌去参加。他专门交代：“组织上配给我的专车，除了工作以外，任何人和子女都不能使用。”

那段时间里，有些事情给我的印象颇深。朱老的生活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晚上睡觉前必须泡脚后才上床休息。饮食方面既简单又要有营养，早餐一般是在6点半至7点半之间，一小杯鲜牛奶，一个蒸鸡蛋，一个小馒头，一个小包子，外加一小碗南瓜熬的小米稀饭；午餐在中午11点半至12点半之间，晚餐在下午6点至6点半之间。中晚餐，每天会根据他的食欲和身体情况调整食谱，肉类和新鲜蔬菜搭配烧，一荤一素。朱老爱吃红烧肉和甜食，偶尔也会烧一点红烧肉给他吃。但南瓜和芋头是他特别钟爱的蔬菜。多年的糖尿病使他在饮食方面受到许多限制，因此，在他吃的菜谱中一年四季都要有南瓜。每到冬天，家里就想方设法为他搜集南瓜储存。

探望朱老的赣南老乡和老部下们，有时会带水果、花生、菜油等土特产来到病房或者家里，他都会很严肃的对他们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都多，你们家的小孩也多，生活都有一定的困难，年纪也大了，还需要看病，所以，要节约开支，勤俭持家。你们能来看望我就很高兴了，但不要带礼物来。”谈话结束后，要求他们把礼物带走，否则以后不准来。那些人拗不过朱老，只好把带来的东西又拎走。

朱老爱憎分明，更不怕得罪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有一个赣南兴国籍的老红军，捎带花生和茶油来医院看他，一见面，他就对那位老红军说：“你来的正好，我还想找你呢。有好多离休的和赣南农村来的老红军，到我这来告你的状，说你现在在省里做厅长，官架子也大了，想见都很难，有这

事情吗？”“他们肯定是有困难才去找你，我了解你管的那个厅，正好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你要对他们那些吃了苦的老红军多加关心和照顾，还要尽可能的帮助解决困难，特别是老远来的那些乡亲们。若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向他们解释清楚，可不该把他们拒之门外。”那位领导同志不承认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还在与朱老的交谈中，嫌朱老多事，这下可把朱老惹火了。他手握拐杖敲打着地面，提高嗓门说：“你不要以为自己的资格老，贡献大，该当厅长。赣南农村里还有许多比你的资格老，贡献大的老红军。他们还保持着红军时期的革命本色，艰苦朴素，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若跟他们相比，你算什么？你还差远着呢！你赶快走吧，我不想见你。请把送给我的花生和茶油带回去，我不需要，你以后也不要来看我了！”那位老红军走时，不肯把带来的东西带回去，朱老就让护理他的工作人员，拎到门外，不许再拿进来。此后，这位领导真的再也不敢去探望过朱老。

还有一次赣南来的老乡，扛着自己种的大南瓜，到医院来给他报喜，说自己种的南瓜大丰收了，如果不是路程遥远，携带不便的话，会多捎几个大南瓜来，希望朱老品尝一下他种植的南瓜。朱老愉快地收下了。对此，我很疑惑，朱老平常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怎么这次又收下了呢？或许是想与老乡共分享丰收的喜悦吧，所以他才收下南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老回到江西宁都后，就向省政府提出在赣南寻找革命烈士遗孤，成立烈士子弟学校，并亲任校长；集中他们在校吃住、学习和生活，由国家统一负担烈士遗孤的一切开支，以告慰那些因革命而牺牲的英烈们！

印象较深的还有，每当罗老上医院看朱老时，他都是喜笑颜开，拉着她的手，问寒问暖。而当我从医院接朱老回家过年，罗老则提前到家门口迎接朱老，她还会牵着他的手，开心的注视着他。很有意思的是，两位老人每次相见，总有倾诉不完的话。但是，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相濡以沫五十余载，感情深厚，他们相敬相爱的情景让人回味和

羡慕，更值得我们年轻人的敬仰。

朱老晚年曾多次提起，想去当年战斗过的赣南和陕甘宁革命老区，看看老区的社会发展、建设，了解一下人民群众的生活，走访、看望那些还健在的乡亲们和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由于那些地方路程远，交通不便利，加上他年龄偏大、又多病缠身，现实的病况不允许他出行，因此他感到很无奈。我们都为之感到惋惜和遗憾！

朱老在六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巡视员，陕甘省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陕甘宁边区巡视团主任，宁部行署专员，省民政厅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直至省政访副主席离休。他个人始终服从组织安排，不计个人得失，体现了一个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格。朱老离休后，依然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宽以待人和团结群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深受他人格魅力的启迪和教育，受益非浅。朱老逝去已二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在他身边工作的那段往事，犹如深山里的泉水，不停的在我心中流淌、永存！

朱老的一生，正如习仲勋同志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为其撰写的《回忆录》题序中的评语：“一身肝胆望重德高，百年奋斗鞠躬尽瘁。”对此，朱老是受之无愧的。

鞠躬尽瘁风范永存

——纪念敬爱的父亲朱开铨诞辰 100 周年

朱亮朱新平朱红

今年 9 月 18 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朱开铨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8 年多了，但他那正气凛然、刚正不阿、高大魁梧的身影，慈祥亲切的面容，浓郁的乡音，深深地刻印在我们心里。他对中国共产党无限忠诚的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不畏艰险的战斗精神，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至今激励着我们。

1901 年 9 月 18 日，父亲诞生在江西省瑞金县合龙乡松山村的一户贫农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便辍学，12 岁在店铺里当学徒，15 岁开始务农，饱尝封建压迫和奴役之苦。1926 年，受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瑞金各个隘都成立了农民协会，父亲在家乡参加了车断隘农民协会，担任宣传委员，积极投身农民运动。1929 年县委作出创立红色暴动队的决定，父亲加入了暴动队，任八大队五中队的中队长，也就是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 年冬天，赣南特委决定在瑞金成立红军第 24 纵队，在很短的时间便发展到 2 千人，并在全县赤卫军、暴动队的配合下，于 1930 年春天发动总暴动，一举攻占了瑞金县城。在这期间，父亲为了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其中包括苏区战争史上著名的全歼赖世琮匪徒一千余人的漂亮歼灭战。

1930 年春中央苏区在瑞金成立红色政权之后，父亲先后担任瑞金县合龙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裁判委员、代主席，瑞金县云集区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当时土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都设在云集区）。在政权建设和为红军输送人员、给养方面，尽心尽责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1932 年 11 月，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父亲和王观澜同志一道在云集区领导了“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执行土地法、巩固

根据地提供了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八县“查田运动”，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和八县查田运动誓师大会上受到表彰。

1933年4月，毛主席委派父亲担任长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任期内调苏维埃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央土地委员会任委员。1934年2月，毛主席找父亲谈话，调他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任巡视员。任职期间，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指导和检查执法、土改、武装斗争、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组建地方武装、建立和巩固苏区政权等项工作，并进行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大量实际资料，得到中央政府领导的多次表彰。

1934年4月，父亲奉命调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任土地部长兼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连连失利，会昌县已成了苏区的南大门。父亲上任后不久，毛主席来到粤赣指挥作战，在毛主席的鼓励下，他主动要求到对敌斗争的前沿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在这期间，父亲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领导当地军民，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主动出击，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为保卫苏区的南大门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知，决定父亲调往红军工作，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央工作团没收委员、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红章纵队地方工作部干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政治部政务科长、十二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主任等职务。长征途中，父亲主要担负的是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宣传和依法执行土地政策等工作。他凭着在中央苏区多年积累的地方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对待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出色地完成了供给和地方工作的各项任务。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时，他受中央的委派，与罗梓铭、毛泽民等七位同志一道担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任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和依靠群众，造就了良好的地

方革命秩序，保证了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安全。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走到下寺湾时，王观澜同志对父亲说：“中央决定撤消陕甘边区，成立陕甘省，并决定调你参加陕甘省筹备工作，你是省委七个委员之一，并担任省政府的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陕甘省委由朱理治、李富春、朱开铨、肖劲光、李一氓、郑自兴、揭俊勋组成）。在这期间，父亲认识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并与陕甘省前身南梁政府红二十六军干部罗培兰结婚（母亲罗培兰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父亲历任陕甘省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1936年5月，中央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作出撤消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的决定，任命父亲任陕甘宁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父亲曾多次和我们谈起他的感触。父亲说，红军刚到陕甘，党中央、毛主席就让我担当如此重任，我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如此信任，担心的是怕搞不好工作。虽说我在中央苏区担任过长时间的政府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那是在我的家乡，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风土人情我都很熟悉。可这是北方，这里的情况及民俗我都不熟悉，我这个南方人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肯定会很多。但是，长征中碰到那样多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了，难道还怕眼前的困难吗？毛主席经常教育我，碰到困难是很平常的事，要紧的是要有正确的方向和路线，要有正确的思想，要多做调查研究，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要多向周围的同志和群众请教，你就可以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基于这样的思考，父亲的精神振奋起来，做好工作的信心也增强了。父亲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任职期间，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苏区，搞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力量建设，配合红军直罗镇战役，依照土地法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做好中央和红军的粮食供应，培养各级政权干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支援红军西征，迎接全国的主力红军会合于西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西安事变后，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父亲出任红军驻麟镇办事处主任。1937年4月，作为陕甘宁省的代表参加中吴召开的苏区和红军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宣布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宣布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而代之为减租减息；宣布撤消陕甘宁省和陕北区，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会议结束后，父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1942年夏，父亲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结束后，任陇东专署专员。在时期，父亲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土地政策健全解放区法制，为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支援革命战争的需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父亲奉命调回边区政府做战争动员工作。1947年夏，由于敌人占领延安，父亲随边区政府迁往山西。到1948年，这时的形势已经开始转变，战略反攻、解放全国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中央号召从南方来的同志作好思想准备，积极配合大军作战，打回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父亲响应中央的号召，要求随大军南下并得到了批准。1948年冬，父亲从河北省平山县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在南下途中，父亲受中原政府领导之托，担任中原人民政府荣，军人管理处处长职务，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将淮海战役中的部分伤残革命军人及时转运，妥善安置，满完成了这一项艰巨任务。

1949年6月，父亲回到了阔别15年的故乡。他参与接收上饶地区的工作，组建浮梁专署。随后受命组建宁都专员公署，任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和土改工作，并为培养烈士遗孤建立了宁都烈士子弟学校。1952年7月，父亲任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为了缅怀革命先烈，他受省政府的委托，主持筹建革命烈士纪念堂，在全省第一次统计注册烈士人数，发放烈士家属证，开办了培养烈士子弟的江西工农中学。1954年，全国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父亲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全省的抗洪救灾工作，使灾民顺利度过灾荒。1955年4月起，父亲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1年。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文革”期间，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3年父亲复出工作，任省革命委员会政法办公室副主任，这时父亲已72岁高龄。他亲自着手选址，恢复和组建省政法干部学校，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为江西的政法战线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1979年，父亲担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致力于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巩固和发展我省的爱国统一战线。1984年，率先办理离休。198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他按省长级待遇。父亲离休以后仍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江西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关心改革开放，严肃认真撰写回忆录。

父亲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人民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父亲是一个党性原则极强的人，一贯严守党的纪律，从不利用职权为子女讲私情，谋职位。无论何时何地，一切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辈子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但他时刻想到的是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惟独没有他自己。他的一生严格体现了个人服从组织的高贵品质，忠实地实践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做到了忠诚党的事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兢兢业业工作。面对无数革命先烈，我心中无愧。在他晚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医院看望他，给他带来了极大精神鼓舞。

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的祖国又进入了新世纪。我们可以告慰先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南，坚定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率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祖国一定会富强，民族一定会振兴。

作为朱开铨的子女，我们决心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优良品德，响应和拥护中共江西省十届十三次全会的决定，认真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江西的振兴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在毛主席指导下反“围剿”

朱新平朱春宁

2013年12月26日是开国领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我们的父亲朱开铨是第四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是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亲自培养成长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毛主席受“左”倾教条主义排斥打击最严重的时候，选调朱开铨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得到毛主席言传身教和信任。毛主席两次派他率部完成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反“围剿”的重要任务。我们将父亲在反“围剿”的亲身经历，写成《在毛主席指导下反“围剿”》，以此纪念被中国革命历史实践证明了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

1934年4月30日，朱开铨接到中央组织局调令，担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组织局送调令的通讯员说：“上级要求你一小时内办完工作移交，立刻出发”。朱开铨没有时间等毛主席回来，写了一封短信，放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后，即同那个通讯员前往粤赣省报到。

1934年5月3日，毛主席到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对朱开铨说：“我想留你在身边工作，洋房子先生(当时暗指‘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趁我去福建了，连个招呼都没有，就调你离开我，他们调走王首道用的也是这个办法，不和我商量。你既然是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我还是要给你一个任务，兼任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把会昌县查田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使雇农、贫农和中农分享土地革命的成果，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最大的发展起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做好会昌县的扩红、筹粮、筹款等工作。”

1934年5月16日《红色中华》第189期报道：1934年5月5日至7日，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会昌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执行委员、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92人与会。毛主席、省委书记刘晓、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朱开铨先后讲话。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军事部长、国民经济部长、工农检察委员会主任等5人职务，开除5名有贪污罪的执行委员，开除动摇开小差的6名执行委员并送交法庭。改组执行委员会，选举朱开铨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开铨主持会议布置全县工作：1、红五月扩大红军1000人。2、向天心、筠门岭、高排的敌正规军、民团开展游击战，扩大三个基干游击大队，在边境成立小游击队。3、号召每个工农节省3升米帮助红军。4、立即编好赤卫队、模范营，随时准备上前线。5、全县按查田运动大纲开展查田运动，彻底消灭反革命基础，激发广大群众革命热情，为保卫会昌而战。6、发动群众抓捕一切反革命敌探。7、依照《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健全区乡苏维埃的组织与领导，注意群众生活，有计划地工作和检查工作。1934年6月14日，《红色中华》201期报道：1934年6月12日止，会昌县扩红2008名，在中央苏区排第四名。

1934年6月12日，朱开铨向毛主席汇报土作后，毛主席说：“我这次来粤赣省，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指导南线的反‘围剿’。粤赣的会昌、安远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与安远之间的高排，是3个区交界处，有20多个乡，4万多群众，现在是五次反‘围剿’南线战场的战略要地，高排驻军有粤赣省边区独立营400多人，3个区的游击队200多人，粤赣省保卫局保卫队60多人，共700多人的地方武装。对面的敌军是广东军张瑞都部3个团，还有会昌、安远的4个反动民团，共有7000多人枪，并装备机枪大炮。高排的党政领导机关，在3个月内被敌军3次包围袭击，遭受重创。我要粤赣省委成立会安工作委员会，省委原定经济部长、裁判

部长和财政部长中，调 1 人任会安工委主任。3 个部长都说没有打过仗，没有军事经验。你是土地部长，你看怎么办？”朱开铨说：“军事经验是从斗争实际中得来的，让我去，你信任不信任？”毛主席说：“相信你能完成任务，下次省委开会，你报名。”

1934 年 6 月 16 日，毛主席派警卫员吴吉清通知朱开铨 17 日晚 8 时，要他来谈话并汇报会安工委筹备工作。朱开铨准时赶到文武坝毛主席办公室，听完朱开铨汇报筹备工作情况，毛主席说：“今天叫你来，第一是看粤赣省委、省苏政府、省军区对，安工委做了哪些工作安排。第二是看你筹备工作做得怎样。第二是要给你上反‘围剿’的军事斗争课。”毛主席指着地图说：“中央苏区南线第五次反‘围剿’的主力红 22 师部署在站塘，高排就成为红 22 师侧翼，红 22 师兵力不足，守卫高排就只有会安工委指挥的 700 多人的地方武装。如果高排被敌军占领，就打开了攻占麻州、右水的通道；麻州失守，将威胁会昌县城；麻州果被占，就切断了红 22 师的补给线，并且陷于被敌军前后夹击之中的险境，就会危及整个南线反‘围剿’的战局。如果攻占，瑞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会直接威胁中央的安全，你指挥的部队有 700 多人，平均每人只有 2 发子弹，要发挥幸存下来有经验干部、老兵的作用，大胆信任使用，虚心求教，有耐心，团结同志。我们一人一枪一弹都来之不易，不能与敌正规军硬拼本钱打阵地战，要灵活开展游击战、伏击战和袭击战，机动创造杀敌条件，开辟游击区，收复失地，掌握战场主动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大量杀伤敌军，而自己伤亡或少伤亡为原则……。”毛主席又说：“你在 1 个月的时间里，健全了会昌县乡苏维埃组织机构，依靠群众，开展了查田运动，扩红、筹粮、筹款等工作都取得了成绩。你有群众工作的经验。你到高排困难是很多的，只要依靠群众就能打开局面，你接管高排的第一件事，是提高警惕，布置耳目，掌握敌人动向；晚上带机关、部队上山宿营；向群众调查敌情和社情，安抚死难同志家属，妥善安置伤员，关心群众生活，开展边境贸易，了解群众的情绪，搞清 3 次被敌军包围的原因。第二件事，动员依靠

群众做好侦察保卫工作，坚壁清野，把反动民团消灭掉。这样，不熟悉本地情况的广东军失去耳目触角，就成了瞎子、聋子。会安工委的部队打反动民团是有力量的，不要轻易去打广东军。要打有胜利把握的仗，打广东军的第一仗，一定要打胜仗。部队要带好，高排要守住，会安工委担子很重，困难多，多想办法克服解决问题，你要坚持住，要对部队负责。”谈话进行三个多小时后，毛主席问：“我讲的你都记住了？”朱开铨说：“去高排执行任务，教我怎样去做，我都记住啦！今天听了主席讲的军事斗争课，有信心接管高排，组建会安工委，依靠干部群众，开展游击战，指挥部队保卫高排这个战略要地，在反‘围剿’中打胜仗，保障红 22 师侧翼安全。”毛主席说：“到高排后，要随时向我报告反‘围剿’的情况。”

1934 年 6 月 18 日，朱开铨带领钟桂华、朱开铭、朱开钦等 8 人，在高排接收遭受惨重损失的党、政机关幸存人员，点编部队，将其悉数编入会安工委序列。进行了简单的战斗动员，按照毛主席指示落实各项措施，朱开铨率独立营主动出击，扫除广东军的耳目反动民团；在群众的支持下，经调查研究后，查清猖狂进犯苏区的小股反动民团活动情况。从 6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先后进行 12 次战斗行动，消灭小股反动民团 160 人。7 月 16 日伏击进犯苏区的大股民团，当天消灭 100 多敌人，击溃了敌人进攻。1934 年 7 月 19 日，《红色中华》216 期报道了第五次反“围剿”南线战斗胜利消息。

由于敌军 3 次短时攻占高排，敌特活动猖狂，信念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反水投敌。朱开铨带秘书钟桂华、警卫员朱开铭，按约定时间前往一个红白交界的村庄工作，在行至距村 2 里多路时，一个老婆婆从树丛中钻出来，拦住去路，对朱开铨说：“参加同志（群众对苏区干部的称呼）去不得了，那个赤卫队长带着 100 多人都叛变了，还说抓住你带到那边去。”这是因为查田运动保护了群众利益，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由于群众冒死报信相救，朱开铨等 3 人幸免于难。

缺粮、缺款、缺枪弹，会安工委、部队吃饭都成了问题，三番五次派

人向省委、省苏、省军区送报请调拨粮、款、枪弹的公文。得到同样批复：就地自筹。

出于无奈，朱开铨从高排赶到文武坝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粤赣省实在困难，什么也拿不出。高排的困难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向白区有粮有款有枪的敌人要，但是，一定要有准确的情报才能行动。”毛主席用1个多小时对朱开铨请教的所有问题做了分析和具体指示。朱开铨满怀信心连夜赶回高排。

经过仔细调查研究，高排3次被袭，敌军是每个月阴历十五或十六，晚上有月亮的时候，由反动民团带路，广东军1个正规团，从驻地天心圩走40多里山路奔袭高排。对此，朱开铨决定集中部队，在敌人必经之路又陡又窄路段设伏，把松树锯成百多斤一截数段园木，用藤条绑在路旁陡壁上、大树上、陡坡处。当敌军又一次夜袭高排时，朱开铨指挥部队用滚木杀伤大批敌军，敌人团长也被滚木压死了，打退了敌人1个正规团的进攻，缴获了很多子弹，部队无一伤亡。此后，很长时间广东军不敢走这条山路进攻。会安工委根据实际情况，要求赤卫队不与敌人硬拼，命令各村赤卫队承担的任务是24小时放哨监视敌人的举动，发现敌军进攻动态，一个村一个村依次将取情传递到高排，报告会安工委，就是完成任务。当驻天心圩广东军1个团开去进攻红22师，广东军留下1个正规排守团部，民团留下1个排守民团部，情报很快送到会安工委，朱开铨对会安工委和独立营的干部说：“毛主席的指示，向敌人要粮、要款、要枪弹的时机到了。我命令，独立营奔袭天心圩！”守敌闻风而逃，独立营攻占天心圩敌团部，缴获一些枪支弹药，10000斤大米，几千斤食盐，还有布匹和药品。捉到土豪罚了几百块银元。当地群众都知道红军打胜仗了，数百群众在会安工委的动员下，非常踊跃地帮助挑运战利品，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这些战利品是无法运回的。独立营、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心都增强了，高排这个战略要地得到了巩固。迫使广东军这个团又回防天心圩，减轻了红22师的军事压力。

1934年9月18日，朱开铨奉命到中央党校学习。此时，独立营发展到700多人，游击队400多人，收复2个被敌军占领的乡，历经多次战斗，只有包括朱开铨在内3人负了轻伤。这是朱开铨第一次完成毛主席下达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的任务。第二次是保卫和巩固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这个唯一仅存的落脚点。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朱开铨负责筹建主持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工作，率陕甘省支前工作团配合红一方面军完成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任务。（详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第263页至268页的论文《浅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陕甘省苏维埃政府衔接问题》。）

“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瞎指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只有毛主席亲临南线战场指导的红22师和粤赣省地方部队，依靠群众，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了胜仗，改变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成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战局稳定的地方。毛主席因此而作《清平乐——会昌》，写下了广为人知“风景这边独好”的佳句，至今仍为世人引用。

我的父亲朱开铨

女儿朱亮

我的父亲朱开铨同志，正如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在为我父亲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一书作序所写“朱开铨同志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陕甘省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巡视团主任等。他的一生个人服从组织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一个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对同志对群众，他是一个敞开心怀的受人信赖的人；对事业对工作，他又是一个不断求索，唯独不考虑自己的人’，他享年九十二岁，是一个赤心耿耿，壮心不已的老战士。他的一生确实可写照为：一身肝胆望重德高，百年奋斗鞠躬尽瘁。”

父亲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虽然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但我觉得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父亲在世时，由于工作繁忙，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由于他自己小时候没有读什么书，所以一直要我们好好学习，学会本领，将来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要我们谦虚谨慎，不要搞特殊化，要关心和爱护群众，经常给我们讲中央苏区，红军长征，陕甘根据地的历史，要我们牢记是苏区人民养育了我们，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幸福的生活，要求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父亲这样教导我们，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除了党和上级交的任务，他还经常到农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到苏区一些县区考察，江西的县几乎都去过，还多次带我们到瑞金、宁都、会昌、于都、赣州、抚州、井冈山等地参观学习，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甘根据地、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父亲对家乡、老区人民的感情非常深厚。

我的父亲朱开铨，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

他英勇杀敌，参加过瑞金合龙消灭国民党地方军赖世琼的战斗。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前方战事失利，我父亲当时任粤赣省政府土地部长兼会昌县苏维埃主席，被毛主席派往保卫苏区的南大门，前往最前线高排指挥与粤军的战斗。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经过深入调研，分析敌我态势，精心部署，指战员勇敢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保卫了苏区的南大门。

父亲对敌人、叛徒恨之入骨，宁都有个大土匪黄镇中，原是中共党员，后贪生怕死，投降敌人，出卖党的机密，出卖同志，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解放后仍然盘踞宁都天险翠微峰，与人民为敌，妄想变天，党中央派大批解放军部队包围攻击，全歼了顽敌，活捉了黄镇中，宁都专署在广场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匪首黄镇中，为民除害，受到群众的称赞。为配合剿匪，镇压反革命运动，后长春电影制片厂还将此素材拍成电影《翠岗红旗》在全国上映，引起很大反响。

父亲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直至陕甘革命根据地，都担任党和苏维埃高级领导职务，我们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交通也不便利。全国解放了，我想可以到经济发达，生活条件好的大城市了。我曾就此问题问过父亲：组织上原准备让你到北京或东北工作，和你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很多都到大城市，你却要回江西，这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生活水平低，孩子们读书，工作都会受影响。父亲说：“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就把我的生命交给党，决心跟党走，为解放劳苦大众贡献自己毕生力量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江西是我的故乡，中央苏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民党五次围剿，牺牲了多少烈士。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对苏区采取‘人要换种、石头要过刀、草要过火的三光政策，有的红军家属全部被杀害，房屋被烧毁，甚至有的整个村庄都被杀光。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树根，甚至皮带，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过湘江时，瑞金籍的战士整团阵亡，我向组织申请到江西工作对烈军属给予优待，将他们的妻儿、亲属找回家团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如果我到大城市和条件好的地方去工作，我觉得愧对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亲人，愧对支持帮助红军的江西父老乡亲。

在党的领导下，与江西人民一起跟党走，发展经济，把江西建设得更美好。所以当组织上告诉我，江西的老干部太多，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回去可能没有位置了。我的回答是，组织上安排我回瑞金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不计较职位高低。

事实上也是如此，父亲 1949 年南下后，开始在宁都专署任专员，就采取措施：第一，积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把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垦种庄稼，解决群众的温饱；第二，逐村逐户调查红军家属生活情况，寻找失散的红军亲属、孩子，按政策对烈军属进行优待抚恤。做到有吃、穿、住。在宁都县城七里村建立“宁都烈士子弟学校”，凡是入校学生一律住校，发衣服、鞋、袜及生活用品，请教师、校长上课、学文化。1952 年我父亲到省民政厅当厅长后，在南昌建立了江西工农中学，把全省各地烈士子弟学校的学生都集中转到南昌“江西工农中学”，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部，年龄小的在校读书，年龄大的参军或安排工作，1958 年成立“江西省政法学院”，很多高中部成绩好的学生直接送到省政法学院读书，学习期满毕业都充实到政法部门工作，其中大部分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还有的分配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政法办工作，加强了政法队伍建设。年龄小的学生，转到普通中小学继续读书，其他年龄大的学生，分配工作或参军，妥善安置烈士子弟，继承革命先烈的事业。

在宁都工作时，父亲派了很多干部帮助寻找红军长征时寄养在苏区的孩子，只要有线索就不遗余力地逐村逐户询问、查找，那时，经常有外地的领导到宁都、瑞金来查找，父亲都一一接待，并提供帮助，在同志们的努力下，很多失散家庭都团圆了。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经过多次辨认，终于找到了古柏同志的儿子，古柏的爱人曾碧漪，紧紧地抱着儿子，激动得热泪直流，给儿子取名古忆民。后来，还给父亲寄来了古忆民上大学的照片，父亲见了很欣慰。

我还记得：1962 年夏父亲带着我们在庐山疗养院，住在河东路 236 号，隔壁 237 号住的是贺子珍，我们叫贺妈妈，中央苏区时我父亲经常向毛主

席请示汇报工作，与贺妈妈很熟，现在住隔壁，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贺妈妈从来不吃别人家的东西，但她到我们家来，就像在自己家，一点儿也不拘束，见要吃饭了，端起碗来就大口吃，还说很香。那年我见到的贺妈妈，人长得很端庄，衣着也很得体，举止正常。只是有时候会凝视一会儿不语。父亲告诉我，为了寻找贺子珍留在中央苏区的儿子——毛毛，他和组织想了许多办法，跑了很多地方，走访老俵，虽然找到了朱道来，但是由于突发争议，毛主席讲是革命后代，交给组织安置。

父亲对同志、战友深厚的感情，使我很感动，经常会跟我们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事情，还有在陕甘、延安与刘志丹、习仲勋、张策、杨玉亭、马文瑞、刘景范、王子宜、李培福等艰苦工作的日子。在战争年代，经过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牢不可破。还经常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在“文革”逆境中，父亲被罢官，大字报铺天盖地，被诬蔑为走资派、“侏子手”，游街、批斗，孩子们也被污为狗崽子受迫害。有次父亲被批斗，关在省法院楼上，蒙着双眼，被造反派用枪朝耳边开了几枪，被打得伤痕累累，回家后我们看到了，难过地直流眼泪。我问父亲，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为什么这些人对长征老干部下这么重的毒手，让人想不通。父亲说：“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真理总会战胜邪恶！坏人绝没有好下场。”

就在这样的時候，父亲还派我和弟弟朱新平去北京北池子中直招待所，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当时北京各路造反派闹得很厉害，我们都穿着旧军装，胳膊上戴“红卫兵”大袖套，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出现在同桂荣大姨面前，老人家惊疑地看我们问：“你是谁呀？从哪里来？”我说：“大姨，我们从江西来，我父亲朱开铨，母亲罗培兰，让我们来看你，我叫延津，这是我弟弟，叫朱新平，是在西柏坡出生的。”大姨这才打消疑虑，亲切地与我们谈起来。她说：“你就是延津呀？分别时，你还是‘岁娃’，现在都这么大了；还是大学生，不说我还不认。你就在那礼堂里出生的，还是我接生的呢！当年，我在南梁政府，与培兰妹住一孔窑洞，睡一条炕，一起工作，后来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我们住在边区政府大院里边的山坡上，

一排窑洞五孔窑，那里一共住5家，你仲励叔叔也在隔壁窑里住着呢，你小时候得了伤寒，几个月才好。你大姐春&、二姐庆阳都托我照顾，在我家炕上挤着。1943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把你二姐寄养在老乡家，还是组织上派人找回来的。”并说：“解放后，组织上安排我在中直招待所住：你贞子姐有工作，现在只有同志让和我在一起，我很好，告诉朱哥和培兰妹，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社会形势不可能一直这样乱下去。”大姨热情地谈论别后的许多事情，最后亲自擀了面条给我们俩吃。我和弟弟把从江西带去的景德镇瓷器给她放下，告别后就走了。回家后，把见大姨的情况向父母亲作了汇报，虽然在搞运动，但听到大姨安好，父母也就放心了。

1991年11月，父亲受邀请参加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因父亲当时住医院，特派我母亲罗培兰（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和我及朱小平夫妻三人陪同代表他去瑞金出席纪念中央根据地创建60周年活动，受到瑞金市委热情周到的接待。

2013年9月5日，纪念父亲诞辰112周年，江西省政协在故乡瑞金举办“朱开铨同志回忆录”赠书仪式，受到中共瑞金市委、政府、政协、人大高度重视，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中共赣州、瑞金市委党史办及赣南中央苏区和父亲曾战斗过的各县党史办和领导都派人参加。南梁革命根据地、华池县领导及各党史部门的专家从甘肃辗转到瑞金参加赠书活动，使我们子女都很感动。父亲、母亲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后代也都怀着父辈打江山结下的革命友谊从四面八方专程来到瑞金。朱小平代表家人发言：感谢江西省政协为父亲朱开铨同志在红色故都——瑞金举办的赠书活动。感谢各级领导和专家、党史部门，感谢父亲、母亲战争年代老战友的子女专程前来参加赠书活动。

回忆起我敬爱的父亲——朱开铨同志，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爱与恨，他的革命情怀，他的光辉伟大。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的巡视员”——朱开铨

毛瑞明

巡视制度是我党内部监督制度之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巡视制度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立的。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就建立了巡视制度，只不过当时还不太完善。中央苏区时期，巡视制度得到强化和完善，党组织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察、群团组织也都设立了巡视员制度。而朱开铨是中央苏区时期巡视员制度卓越实践者与开拓者之一，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巡视员，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教育和帮助。

朱开铨是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松山村人，1926 年参加革命。在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之前，朱开铨曾先后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委书记，长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进入苏维埃大学学习。从苏维埃大学毕业后，担任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在云集区任职期间，朱开铨在毛主席指导下，领导了著名的云集查田运动试点，取得良好成效，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他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是在毛主席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农民干部之一。

一、毛主席亲自点将：走马上任

1934 年 2 月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刚刚结束，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便亲自找到朱开铨，要他到中央政府主席团主席毛泽东便亲自找到朱开铨，要他到中央政府主席团当巡视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是在二苏大会后首次设立的。由于担心自己文化低，理论水平不高，掌握不好政策，能力不够，但又不敢直接说不去，朱开铨便迟迟不到主席团报到。

在主席团一直没见到朱开铨，毛主席便又派人把朱开铨叫去，问他有什么困难，朱开铨揣揣地回答到：“主要是文化低。”毛主席爽朗地说：“边干边学嘛！”朱开铨问毛主席：“巡视员都做些什么事情？”毛主席说：“帮我了解情况，调查问题，检查各级政府执行政策的情况，看看干部作风如

何，是不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注意群众生活。”

朱开铨又问毛主席：“还有谁是巡视员？”

毛主席告诉他还有王首道和周月林。朱开铨一听王首道的名字就更不安了，人家王首道同志以前还是湘赣省的省委书记呢。还有周月林，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朱开铨自认为和他们比肯定差远了，于是，就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毛主席听完后笑了笑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长处，工农干部也有他们的优点。你是本地人，对这里的情况、风土民情都非常熟悉，并且有基层工作经验，这些我都很需要，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地工作，革命斗争是人增长聪明才智的途径。”

听了毛主席的话，朱开铨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原来的顾虑也都消除了。于是，他立即到主席团报到，就任主席团巡视员。实际上，在三人中，朱开铨是下基层巡视调查最多的人。因为不久后，王首道调到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而周月林是梁柏台的妻子，也是主席团的成员，一般在主席团留守，较少到基层去。

二、巡视调查：灵活机动

上任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派朱开铨到于都县去巡视工作。规定了时间和任务，要求他在15天内要了解群众春耕生产的积极性，群众对保护既得利益的斗争性如何，还要了解干部作风、群众要求、存在的问题等。接受任务后，朱开铨不敢怠慢，马上出发。

到于都后，朱开铨除到县、区苏维埃政府了解情况外，还深入田间地头，到群众中去调查。他看见那里的干部对生产等工作抓得很紧，群众积极性也很高，都在田里搞肥料，有的准备浸种。

在离于都县二十里路的古田区，朱开铨发现区里的干部都在讨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很热烈。这两句话就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朱开铨认为这个现象很重要，就着重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当作第一位的工作来检查。他还抓紧时

间，顺便到登贤县去了解情况（登贤县在于都的南面，是当时新成立的一个县）。登贤县委情况书记张振芳很注意贯彻落实这两句话，工作比于都做得还要好。

回到瑞金，朱开铨马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巡视情况。并认为如果各级干部都能按毛主席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去做，各项工作肯定能够做好。

毛泽东对朱开铨的这次巡视很满意，认为他能及时抓住工作重点，了解全面情况。

有一次，福建长汀县反映，古城农民之间相互斗争，佃农反对佃农的问题很突出，长汀几次派人去处理都没有效果。事情反映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主席便派朱开铨去调查处理。临行前，毛主席交待朱开铨：“你下去首先要搞清楚情况。情况搞清楚了就好办。佃农反对佃农不好，要批判，要用合理调整的办法，保证大家都有饭吃、有田种。”

古城情况很特殊。古城离瑞金县城三十多里，离长汀县城五十里，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田是江西地主的，这些地主都住在瑞金县只是收租时才去一下。当地的人不是佃户、小手工艺者，就是做小买卖的。当时按规定，只打击封建势力，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商店，所以做小买卖的人都不愿参加斗争。红军解放那里后，分田不是按人口分，而是谁耕种了多少地，谁就得多少地。对地主也没有进行斗争，有些佃农是想斗争的，但他们又不愿到瑞金来斗。有些佃户还留恋地主，因为地主不敢来收租，地就是这些佃户的了。地主留下来的房子，楼上仍是地主的谷仓，楼下住佃户，给他们看门。有些地主还帮佃户买牛，将自己的田都隐藏在那些佃户的名下，这些佃户就成了隐田户。所以，有段时间当地还将这些佃户当做地主的“狗腿子”来斗争。

调查清楚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朱开铨采用调剂的办法，不用查田运动那样激烈的斗争方式，进行了以优待红军家属为原则的调剂和教育工作，合理地解决了那里存在的问题，使大家都有田种。在离开古城的

时候，朱开铨向长汀的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佃户都是被剥削阶级，他们中间占了便宜的，要用调剂的办法来解决，不要用对待地主一样的斗争办法。

三、种一季稻还是二季稻：倾听民意

由于朱开铨原来就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能够深入调查，加上毛主席的亲自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的巡视工作做得越来越顺手，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

有一次，朱开铨按照毛泽东指示到会昌去检查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看看肥料是否充分，红军家属是否做好了春耕的准备。

到会昌后，朱开铨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当时县委开会布置是统一两种两季，但群众接受不了，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开铨到来后，群众就来找“毛主席的巡视员”，都说劳动力不够，平均每人有两三亩田，一个劳动力要种十多亩田，种两季吃不消。朱开铨农村出身，在任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时也了解一些情况。他也了解，之所以很多地方没有种两季，主要是因为水利设施不完善，灌溉和排涝都成问题。如果碰上干旱或水灾，晚稻的收成就保不住。如果种一季早稻、一季大豆或是红薯，即使碰上旱年也还有一点收成。

于是朱开铨对县委的干部讲，两季稻有好处，县委这样号召是对的。但还要实事求是，看当地的情况，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看气候，要暖得早的地方；二是要看人口与劳动力，种一季都吃不了，就可以种一季，劳动力不足，一季都种不好，两季就更不行了；三是要看水利的排灌条件是否具备；四是要看肥料是否充分；五要看土质条件。朱开铨说，要根据群众实际情况和要求，不要强迫命令，就种一季为好。听朱开铨这么一讲，县委觉得有道理，于是取消了原先的决定。

朱开铨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笑他：“胆子真大，竟敢否决县委的决定！”

不久，在中央土地部又因为种一季稻还是两季稻的问题起了争论，谁

也说服不了对方。于是，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问土地部长，你们作了什么调查没有？土地部长说没有。毛泽东说，没有调查，根据什么来争论？哪里打来的报告，就到哪里去调查嘛！争论的中心在哪里？坚持一季的理由在哪里？坚持两季的理由又在哪里？毛泽东最后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随后，毛泽东要朱开铨去调查，看看种一季和种两季有什么依据，并给了五天时间。朱开铨来到支持种两季的瑞金九堡区了解情况，

四天后，朱开铨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九堡迫切要求种两季的原因是：一、土地少，平均一人不到一亩，而且妇女都是大巧，劳动力多，不种两季不够吃；二、那里水利条件好，旱涝保收；三、其他经济作物多，姜、辣椒、烟叶、酸菜全县都很有名，肥料也比较充足；四、气候条件好。所以，那里种两季也就是很平很普遍的事。

毛主席听了汇报很满意，说：“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具备，种两季就蛮好。但是，你还要到反对种两季的地区去调查，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这样，朱开铨又到瑞金的沿冈区。那里强迫群众种两季，群众都不种。

调查结束后，朱开铨汇报了沿冈区的情况：一是气候冷不适宜种两季，要种的话也只能“压禾”，就是早禾还没有割，就到了插晚稻秧的季节，根本没法种。二是那里山货多，出茶油、杉木、竹子、棕、桐油、樟木、柿子、金钱橘，还造纸养蜂，他们粮食不够吃就去买，靠山吃山，完全没有必要种两季。

最后，土地部根据朱开铨的调查情况，结束了争论，放弃了统一要求种一季或两季的打算，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自行决定种一季或两季稻。

通过上述几次调查，毛泽东对朱开铨能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工作表示满意。并教导朱开铨，要深入调查，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解决矛盾。

四、办托儿所：为民解忧

在任巡视员的时候，朱开铨走得最多的地方还是瑞金县。一次，毛泽

东主席叫朱开铨到瑞金的武阳搞调查。此前，毛泽东曾亲自到武阳调查，对武阳很感兴趣，对那里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没有做结论。他要朱开铨去看看武阳的具体做法，深入分析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临行前，毛泽东还交待朱开铨在那办托儿所：“那里的妇女同志要下田，又要带小孩，很辛苦。办个托儿所，小孩白天放在那里，晚上带回去，为她们解决些实际问题。”

武阳、在瑞金的南部，那里组织了广泛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积肥、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各项生产都搞得很好。1933年5月18日至22日，中央政府曾在那里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即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给武阳区及其石水乡颁发了“春耕模范”的锦旗，并号召全苏区向他们学习。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的召开，掀起了生产竞赛运动高潮，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由于参军支前或者本来劳力不足等原因，那时中央苏区普遍都建立起耕田队和劳动互助社（也叫帮工组），把全劳力、半劳力和妇女组织起来，合理调配，相互帮工助耕。

朱开铨深入调查后了解到，武阳的生产运动之所以搞得好，一是打破了姓氏和房派的界限，广泛发动了群众；二是妇女很能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很多男性青壮年都参军支前去了，这里的女劳动力超过了男劳动力，她们所承担的各项劳动生产超过男子。而且一边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还要照顾家庭，抚育小孩，非常辛苦。有时忙于生产，小孩照顾不到，还会出现意外事故。

为了让劳动妇女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和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开铨在武阳的下洲坝组织开办了全苏区第一所托儿所。

托儿所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一开始有60多个入托儿童，后来慢慢增加了，1岁到5岁左右的都有。托儿所有一名主任，负责全面管理；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医，负责孩子的健康；一个五十泰岁的老教师教孩子认字；还有几个妇女负责洗洗东西，打扫卫生，入托儿童都在家中吃睦。办托儿所没用多少钱，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听取朱开铨的汇报后，毛泽东问：“群众对办托儿所的态度怎么样？”朱开铨告诉他，群众很高兴，也很支持。毛泽东说：“办托儿所也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个方面。”朱开铨当时不理解。以后到了延安，机关都办起了保育院。

在外出检査工作之前，朱开铨总是向时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同志通告一下。检查回来后，除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外，他还把检查的情况主动向张闻天作简要的汇报。这一做法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张闻天对朱开铨的工作也总是表扬和鼓励，称赞他工作能吃苦，善于调查研究，有时主动果断地解决问题，对党和群众有利的事能主动去做。

与此同时，在任中央政府巡视员期间，朱开铨经常得到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位主席的教育和帮助，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方式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给予朱开铨指导，还鼓励他多学习文化。朱开铨也经常向他们介绍瑞金人民的生活情况、生活习惯，瑞金的风土人情及革命斗争历史。

一九三四年四月，因工作需要，朱开铨调任粤赣省土地部长，结束了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的工作和生活。

附录

回忆与研究（上）

李维汉

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周恩来说，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博古等没有让毛泽东出来再担负红军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原则，所以取得了胜利。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我到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是江西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妇委书记蔡畅，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军区动员部部长陈奇涵，省委机关设在宁都。二是粤赣省委，它是从江西省委分出去的，省委书记刘晓，妇女部长李坚真。我去过粤赣省委几次，没有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是由胜利、兴国等县建立的一个省委，叫什么省委，记不清了。省委书记是朱开铨。福建省委由张闻天联系。

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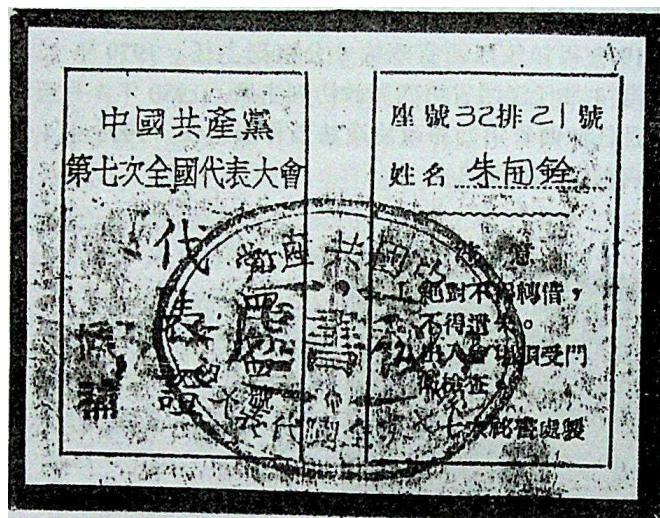
朱开铨(1901—1993)

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01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县人。1926年秋参加瑞金县合龙乡车断隘农民协会，任农协宣传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农民协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为了躲避靖卫团的搜捕，转移到山区藏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任瑞金县第八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1931年3月任合龙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裁判委员、代主席，分管经济和财政工作。1932年4月当选为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1933年5月被任命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8月至10月任长胜县(今宁都县南和瑞金县北部部分区域)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被调回瑞金，进入苏维埃大学学习，并任第二大队指导员。1934年1月从苏维埃大学毕业，列席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后，调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4月至9月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5月至6月任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至9月任会(昌)安(远)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调任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地方工作组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科长。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至1936年2月)、主席(1936年2月至5月)、土地裁判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委执行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至1937年4月)。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委、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1937年4月下旬作为陕甘宁省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9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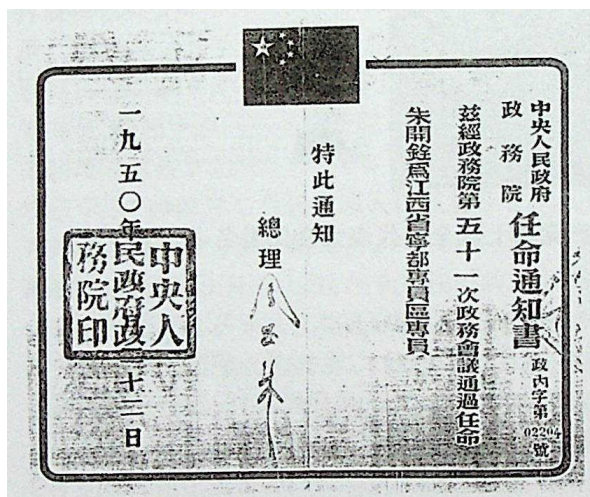
调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省苏维埃政府驻三边代表，并保留在陕甘宁省的党政职务。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校长。1940年4月至7月任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9月至10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1941年6月至1945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先后任第十一、第六支部组长，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陇东地委委员。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任陇东分区行署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1947年春被调回边区政府做战争动员工作。同年11月到中央后方委员会土改训练班学习。1949年2月任中原人民政府荣誉军人管理处处长。7月任江西省瑞金专员公署专员。8月至9月任中共赣南、赣西南地委委员。同年9月至1952年9月任中共瑞金（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中共宁都地委委员。1949年10月后任中共赣西南区委委员。1952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江西省政法分党组干事会成员（至1953年10月）。1952年11月至1956年6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54年1月至8月任江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1955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初任江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政法工作组组长。1993年1月16日因病在南昌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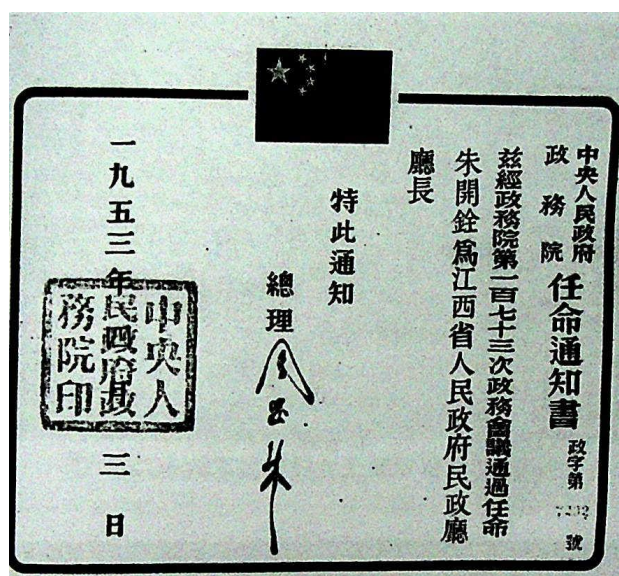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朱开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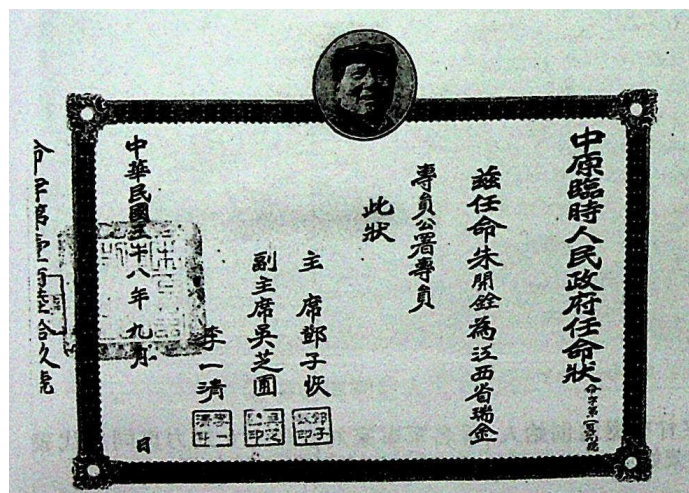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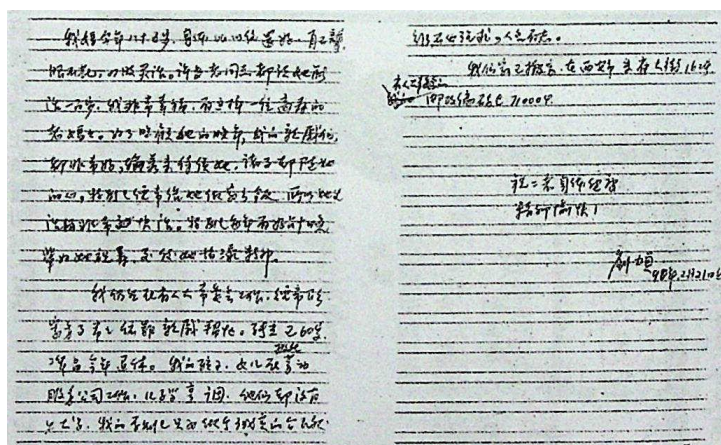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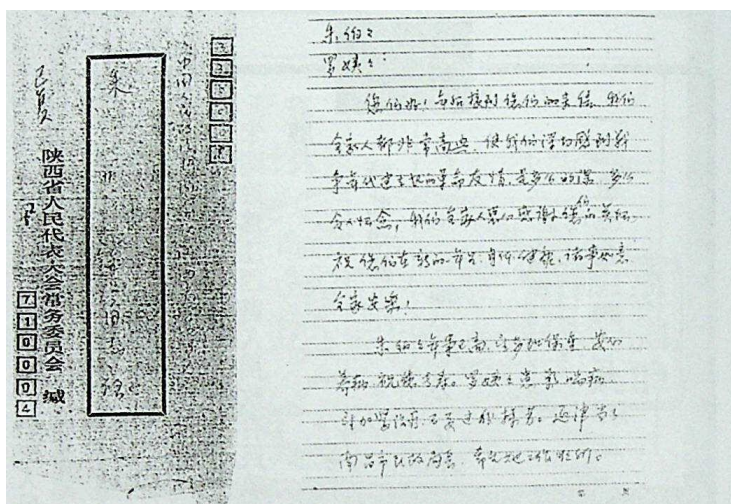


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通知书（1950年9月2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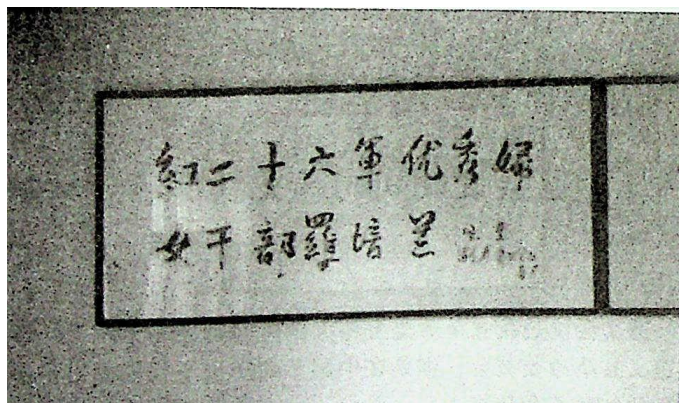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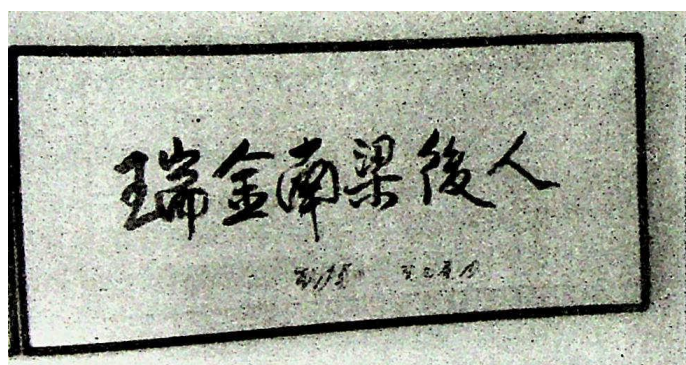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通知书（1953年4月3日）



陕甘根据地创始人、著名军事家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同志代表同桂荣妈妈写给朱开铨、罗培兰同志的书信复印件



① “红二十六军优秀妇女罗培兰”晚辈刘力贞



②瑞金南梁后人刘力贞

刘力贞同志的题词原件

关于遵义会议期间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朱开铨

遵义会议是我党革命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一九三五年建立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红色革命政权。

一九三四年，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浴血奋战，于十月二十五日渡过湘江，先后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尽管打败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但红军自身的伤亡损失，也是惨重的，由开始出发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因此，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越来越感到不满，直到湘江战役，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已经达到了顶点。

正当此时，蒋介石为了阻挡我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若不放弃原来计划，势必要与五、六倍于我红军的敌人决战。长征以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采取了逃跑主义的方针，使红军处于极端不利的被动态。为了夺路突围，不得不硬拼硬打，使红军伤亡很大，加上部队长期得不到休整，战斗力空前减弱。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改变原定计划，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红军的前途。

十二月上旬，红军攻占湖南边境的通道城，军委在通道城召开会议，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十二月十四日，红军进占了黎平城，十八日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

我记得红军在黎平稍事休整时，还有朱德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有一百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同乐茶话会”，桌上还摆着姜糖，冰糖什么的，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朱德同志在会上讲了些鼓舞士气的话，引导大家看到光明，继续西进。

红军攻占了黎平以后，又继续攻克了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

黄平、余庆等县城，当时就流传有：

××××××

打进贵州过乌江，

连战黔北数十县，

红军威名天下扬。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我随红军总部进驻遵义。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群众大会召开会议的前一天，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首先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我记得有王观澜同志，还有后来回到江西的钟昌涛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至于李华皆同志参加没有我记不得了。这次会议，一般没有什么地方同志参加，都是穿军装的参加。会议由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主持召开。因为当时我与李富春同志熟悉，长征以后到达陕北，与李富春同志更为密切，所以记得也最牢。在这个会上，李富春同志讲了遵义这个地方，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运动，群众基础薄弱，工作比较难做，要大家深入群众，做好政治工作。同时也讲了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最后还说了我们要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还要在会上讲话等。

在这个会议上，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我们几个红军干部作为参加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但我们这几个同志，每人都接到了通知，同时也事先知道，有一名地方同志要作为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会议，他就是第二天会议上宣布的任移同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大约九点多钟，在一个广场上，人们到得差不多了，我们几个参加县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也被安排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坐了。当时主席台是用毛竹和木板搭成的，主席讲话的位子上有一张桌子，我们这些人只有凳子坐，

没有桌子。主席台上头横竹杆上贴的标语是：“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还有些小条条标语。会议是等毛主席到场才开始的。当时到会的有几千群众。在主席台前面，都是红军直属部队，后面才是群众。大会是

由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个穿军装的同志主持。毛主席一到会场，大家就热烈地鼓起掌来，待毛主席一登上主席台后，总政主持会议的同志就宣布大会开始。会上毛泽东同志讲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话，他痛斥了蒋介石阻截红军抗日救国，讲了打土豪、分田地，很激动人心。毛泽东同志讲话过后，由总政的同志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宣布了我们七个委员的名字，宣布一个，我们就站起来一个。

吃过午饭以后，县革命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又由罗梓铭同志召集，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委员的任务和委员的分工。由于我们几个军队代表对遵义的情况不够熟悉，因此许多问题要向任移同志了解，甚至要些什么委员、干事，也要任移同志提供。当时要来的委员、干事，都没有工钱，只有饭吃，每人仅发一块钱的鞋袜费。

当时，我们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七名委员是这样分工的：

罗梓铭同志任主席，主持全盘工作；

丁伯霖同志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长征时他是中央队的队长）；

周兴同志任人民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原来担任国家保卫局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

朱开铨同志任土地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央苏区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

毛泽民同志任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中央苏区政府时当银行行长）；

陈云洲同志任劳动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在中央苏区时，是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部长）；

任移同志任文化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是当地人，知识分子）。

每个委员会少则三人，多则九人，超过的就不能叫委员了，而是称干事。当时“土地”和“文化”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数量最多，他们执行着宣传和打土豪分粮食的任务。

当时，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有特殊意义的，

它除了作为地方红色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造就一个良好的革命秩序，保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全，保证中央开好会。

县革命委员会除了罗梓铭同志任主席，指导全盘工作之外，丁伯霖同志负责的人民武装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保证有个良好的革命秩序。丁伯霖同志的工作做得很好。他手中有六十多支短枪，一个排的长枪，在会议期中，安排了必要的岗哨，在遵义街巡逻，对付隐藏的和公开的敌人，因此当时秩序搞得挺好，一切都很井然，也不拥挤，跟老区差不多。

周兴同志负责的人民肃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潜伏的反革命，后来因为抓了军阀王家烈派到遵义潜伏在商人中间的几个反革命，其余的反革命就闻风而逃了，直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四十多人全部撤出为止的十天间，遵义城没有发生过任何反革命的暴乱事件。

由我负责的土地人民委员会，有十几个成员。除了个别的是农民以外，其余的大都是学生。其中还有一名女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驻遵义的机关、部队以及遵义附近的部队有足够的粮食，尽量的搞好给养。当时我们搞到了一些猪、鸡、蛋什么的。同时还要打土豪、查收国民党官僚的资本，给群众散发粮食和物品。当时我们在遵义就没收了国民党三、四个粮仓的谷子，也谈不上什么分发，基本上是让群众自己拿。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打土豪分财物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八、九点钟进行，有的群众都是来自十几里之外。

毛泽民同志负责的财政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大量筹款，收集物资，搞公买公卖。当时遵义是国民党的行署，管辖十来个县，我们的财源大都是来自挖反革命，查收国民党的财产，当时我们还查收到一大批烟土等。供给是长征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毛泽民同志的工作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

由任弼时同志负责的文化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宣传红军有严明的纪律，公买公卖，不拉夫抓丁，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等。当时，这个委员会显得最为活跃。那时候任弼时同志只有二十几岁，中等身

材，稍胖，穿的还算讲究，说话很利索，很直爽、泼辣。在革命委员会期间，他没有下乡，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天天见面，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记得也最牢。在革命委员会期间，他发动了很多同学，出了蛮多力，影响也蛮大。后来，在县革命委员会里，就有四十多个学生参加了红军跟红军北上了。

由陈云洲同志负责的劳动人民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做工运工作。

以上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包括罗梓铭同志在内，一共七人，其中我们六人分别担任了各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们这七名委员都是由中央决定的，由总政治部在大会上宣布的。

关于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邓云山同志，是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有三、四天的时间，一天上午，陈云洲同志到罗梓铭那罗梓铭说让邓云山同志当副主席吧？当时我也同意，我并且说八个委员不好，最好是再设一个委员，搞一个办公室主任，红色政权的委员都是逢单的，同时我还说，开一个全体委员会通过一下，报中央批准为好，当时因时间关系，事后没有开成，但后来人们都称他为副主席。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所创造、积累的有关建党、建政经验的恢复和发扬。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了保障会议的成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不是一般群众一轰而上所能奏效的，是红军最高统帅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事前做了安排的一次有目的的，有准备的，有计划的建政活动。

一月十七日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一月十九日中央先比我们提前两天离开遵义。走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派人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通知我们后天撤离，并说中央向桐梓方向前进，要我们跟上中央机关，但由于懒板凳（即南白镇）的情况有变化，三军团的同志已到遵义，我们问清了情况后，立即打点行李提起前一天离开了遵义，事实上遵义红色政权差不多只维持到

元月二十日。过了三、四天后，我们在行军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批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暂告一段落。

遵义会议结束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遵义会议伟大胜利的深远影响，也是和遵义人民以及当时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出色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

中央给理治劲光并转

省委电成立陕甘宁省委及干部任命

理治、劲光并转省委：

甲、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管辖保安、三边、庆北、华池各县，并向西发展，省一级设吴旗镇。原陕甘所管其他各县及关中韩澄两特委，统改归陕北管辖；红泉设中心县委管延长、宜川、红泉三县。甘洛驻中央巡视员，指导甘洛、酈县、中宜工作。肤施与延安合并，肤施城南划归甘洛。

乙、陕甘宁省委以李富春为书记，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朱开铨、王子宜、郑自兴，揭俊勋诸同志，及省委、省苏、各技术人员均调陕甘宁。少共省委李广业留在甘洛外，余均调回中央。

丙、理治以中央巡视员名义驻甘洛，欧阳任红泉中心县委书记，张策任白区工作部。

丁、理治、梓铭、子宜、开铨先来中央一谈，欧阳暂留甘洛主持。

戊、执行情形速电复

党中央

1936年5月17日

中央给陕甘宁边区特省委电
成立陕甘宁省委及干部任命

理治、劲光并特省委：

甲、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管辖保安、三边、庆北、华池各县，并向西发展，省一级设吴旗镇。原陕甘所管其他各县及关中韩澄两特委，统改归陕北管辖；红泉设中心县委管延长、宜川、红泉三县。甘洛驻中央巡视员，指导甘洛、酃县、中宜工作。肤施与延安合并，肤施城南划归甘洛。

乙、陕甘宁省委以李富春为书记，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朱开铨、王子宜、郑白兴，揭俊勋诸同志，及省委、省苏，各技术人员均调陕甘宁。少共省委除李广业留在甘洛外，余均调回中央。

丙、理治以中央巡视员名义驻甘洛，欧阳任红泉中心县委书记，张策任白区工作部。

丁、理治、梓铭、子宜、开铨先来中央谈，欧阳暂留甘洛主持。

戊、执行情形速电复

党中央

1936年5月17日

瑞金人民革命斗争片断

撵走县“知事”

瑞金，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首都。它的位置是在江西省的南部，与福建省的长汀接界。这里有丰富的农副产品，主要出产：大米、豆子、花生、油菜、糖、木材、茶叶、茶油、纸张等等。在共产党没有来到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以前，广大农民成年辛勤劳动得到的收入，大部分被豪绅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去了，饥饿、贫困逼迫得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每当水旱灾害来临，农民的生活更苦，劳动人民不能不对剥削者怀着强烈的仇恨。为了活下去，瑞金人民往往自发的起来斗争，有时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成群结队的去“吃大户”。这样的斗争有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领导，多半被豪绅地主的武装镇压下去了。

1926年夏天，瑞金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劳动人民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熊熊的火焰，烧遍了整个江西。

就在这年夏天，瑞金县城的铁底、理发等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员杨荣才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会。秋天，农村里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到了冬天，工会、农民协会在全县大部地区组织起来了，提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倒贪官污吏！”农村中的地主、恶霸吓得不敢呆在家里，一个个溜到县城去，以为这样，可以在县“知事”的保护下，逃避人民的革命斗争。县“知事”陈启荣是同豪绅地主们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公然下令禁止工会、农民协会的革命活动。这引起了全县人民的愤怒，大家认识到县“知事”仍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就马上提出了“打倒县‘知事’陈启荣”的口号。一批又一批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跑到县衙门找县“知事”陈启荣出来算账。吓得这位神气一时的县“知事”，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一个深夜里，偷偷的乘船逃跑了。从此，革命斗争在瑞金大大的开展起

来。

杨荣才英勇牺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匪帮叛变革命，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瑞金这块曾经刚刚照耀着阳光的土地，又重新被密集的乌云遮住了。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工会、农民协会被解散了，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又猖狂的活动起来了。在瑞金县城领导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杨荣才，也转移到农村里去。到1929年，他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捉住。反动派先用各种酷刑逼问杨荣才同志，要他说出革命活动和党的秘密，但是杨荣才同志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敌人又诱劝他，叫他对老百姓发表诬蔑共产党员的演说。这一下杨荣才同志慷慨的“答应”了，他说“要我说共产党员的坏话可以，但是要在人很多的地方我才讲。”反动派信以为真，召集了1000多人的大会，叫他上台去讲。杨荣才同志上台后，一开始就大骂国民党蒋介石，说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同时说共产党员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幸福的，事实正是这样。反动派被他这愤怒的正义的讲话弄得手忙脚乱，慌忙的用手巾塞住杨荣才同志的嘴，最后还没有人性的把他的舌头割掉。杨荣才同志英勇牺牲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但他一点也没有屈服他在最后还是坚强的站在那里，怒视着敌人。

杨荣才同志这种坚持革命斗争、对敌毫不屈服的英雄形象，深深的留在人民的心里，鼓舞着大家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勇在敌人野蛮的屠杀下，革命斗争仍然秘密的在进行。

暴动

1927年8月1日，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起义的队伍，由南昌出发去福建。经过瑞金时，瑞金人民带着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为人民自己的第一支军队带路。起义军由瑞金的壬田去会昌的五里牌时，中途与反革命军队打了一仗，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瑞金革命群众在火线上捡到一些反革命溃败当中丢掉的枪枝、子弹，就用这来武装了自己。

1928年，瑞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的进行地下活动，为武装暴动做好准备。这时，国民党蒋介石疯狂的实行“宁愿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因此，革命活动的重点就转移到交通不便的安子前、武阳、太阳山、大柏地、沙心等山区去

1929年年初，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红军由井冈山来到瑞金，在大柏地的麻子沟消灭了敌人一个团。队伍挺进宁都县，又消灭匪军一个团，活捉了匪团长赖世宗、副团长谢益兴。接着攻下了福建长汀，消灭了匪军郭凤鸣一个师，打死了匪师长郭凤鸣。所有这些胜利，给予瑞金人民革命斗争极大的鼓舞，使大家在思想上作好了暴动的准备。

1929年10月间，党领导革命群众在安子前、沙心、武阳、壬田、大柏地等地掀起了暴动。当时瑞金县委的负责人是邓家宝，武装暴动的指挥人是杨斗文。杨斗文是一个当教员的共产党员。暴动时的武装只有百把条破枪，其余都是一些刀、矛、梭标。参加暴动的大约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主要是指有武器的。暴动取得胜利后，就把队伍统一编为游击队，活动在太阳山、罗汉岩等地。不久，游击队又改编为第二十四纵队。地方上的反动武装——“民团”和伪县政府的警卫队，企图“消灭”游击队，天天向游击队进攻，但是每次进攻总是被游击队击败了。它们没有办法，就拼命招兵买马，到处成立“民团”“靖卫团”，扩充反革命势力。

1930年2月壬田“靖卫团”“团总”钟腾伟部下的队长王友柏，带领五六十支枪，联合豪绅，打算偷击大柏地的游击队。当他们走到离大柏地10多里的五百丘时，群众把他们要攻打大柏地这个消息迅速的一个村一个村的传到了游击队。游击队得到敌人要来的消息后，就埋伏在一个地势险要的石坳子山上的茶亭里，当“靖卫团”进入游击队的射程以内时，就给了它一个突然的袭击；打死了敌人10多个，缴获了几支枪。敌人狼狈的逃回去了。游击队不断的取得胜利，活动范围也一天天的扩大了。同年春天，游击队夺取了瑞金县城，并且很快的解放了全县。这些胜利，吓坏了邻近几个县份的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们有的向外地逃跑，有的躲在家里偷偷

的分散财产。

夺取瑞金城以后，就马上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各乡成立了农民协会。5月间，把地主的土地都没收过来，分配给农民，还发了土地证。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被推翻了，贫苦人民大大的翻了身。分完土地后，各乡的农民协会又统统改为乡苏维埃政府。这是瑞金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掌握政权。

保卫苏维埃政府的战斗

瑞金县、区、乡苏维埃成立以后，革命力量很快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被我军俘虏、又宽大释放了的匪“靖卫团长”赖世宗，见革命力量成立得这样快，感到不安，又在石城县拼凑了700多名兵力，企业继续挣扎。赖世宗梦想依靠他的优势火力，来消灭我们的第二十四纵队，并且夺走瑞金县城。1930年7月19日，赖世宗亲自带领他这700多人、400多支步枪和一枝手提机枪，由大犹坪进犯壬田区合龙圩、厥陂一带，打算休息一天，第二天攻夺瑞金县城。敌人刚一到，当地的农民协会，就派人报告了第二十四纵队驻在壬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朱玉山同志。朱玉山同志一面派人侦察敌情，一面报告县苏维埃和纵队司令部，司令部接到情报后，马上命令驻九堡的第一大队队长周昌仁、驻黄柏的第二大队队长谢会群带领部队赶到合龙圩附近，配合第三大队，一起歼灭敌人。同时瑞金县委向全县人民提出了“拿起武器，保卫苏维埃”“保卫我们分得的土地”的号召，广大群众也积极活动起来了。当禾各大队都到达目的地。司令部命令队巧在后半夜3点钟吃饭，5点钟开始袭击。任务是：朱玉山带第三大队打正面，周昌仁带第一大队打左翼，谢会群带第二大队打右翼，当地暴动队担任放哨和增援任务。一切布置好了，各大队隐蔽在树林里休息，只等一声令下，就同敌人战斗。赖世宗没有想到我们的兵力来得这样神速，他们还打算早晨5点钟吃饭，然后攻夺县城哩！早晨5点钟，敌人正在吃饭，这是多好的战机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起了攻击，枪声四起，喊声震天。敌人遭到这意外的袭击，慌乱起来了。赖世宗手忙脚乱的指挥匪军向

我正面突围。我左右翼齐头猛攻，敌人四面受阻。加上敌人不熟悉这里的地势，又不知道我方的虚实，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却被我们压下去了。这时，当地赤卫队武装手拿刀矛、梭标冲了上去，更使敌人慌成了一团。赖世宗对他的匪部也指挥不灵了，因为匪军大部分被我们俘虏了。赖世宗见势不好，手提机枪，单人独马，向东边逃走，逃到沙背村，被我军追去，“叭”！一枪把这罪恶滔天的反动头子打下马背，结果了性命。这场战斗，自早晨5时起到上午10时止，整整打了5个小时才结束。我军获得了全胜，缴获了步枪400多支，驳壳20多支，手提机枪一挺，马6匹；俘虏了匪军300多人，其余的匪军有些被打死，有些扔掉枪逃走了。这样，就消灭了赖世宗的“靖卫团”全部，壮大了我们的第二十四纵队。经过这一场战斗，瑞金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更是大大提高了，使邻近县份的反动派再也不敢冒险侵犯瑞金，这就大大的巩固了瑞金的苏维埃政权。宁都、石城的群众说：“瑞金人的梭标真厉害，一梭几十里，把赖世宗的头都梭掉了。”

1929年，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率领红军，消灭了福建长汀匪军郭凤鸣师之后，然后离开了长汀。后来，宁化敌人黄日波带领两个团又进驻长汀，这对瑞金县的威胁很大。现在消灭了赖世宗，第二十四纵队扩大到1000多人了，这就有力量拔除福建长汀敌人对瑞金的威胁。1930年7月25日，第二十四纵队由瑞金出发向长汀挺进，在古城消灭了胡子炎的“靖卫团”100多人，胡子炎带领残匪逃回长汀城里去了。我军追击到城下时，守城的敌人黄日波紧闭城门，企图死守。我司令部当时就决定发动进攻，命令陈云山带第一大队从左翼虎背山攻打，丘志成带第二大队迂回到城的南边，从右翼的南门攻打，朱玉山带第三大队和特务连由西门正面攻击。各大队都准备了爬城的工具。7月27日早晨5时，开始向敌人进攻，战斗到上午8时左右，朱玉山同志带领的队伍从正面攻进去了，接着从虎背山进攻的队伍，也攻进去了，在城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敌人乘我右翼部队还没来到，突破了南门，向外逃跑。我军乘胜追击，缴获步枪200多支，短枪10多支。残余的敌人狼狈的往河田一带逃走了。

毛主席来了

第二十四纵队连战连胜之后，部队进行了改编。1930年10月间，反革命势力又猖狂起来了，会昌县的匪军欧阳江“保安”旅，攻占了瑞金。这样，县苏维埃就迁到安子前去，部队都转入了游击战斗，活动在安子前、壬田、大柏地一带的山区。这时，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跟随着反革命武装打回来，把农民分得的土地、财物倒算走了，瑞金人民又陷入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里。1931年2月，我们又打回瑞金，恢复了政权，4月间重新分配了土地。广大群众才又见了天日。

在这一年的9月，毛主席领导红军和广大人民胜利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围剿”，然后来到瑞金。在瑞金，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庆祝胜利大会；接着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瑞金便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心脏。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就积极进行发展党和整顿苏维埃的工作，一切工作逐步走向了正规化。那时毛主席就住在五集区的叶坪乡。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党领导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开展全民性的反帝运动。1932年的“五一”劳动节，各地举行了盛大的武装示威大会。云集区也举行了1万多人的群众武装示威大会，毛主席在这个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为。

当时，云集区的工作比较落后，群众没有很好发动起来，阶级斗争也不彻底。毛主席看到这个情况，就派当时中央土地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来到区里指导工作，他向我们，你们区里有什么困难么？”我们说：“有困难。主要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地主还没有打倒。”王观澜同志说：“毛主席派我来帮助你们，同你们一起把这个区的工作搞好。”在王观澜同志的帮助下，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洋溪村斗倒了13户地主，最落后的第四乡查出了漏网地主30多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这个落后区变成了全县模范区。毛主席还把我们的经验，在8县查田运

动大会上进行了推广。1933年5月扩红运动，我们区的任务是400人，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觉悟提高了，一个星期就集中了1100多人，每乡都是成连成连的参加红军。

这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为了粉碎第四次“围剿”，就必须把分散在各地的红军集中起来。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红军的粮食给养发生了困难。毛主席向根据地全体人民发出号召，每人节约3升米，支援红军。根据地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踊跃捐献粮食，送给红军。云集区全区居民25000多人，就节约了800多担大米。

冬天，瑞金进行了普选，选举了县、区、乡苏维埃代表，这是瑞金劳动人民第一次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同时，瑞金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经济文化建设。如：开办农场，组织劳动互助社，兴修水利，培育森林，发展手工业，办中小学和识字班，展开全民性的识字运动等等。

瑞金人民兴奋愉快的过着没有剥削、压迫的自由幸福生活。

红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迅速向华北伸张它的侵略魔爪。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执行卖国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妥协，一大块一大块的祖国河山，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当时，我们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再三的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仍旧坚持内战，集中了100万兵力，对我们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4年10月开始了25000里长征，北上抗日。在出发之前，作了周密的计划，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留下了第二十四师和5个独立团、各县独立营，坚持革命根据地。中央还留下了办事处，统一领导根据地的工作。瑞金县召开了全县干部和积极分子大会，统一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动员男女赤卫队、少先队参加游击

活动，组织游击队准备抵抗敌人。把全县划分成 5 个游击区，各个游击区由瑞金县分区游击。司令部领导、指挥。各乡或连乡都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全县大约 1 万余人。全体游击队员们士气旺盛，发誓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1934 年国民党反动派仗着优势兵力，用五六个师分 3 路进攻瑞金。情况是紧急的，但是瑞金人民仍然很镇静，把家具、衣物都搬到山上藏起来，不让匪军抢去，粮食运到各个游击据点，供游击队吃。因为敌人兵力太大，瑞金在这年农历 10 月 4 日被匪军第十师攻占了。

坚持游击活动

敌人占领瑞金后，就分路向游击队进行“围剿”。当匪第三师从瑞金进攻会昌时，我红军第二十四师配合独立营埋伏在谢坊区湾塘岗新桥下，趁敌人没有防备，四面一齐突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打死该师第十七团团长一人，官兵 500 多人，俘虏 100 多人，缴获枪炮 600 多支。这一下，给了敌人当头一棍，大大的打击了敌人的凶恶气焰，壮大了我游击部队的武装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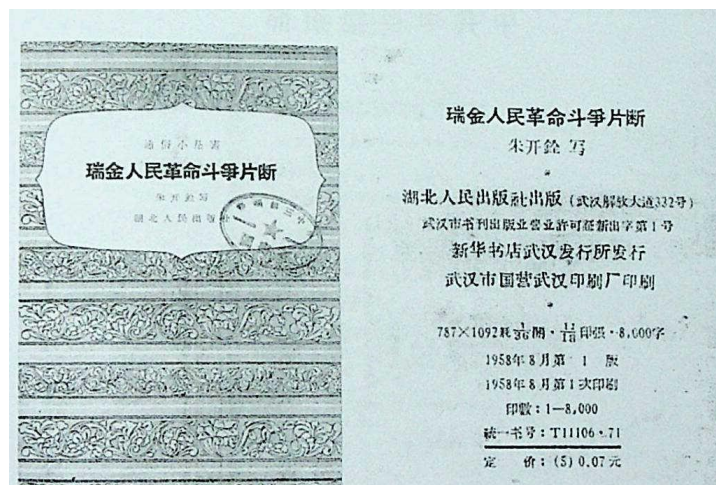
匪军在湾塘岗惨败后，吓得胆战心惊，再不敢轻举妄动了。它只好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沿着乡村要道，拆除民房，修建碉堡，盘踞大村为据点，分路“围剿”；进行搜山、烧山，实行血腥的移民政策。但是，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我游击队还是紧张的四处活动，运用“敌进我退，敌宿我扰”“声东击西”的战术，利用敌人的弱点，灵活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碉堡。敌人拼命追击，又摸不清我们的方向，找不到我们的影子。这样，弄得敌人惊慌不安，有时整夜盲目放枪。有一次，敌人在沙洲坝蜈蚣岭筑一个碉堡，它白天筑，晚上就被我们破坏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把这个碉堡筑成。还有一次，下宋区 4 个女游击队员，在九堡地方活捉匪军采购员 5 人，缴获步枪 5 支。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传遍了全县。全县游击队一齐动手，到处活捉匪军。游击队有时还设法通过匪军的封锁线，深入敌人后方，打掉许多反动地富组织的所谓联保办事处，如官仓、径口、合垅、安治、兰田、石水、坳脑、肖埠脑等几十个伪联保办

事处，都被我游击队消灭了。

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十分害怕，就更加残酷的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严密封锁所有通往游击地区的交通要道，想困死游击队。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游击队的粮食一天天的少了。党就把游击队重新整顿，化整为零，进行活动。同年冬天，瑞金游击队同长汀游击队在银坑会师了。按照中央办事处指示，合并组成汀瑞游击队，由钟民同志任第二支队长，经常在汀、瑞边区和农村活动，消灭敌人。游击队能够不断的取得胜利，是同瑞金人民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瑞金人民在党的教育下，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不管环境怎样困难，敌人怎样严密的封锁，广大群众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积极支援游击队。特别是山沟里的一些小村庄，除了经常负担掩护伤员的休养外，还给游击队探听敌人情报，当向导。当红军没有粮食吃的时候，群众宁愿自己吃杂粮，把正粮节约下来，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送给游击队。比如，有的群众把挑柴火用的竹杠的竹节打通，把米装在竹杠里，假装上山砍柴，偷偷的把粮食送给游击队。还有的群众假装上山做纸浆，挑石灰，把米放在箩筐底下，运给游击队。每逢寒冷的下雪天，游击队下到村庄驻扎，群众除了保守秘密外，还把自己的被子让给游击队员们盖。群众这种积极支援游击队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一时也难全部记起来。

瑞金人民除了这样同敌人进行斗争外。还设法打人敌伪政权，进行活动，如刘辉山同志，打入伪政权做保长，发动群众把国民党仓库的积谷偷偷运掉，一部分送给游击队，一部分分给群众，然后装满一仓糠头壳，再放一把火把仓库烧掉了，放火后，报告伪政府说是“无故失火”，国民党无法查究，也就算了。

1937年，汀瑞游击队奉令编队整训。到1938年春天，游击队就编入新四军，出发抗日了。



关于朱开铨同志待遇问题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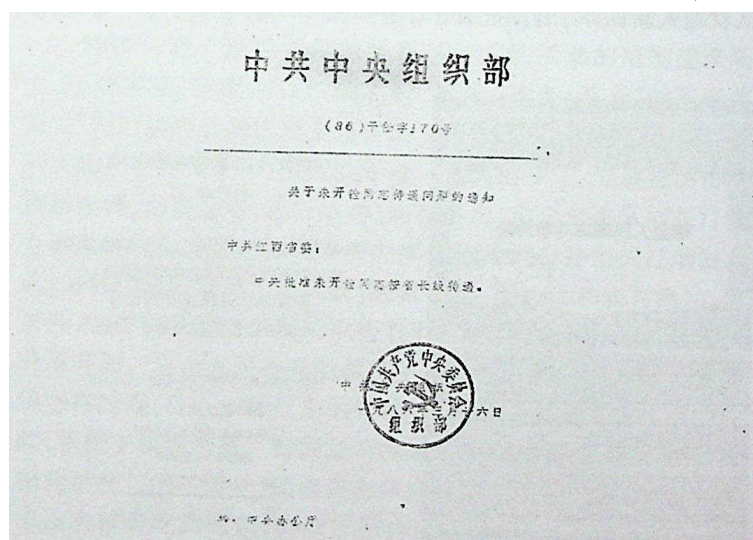
(86) 干任字 170 号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批准朱开铨同志按省长级待遇。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六日



关于转发中央组织部

《关于朱开铨同志待遇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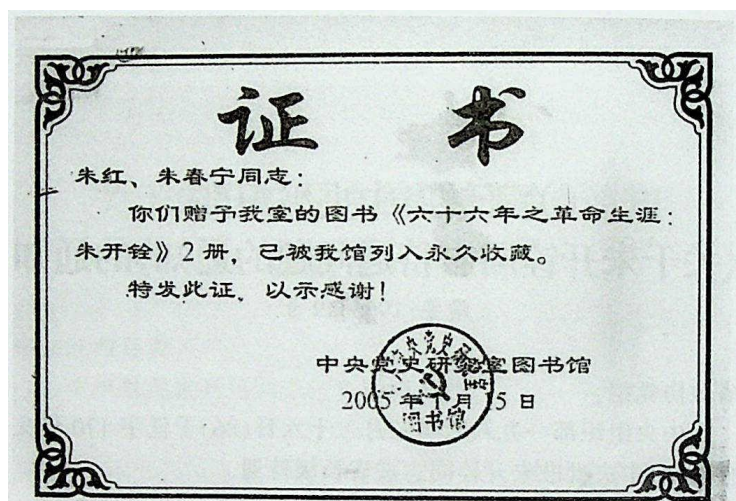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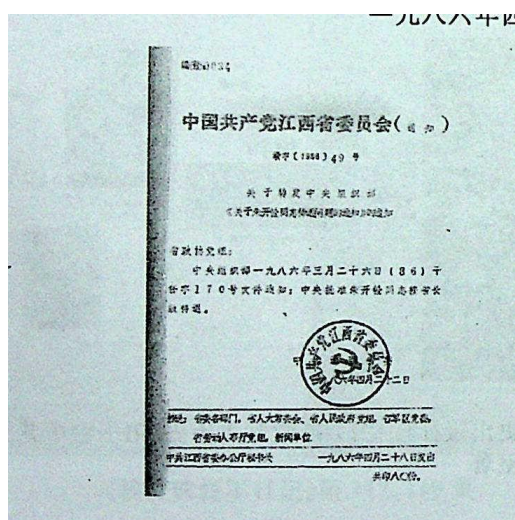
赣字〔1986〕49号

省政协党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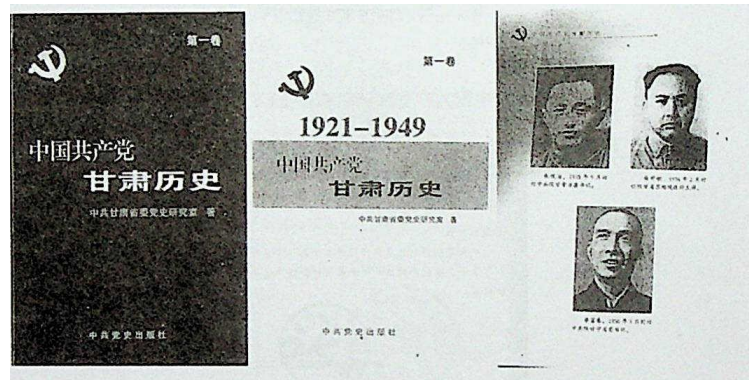
中央组织部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86）干任字 170 号文件通知：
中央批准朱开铨同志按省长级待遇。

中共江西省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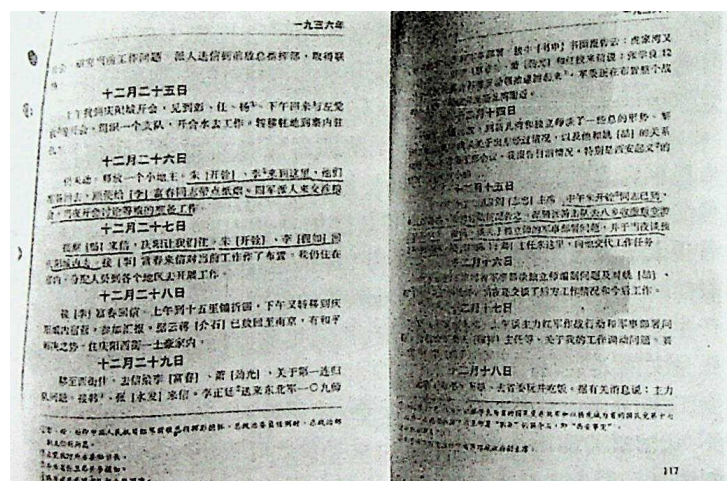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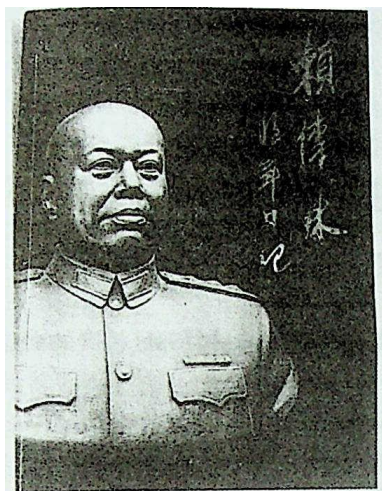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共党史研究室图书馆“证书”复印件《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赖传珠将军日记》第 117、119 页

《战地黄花——红色女性在陇东》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编谷凌云著

搭起中央红军与陕甘苏区桥梁的女信使

——罗培兰

罗培兰(1915—1995)，陕西乾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曾任酈甘县妇女主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江西省宁都专署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干部。她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陇东地委委员兼庆阳县(现庆城县)县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朱开铨的夫人。

罗培兰 1915 年 9 月出生于陕西省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慧、性格刚强的她，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不愿像父辈们一样守着贫穷落后和封建旧礼教旧观念生活一辈子，希望天下劳苦大众过上自由平等、富裕的日子。1934 年 5 月，她毅然离开了家庭，参加了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同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在南梁政府，军队里的女同志只有罗培兰和张景文两人，领导就安排她在陕甘边区委员会(南梁政府)做妇女工作。张景文在陕甘边区委员会(南梁政府)做文化教育工作。不久，凶残的敌人想趁刘志丹出兵打仗之际灭绝刘象，习仲勋得知消息后派人将刘志丹父亲以及夫人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接到南梁，安排住在罗培兰的窑洞里，并派罗培兰照顾初到南梁的同桂荣母女的工作和生活。由于工作的需要，胆大、细心的罗培兰调到了红二十六军经理处，在马锡五的领导下从事采购中药材，组织货源制作军服、军鞋等艰难繁重的后勤供给工作。她不但组织动员乡亲们制作军衣，自己也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烧得一手好菜，还是骑马射击的女中高手，与群众的关系很密切。这样，南梁就有了三位女同志，她们亲如姐妹，和男同志一样，不辞辛劳地保护着这块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罗培兰回忆当时的南梁政府时说：“刘志丹向志率红二十六

军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经常转战南梁、陕北和照金之间，但南梁是根据地的中心，习仲勋就带着我们南梁政府的十来个同志坚守，完全依靠群众，走到哪家就吃住在哪家。敌人一出动，群众就及时主动给我们报信，发现敌情转移时，南梁政府全部家当 10 分钟就可以装进马褡子，放在两个毛驴背上就走。”

妇女工作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扩大根据地急需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做好妇女工作的女同志。当时对这些女干部的要求是：能讲本地方言，能与群众一同干农活、做家务，遇敌能周旋，能观察了解各个方面的动态等。当时，罗培兰都符合这些条件。因此，1934 年 6 月，罗培兰奉命调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任陕甘边区(南梁)政府妇女代表，负责妇女工作。

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1934 年 11 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罗培兰被推选为陕甘边区农兵代表，出席工农兵代表大会。她回忆说：“1934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刘志丹同志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习仲勋同志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有土地、肃反、财政、经济和粮食委员会，政府工作人员约有 30 人，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从南梁政府两头毛驴驮全部家当的三个部初创时期，进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扩大发展时期。”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培养一批有文化素养、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军政干部，年底，政府决定在南梁成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等任教员。当时从各个部门选调了一批政治思想过硬、工作能力强、有群众基础的同志到干部学校轮训，罗培兰作为首批学员参加了培训。她说：“轮训班当时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党内同志的工作方法。仲勋同志讲课很结合实际，特别强调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他说：‘对根据地群众开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做工作，一家都不能落下。调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况，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过土地革命，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条件

成熟时就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红军家属开展工作时，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支持红军和边区政府。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解决。帮助他们孝敬老人、抚养子女，动员他们做军服、军鞋、加工军粮。支持在红军中的亲人，不拉后腿。对可能被争取转化的人开展工作时，对他们的家属要经常宣传、争取和教育，详细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生活困难的要适当接济’。经过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们的政治军事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不断扩大的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发生与敌人突然遭遇的情况，就用上了在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会的军事知识，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1935年初，罗培兰任酃甘县妇女主任。她急人民群众所急，想人民群众所想，时刻站在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方面。她走乡串户，采用拉家常等形式，鼓励妇女姐妹们站起来，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深受广大妇女的爱戴。

当年，刚建立起来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了重创。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十几万兵力，分六路向苏区进攻，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2月，刘志丹、惠子俊带领红三团北上，红一团在南线牵制南路敌人，南梁只留下游击队和赤卫军由习仲勋统一指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离南梁政府随之迁到洛河川。

1935年，红军内部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根据地开展了肃反，有些革命同志遭到监禁，甚至被杀害，灾难也直奔罗培兰而来。幸亏在习仲勋的帮助下，她逃过了被抓捕杀害的劫难，安全转移到游击队（当时陕甘边区各县已经成立了地方武装独立营，区、乡成立了游击队武装组织）。当年10月底，游击队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下寺湾又到了一些红军部队，罗培兰装扮成农妇到下寺湾察明情况。不料，被原陕甘边区政府的通讯员指认出来，为防止出现意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派出的中央红军警卫队立刻悄悄围住她，采取突然行动下了她的枪。警卫队的干部问：“你是不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叫什么名字？”罗培兰被警卫队战士架

住无法脱身，就大声说：“我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罗培兰，你们要杀就杀。”这位同志马上告诉她，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下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陕甘晋省已经撤销，现在成立了陕甘省。中央红军派朱开铨同志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是他派省政府警卫队寻找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回来继续工作。罗培兰被带回陕甘省政府，朱开铨听了警卫队的汇报后，诚恳地说：“党中央毛主席授权我负责筹建陕甘省政府，接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是中央红军找到的第一个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要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派王首道率中央红军去瓦窑堡解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现在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已构成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采取南进北堵、向北压缩的态势，企图将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一举消灭。中央命令陕甘省委、省政府组织支前工作团，全力以赴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反‘围剿’。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首先把马锡五和杨玉亭同志找回来，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成建制同中央红军调来的干部合编，组成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朱开铨的话打消了罗培兰的疑虑，便表示先联络马锡五等同志。根据工作需要，朱开铨询问了罗培兰的资历后，又任命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科长、支前工作团干事，负责联络、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人员到陕甘省来工作，同时命令中央红军警卫队派两名干部带一个班协助罗培兰工作。很快马锡五、杨玉亭等干部和一些游击队员陆续来到陕甘省政府，成立了独立营。这是罗培兰第一次和朱开铨见面。

1935年11月底，党内错误肃反得到遏止后，朱开铨代表陕甘省委、省政府提拔重用了一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任命马锡五为陕甘省国民经济部长、杨玉亭为陕甘省财政部长等，完善了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体系，及时稳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的情绪，新筹建的陕甘省各级政权机构迅速投入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保障工作中去。关于那一段的历史，朱开铨回忆道：“为了纠正‘左’倾肃反扩大化，制止

继续错杀干部，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区。我在红三军团，部队正往直罗镇方向运动，王观澜同志守候在甘泉县下寺湾的路口，他大声叫：‘开铨同志停下来，不要走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区，毛主席提议你任中共陕甘省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辅助筹建省政府，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要培养当地干部，省政府主席由当地干部担任，要搞好团结，陕甘边苏区是全国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做好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我立即赶往中共陕甘省委报到。当时筹建和主持陕甘省政府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组建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干部里从中央红军来的较少，大多是原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与群众沟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

罗培兰也及时认真地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归建，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及时开赴邠县直罗镇战区参加支前，有力配合了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她回忆说：“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对西北话听不明白，他们讲的南方话，根据地的群众又听不懂，群众信任我们陕甘边区政府来的同志，我们就做翻译。我们告诉根据地的群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是为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打仗。支前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给养、带路和转运伤员的任务。整个根据地对敌军封锁消息，我们陕甘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道：‘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生动地再现了陕甘苏区军民在直罗镇战役

中支前拥军场面。群众帮助隐蔽红军部队，敌军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群众还帮助传递敌人动态情报，坚壁清野。陕甘边根据地在家的青壮年不多，有的军烈家属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仍然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宁愿自己受冻，也把仅有的被褥给伤员盖上，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都献给红军。”

朱开铨（1901—1993），江西省瑞金县人。1926年秋参加瑞金县合龙乡车断隘农民协会，任农协宣传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民协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当选为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1933年5月，被任命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8月至10月任长胜县（今宁都县南和瑞金县北部部分区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4月至9月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9月调任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地方工作组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科长。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中共陕甘省委执行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委委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

长征途中负过伤的朱开铨，在直罗镇支前工作中连续几天没休息，战役一结束就病倒了，陕甘省委派罗培兰护理。其间，中央红军干部罗梓铭从中当“红娘”，罗培兰正在举棋不定时，偶遇来省政府办事的老上级习仲勋，她征询他的意见时，习仲勋说：“朱开铨同志在工作方面信任和使用陕甘边区的干部，我看他坚持原则、为人正派，你同意与他结婚就向省委汇报。”当时陕甘宁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省政府主席是马锡五。得到习仲勋的鼓励，罗培兰向李富春汇报，同意与朱开铨结婚。很快，李富春代表省委批准他们结婚，并请马锡五、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蔡畅一同商量，办好喜事。他们是陕甘宁省成立后第一对革命伴侣。他们没有金银玉佩，

没有山盟海誓，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勉励、相互促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刻。

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罗培兰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1936年9月，由于对工作严肃认真负责，她由共青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主席。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巡视团，由朱开铨任巡视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基层检查、督促边区政府政策法规的执行，了解基层情况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干事，协助朱开铨工作。

1938年6月至12月，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12月，边区政府任命朱开铨为建设厅副厅长，主管农业。陕甘宁边区沟壑纵横，人均耕地面积不多，耕种方式落后，老百姓除了自给自足外，余粮不多，部队粮食和物资供应严重短缺，罗培兰和朱开铨深入田间地头，经过多方调查，仔细研究，向边区政府递上了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请求在延安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以便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提高农产品产量，满足供给需求。边区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任命朱开铨为延安农业学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学校是当时在延安的艺等八所名校之一，罗培兰为总务科长。校址设在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朱开铨把建设厅内具有农林专业知识的20多名知识分子和一批等待分配工作的工农干部调到农校，担任教学和管理的工作。开学后，朱开铨带领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培植果树，养猪喂牛等。没有多少农业生产知识的罗培兰，既全盘抓学校的教学工作，又抽空向知识分子学习农业技术，忙得经常忘记了给孩子做饭吃。那几年里，她的两个女儿经常把同桂荣大姨的家当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带领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农校当年除自给自足以外，还有不少富余的粮食和副食品。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解决机关生活困难的一种很好的办法，给后来的大风川、南泥湾垦荒做了示范。1940年2月，朱开铨调任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第一任县长），马锡五调离后，他任陇东分区行署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做地方工作，守护延安西大门。这期间陇东磨擦事件频繁发生，国民党多次组织兵力进攻陇东，他与马锡五等配合三八五旅，为庆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培兰从1939年1月到1945年9月间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为边区农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队伍。

1945年9月，罗培兰任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革命时期的干部是边学习边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是及时充电或总结经验，于是犯错误的情况比较少，就是个别干部有问题，也不是大错误。罗培兰曾说：“我的经历中没有过失。否则，早已为党捐躯了，见不到革命胜利。”充分说明了不同时期干部培养的重要性。1947年11月，罗培兰到中央土改训练班学习，及时掌握当前的形势和工作任务。1948年4月，她在中央组织部待命南下工作组工作。

1949年1月，罗培兰在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工作。2月，朱开铨调任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任处长。1949年5月至1952年底，她在江西省宁都专署任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这期间，朱开铨先后任江西省瑞金专员公署专员，中共赣南、赣西南地委委员，中共瑞金(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中共宁都地委委员，中共赣西南区委委员，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江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等。1953年初，罗培兰调往江西省民政厅工作。全国解放不久，蒋家特务和美帝国主义暗中破坏祖国建设，残害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极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罗培兰，惨遭潜伏特务医生暗算，致使生活无法自理，评为“三等乙级”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此她只能默默地用心支持着丈夫的工作，祝愿祖国繁荣昌盛。1971年11月，她办理了退休手续，1981年光荣地从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职位。1955年4月至1983年5月，朱开铨先后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江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江西省第四届政协政法工作副组长等职务。1993年1月16日，被毛泽东称赞的这位好后勤因病在南昌逝世。革命伴侣的离去，对罗培兰的打

击很大。1995年12月，伤残了半生的罗培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路，在南昌病逝。

罗培兰的一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算不得轰轰烈烈，但堪称戎马一生。她做事情既泼辣大胆又心细如丝，要不1935年12月初，毛泽东连夜从陕甘省赶到瓦窑堡去，组织怎么就信任她，让其当向导！虽然她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努力配合朱开铨的工作，那是革命的需要，但也印证了“一个成功男人，身后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她始终默默地奉献，哪怕自己的身体残废。她的心胸是宽阔的，比宇宙更敞亮更美好。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如若宝石，放在哪里都发光，她的几个孩子也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个个都成了祖国的有用之才。

人生这样应该就够伟大的了！

参考文献

- ①《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直罗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第一卷，第364-365页。
- ②《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12。
- ③《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七卷，第305-329页。
- ④《江西日报》——“朱开铨同志生平”，1993。2。20第三版。
- ⑤《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5月，第122-135页。
- ⑥《江西省党史资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第十一辑（中共苏区粤赣省赣南省专辑）第24、197页，1989。10。
- ⑦《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11。
- ⑧《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5。
- ⑨《浅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衔接问题》——朱春宁、杨斌、朱瑞华。
- ⑩《罗培兰简历》——朱新平、朱春宁、朱红（罗培兰之子、之女）。



陕甘宁边区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

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

维舟同志：

边委与边府决定组织陇东分区专员公署，管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行政，并分别成立该三县县政府。委你为呢东分区专员公署专员，因你负有军事责任，故以朱开铨同志为副专员。至于组织各县县政府的办法和目前工作任务，已在边府1月29日委员会之决定上原则提到了，请参阅。除此而外，还请注意以下的问题：

（一）关于陇东、庆环两个分区的领导，在目前环境下，须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关。因此，经留守处与边委边府决定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管理陇东和庆环两个分区大政问题。在此委员会下，设立庆环和陇东两分区之军政委员会，分别管理两分区大政问题。这三个委员会的名单已经电告，此处不再述。

（二）目前在陇东应努力争取群众，巩固内部团结。对于在庆、合、镇、宁各县之扩兵与其他募捐等均应暂时停止，候群众稳定后再决定举行，在组织上应努力消除隐藏之坏分子。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应审查处理。

（三）专员公署不必另成立，即以庆阳县政府兼。庆阳县与合水县之干部，除以（已）委派之外，其余除在庆环与陇东物色外，边府当继续派来。

（四）关于统一战线，仍应与附近友区发生来往关系。

（五）关于庆（阳）、合（水）两县县长就职报（布）告已拟好，请令书写张贴各要道和村镇。

（六）组织县府经过及目前庆、合群众情形，请随时见告为盼。

抗礼

林（伯渠）

高（自立）

1940年2月11日

开铨同志：

边委和边府决定组织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并成立庆阳、合水、镇原3县县政府。由于该区环境复杂，任务之严重，须有强有力之干部负责，委王维舟同志为专员，你为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并以庆阳县政府兼专员公署。维舟同志负有军事责任，专员之责任你必须多多负责。至于组织庆阳、合水、镇原3县县府的办法和目前工作任务，已在边府1月29日会议上原则地提出了，兹抄一份请收阅，除此而外，应请注意以下诸问题：

(一)努力使庆阳、合水、镇原8县之行政完全作到归边区管辖，一切工作制度均能边区化。

(二)目前应努力争取群众，巩固内部团结。在庆阳、合水、镇原、宁县等4县之扩军和募捐等，暂时均停止，候群众稳定后再决定举行。在组织上清洗隐藏的坏分子。把干部中有政治问题的经过审查后处理之。

(三)组织县府的干部特派来之外，可要求庆环帮助外，再不足由边府继续增加。

(四)对附近友区，仍应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五)县长就职后施政方针的报告均已拟就，请书写张贴于各要道与村镇。

(六)组织县府经过及群众情形，请随时见告。

林(伯渠)

高(自立)

1940年2月1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致王维舟、朱开铨等同志“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

陕甘宁边区关于设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1940.2.11)(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

记述父亲回忆

习仲勋在陕甘边和陕甘宁根据地

1985年11月中旬，习仲勋同志到江西视察工作时，专程前往江西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我们的父亲朱开铨同志。

当天下午，父亲告诉我们：“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江西视察工作，今天上午专程到医院来看我。他一见面就说，开铨同志，你好，50年前中央红军长征到陕甘边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根据地，也挽救了刘志丹和我，挽救了陕甘边一批同志，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你的，你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罗培兰同志，是我们南梁政府成立时三个女干部之一，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共同工作、战斗，解放战争分开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得和你们在一起的情景，这次来江西就很想见到你们。”父亲又说：“我和习仲勋同志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谈到陕甘边陕甘省、陕甘宁省和陕甘宁边区在一起的往事，不知不觉就谈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医院喊开饭时，习仲勋同志才向我告辞。”

父亲还给我们讲了一段革命的经历：

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就了解到，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并已错杀200多人，党中央毛主席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候中央处理。”党中央毛主席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准备进行直罗镇战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也为了纠正“左”倾肃反扩大化，制止继续错杀干部，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我在红三军团，部队正往直罗镇方向运动，王观润同志守候在甘泉县下寺湾的路口，他大声叫：开铨同志停下来，不要走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毛主席提议你任中共陕甘省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

地部长和裁判部长，负责筹建省政府，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要培养当地干部，省政府主席由当地干部担任，要搞好团结，陕甘边苏区是全国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做好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我立即赶往中共陕甘省委报到。当时筹建和主持陕甘省政府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组建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干部里，从中央红军来的较少，大多是原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动员群众，组成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我们刚到西北语言不通，但有陕甘边的干部共同工作，就像在中央苏区，群众觉悟普遍很高，根据地的基础工作扎实，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动员群众支前，老百姓二话不说，放下手上的活就跟我们走。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培养的边区干部作风好，工作能力强，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深得民心，保密工作做得好，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队隐蔽在群众家里，敌人就是发现不了，部队战前得到充分的休提高了战斗力。毛主席在直罗镇战役总结中高度评价陕甘省的支前工作。

中央红军刚进入陕甘边根据地时，我就看到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署名的布告，在支前工作中又经常听到群众对习仲勋同志的好评，能和刘志丹同志齐名得到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习仲勋同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比南方差，地旷人稀，敌强我弱，历经挫折和失败，经过多次的武装起义，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带领红二十六军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实属不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唯一能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更是难能可贵。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保留了一个落脚点。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的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5年12月初，毛主席夜晚赶到陕甘省，对我说：“你给我找个向导，

我到省委听完汇报后，就要回瓦窑堡。”我立即找陕甘边来陕甘省政府工作的罗培兰同志，赶快找一个可靠的向导，为毛主席带路，连夜就出发去瓦窑堡。

我随即向毛主席汇报陕甘省政府的工作，我劝毛主席住一夜再走。毛主席说：现在情况很紧急，很像中央苏区肃反，这里的肃反搞得也很厉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都抓起来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要赶瓦窑堡去处理。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扩建的，主要干部因“肃反”被关押，还有些干部躲在外面不敢回来，缺少干部的问题尤为严重。这时，习仲勋同志被解救出来，他向我移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向我推荐了一些忠诚可靠、作风正派、革命立场坚定、群众关系良好的当地干部。我根据习仲勋同志推荐的名单，出面去要，带公文到有关部门交涉，派人去找。听到习仲勋同志回来了，那些躲藏避难的同志也陆续回来了，被关押还幸存的干部也回来了。我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纠正错误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按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安排了工作。那时朱理治同志任陕甘省委书记，我安排杨玉亭同志任省政府粮食部长，他要我同意把杨玉亭、席仲琪同志抓起来，事关重大，我立即派人把省保卫局长郑自兴同志、少共省委书记揭俊勋同志找来，他们说是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决定，要抓杨玉亭、席仲琪同志，省保卫局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我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从中央红军到中共陕甘省委工作，都是省委委员。我对朱理治同志决定逮捕杨玉亭、席仲琪同志这件事，提几点个人意见。1、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陕甘省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团结当地干部，依靠当地干部站住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撤销陕甘晋省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的组织措施，其中也有制止错捕错杀，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作用。3、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事情都要经过省委集体开会研究，不许某一个人独断专行。现在李富春、肖劲光和李一氓同志都没有到，朱理治同志个人的决定不能代表省委。4、我已向原陕甘边的马锡五、李培德同志调查

过，杨玉亭、席仲琪同志都是红二十六军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如果凭朱理治同志一句话就逮捕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如果错捕他们，今后怎样向党中央交待，怎样向陕甘省的党员干部群众讲清楚。5、省保卫局抓捕人犯，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审查干部要执行党的政策，不搞逼供信，防止灭口和意外身亡。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能疑神疑鬼。郑自兴、杨俊勋同志表示赞同我的意见。省保卫局没有执行朱理治同志逮捕杨玉亭、席仲琪的决定。

习仲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特地到陕甘省政府，感谢我们对陕甘边苏区干部的信任。我说：“毛主席亲自交待，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的同志，从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中，我就体会到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像我们在中央苏区一样深厚，陕甘省的支前任务主要就是依靠陕甘边的干部配合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同志，组织动员群众完成的，我们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也要感谢陕甘边的同志。陕甘边的同志坚持斗争、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保留下陕甘边根据地，我们更要感谢你们。”

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工作期间，对习仲勋同志的情况了解的更多，仲勋同志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经过多次反复，牺牲了很多同志。仲勋同志领导两当起义，为创建根据地出生入死，负过伤，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总结政治、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决定走井冈山道路，根据陕甘边的实际情况，开始了许多独创性的探索工作，终于成功地从单纯兵运工作转向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陕甘边根据地制定和执行的土地政策和中央苏区很相似，军事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上灵活机动，部队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创建了^〔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范围有 20 多个县。就在此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在陕甘边搞肃反扩大化，关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陕甘边根据地，解救了他们。仲勋同志出来工作后，见到陕甘边的干部就鼓励他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要振

作起来，坚定革命信念，不要有抱怨情绪，要顾全大局，严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工作，为实现党的目标奋斗。

我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工作期间，经常向仲勋同志了解情况，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敌我情况了若指掌，介绍敌情具体明细，如何防备马匪骑兵，如何防土匪赵老五；介绍干部队伍情况，不带个人倾向，实事求是。。我感到他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威望，有号召力，胸怀宽广，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政治水平很高，顾全大局，作风正派，党性很强，任何时候都能把党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我同仲勋同志相处就更亲近了。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留他住两天是经常的。你们的母亲罗培兰同志就是南梁政府的、仲勋同志还是他的老领导，我们在一起都很愉快。抗日战争时期，我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当主任，在延安和你们大姨(刘志丹同志夫人)同桂荣同志是邻居，就住在边区政府上面的一排窑洞里，仲勋同志也经常来我们家。我是解放战争南下到江西的，但是我在陕甘宁边区工作近 13 年，与习仲勋同志建立的革命友谊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从父母的回忆中，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把党和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新平、朱春宁、朱红

2004 年 12 月 23 日深圳

注：原载《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一版。

陇东分区成立文件

陕甘宁边区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

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

维舟同志：

边委与边府决定组织陇东分区专员公署，管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行政，并分别成立该三县县政府。委你为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专员，因你负有军事责任，故以朱开铨同志为副专员。至于组织各县县政府的办法和目前工作任务，已在边府1月29日委员会之决定上原则提到了，请参阅。除此而外，还请注意以下的问题：

（一）关于陇东、庆环两个分区的领导，在目前环境下，须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关。因此，经留守处与边委边府决定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管理陇东和庆环两个分区大政问题。在此委员会下，设立庆环和陇东两分区之军政委员会，分别管理两分区大政问题。这三个委员会的名单已经电告，此处不再述。

（二）目前在陇东应努力争取群众，巩固内部团结。对于在庆、合、镇、宁各之扩兵与其他募捐等均应暂时停止，候群众稳定后再决定举行，在组织上应努力消除隐藏之坏分子。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应审查处理。

（三）专员公署不必另成立，即以庆阳县政府兼。庆阳县与合水县之干部，除以（已）委派之外，其余除在庆环与陇东物色外，边府当继续派来。

（四）关于统一战线，仍应与附近友区发生来往关系。

（五）关于庆（阳）、合（水）两县县长就职报（布）告已拟好，请令书写张贴各要道和村镇。

（六）组织县府经过及目前庆、合群众情形，请随时见告为盼。

敬礼

林(伯渠)

高(自立)

1940年2月11日

开铨同志：

边委和边府决定组织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并成兄庆阳、合水、镇原3县县政府。由于该区环境复杂，任务之严重，须有强有力之干部负责，委王维舟同志为专员，你为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并以庆阳县政府兼专员公署。维舟同志负有军事责任，专员之责任你必须多多负责。至于组织庆阳、合水、镇原3县县府的办法和目前工作任务，已在边府1月四日会议上原则地提出了，兹抄一份请收阅，除此而外，应请注意以下诸问题：

(一)努力使庆阳、合水、镇原8县之行政完全作到归边区管辖，一切工作制度均能边区化。

(二)目前应努力争取群众，巩固内部团结。在庆阳、合水、镇原、宁县等4县之扩军和募捐等，暂时均停止，候群众稳定后再决定举行。在组织上清洗隐藏的坏分子。把干部中有政治问题的经过审查后处理之。

(三)组织县府的干部特派来之外，可要求庆环帮助外，再不足由边府继续增加。

(四)对附近友区，仍应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五)县长就职后施政方针的报告均已拟就，请书写张贴于各要道与村镇。

(六)组织县府经过及群众情形，请随时见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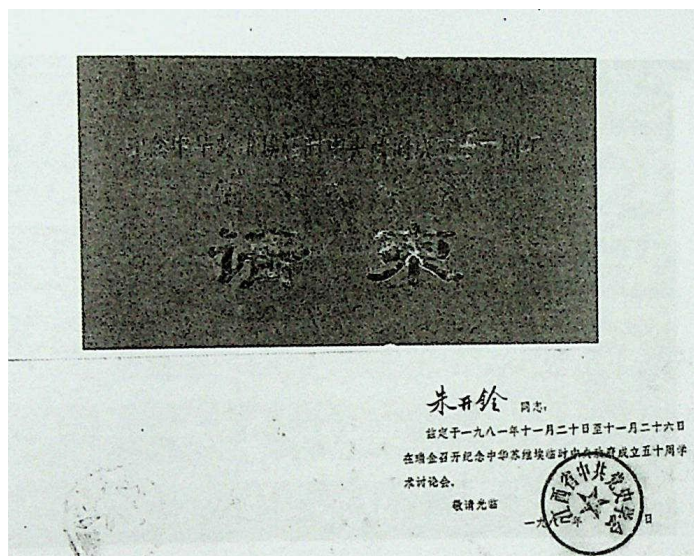
林(伯渠)

高(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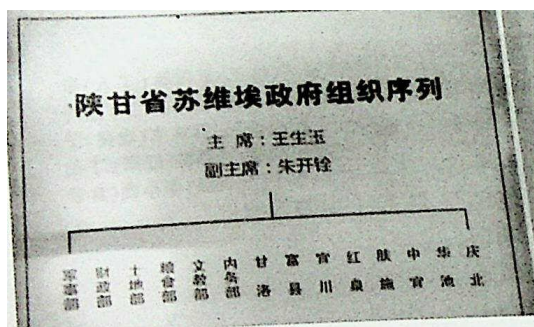
1940年2月1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致王维舟、朱开铨等同志“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

陕甘宁边区关于设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
函件(1940. 2. 11)(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列)



1981 年 11 月纪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请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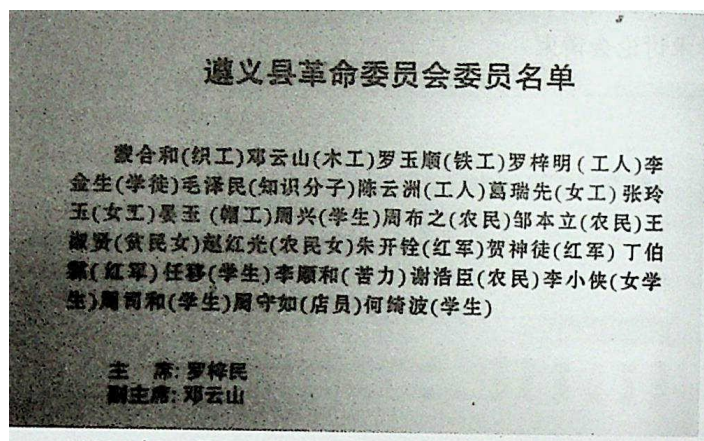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序列

南梁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展（南梁是陕甘边根据地中心，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境内）

行政学院	1940.7	花石砭	林伯渠 王子宜
民族学院	1941.9	高家砭	高岗 高克林
俄文学校	1942.1	泉砭	曾涌泉
延安通讯学校	1937.1	西川口	吴泽光 王 铮
延安农业学校	1939.7	红寺沟	朱开铨
日本工农学校	1941.5	宝塔山	林 哲 赵安博

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展



1935年1月11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陈展

生平大事

朱开铨生平年表

一、1901年9月18日，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壬田区合龙乡松山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朱广昭，母亲刘发招娣。朱开铨为长子，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无力抚养送别人家当童养媳)。

二、1907—1909年，开始做力所能及的农活。

三、1910年在合龙乡田心私塾读书。

四、1911年居家复习私塾先生指定的书籍。

五、1912年继续到合龙乡田心私塾读书。

六、1913—1915年，在合龙镇地主店铺当学徒。

七、1916—1926年，16岁挑起养家重担，务农为主。兼为行商人挑脚。后参加瑞金农民运动任农协宣传委员。

1926年秋，经农协主庠杨华昌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避敌人追杀，转移山区隐蔽斗争。1927年9月，经瑞金县党组织负责人之一杨寿宝召回合龙，秘密进行重建农民协会工作。

九、1929年5月，因人党介绍人杨华昌被敌逮捕生死不明，因党的工

作需要，由杨寿宝、朱甫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1929 年春，任瑞金县暴动队八大队五中队中队长。

十一、1930 年春，率五中队参加瑞金县总暴动，攻占瑞金县城，成立邓家宝为主席的县革命委员会。

1930 年夏，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1930 年 11 月，瑞金县被敌军占领，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时红军已全歼敌张辉赞部。朱开铨等 100 个党员，返回瑞金开展武装斗争。

十二、1931 年 3 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重新建立，朱开铨任合龙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裁判委员、代主席。

1931 年 3—9 月，闽西特委派李添富任瑞金县委书记，搞肃反扩大化，全县约 1000 多人当作“社会民主党”被错杀。

1931 年 10 月，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席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新任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大会表决，对搞“左”倾肃反的李添富执行死刑，制止了瑞金县的“左”倾肃反。

1931 年 10—11 月，朱开铨在瑞金县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1 年 11 月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举行，朱开铨负责合龙乡供应大会的物资工作。受到大会代表和中央领导表扬。

十三、1932 年 4 月—1933 年 4 月，当选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十四、1932 年 11 月—1933 年 6 月，朱开铨兼任云集区委书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朱开铨领导的云集区委，顶着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巨大政治压力，自觉抵制“左”倾宗派主义。当时党中央、中央政府党组织关系隶属云集区委。

1933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直属机关党总支委‘由中央直接领导。

十五、1933 年，2 月 15 日，朱开铨第一次到毛主席办公室，向毛主席汇报云集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3 年 2 月 16 日，晚 6 时到凌晨 1 时，毛主席到云集区苏维埃政府，

听取云集区九个乡 39 名积极分子汇报，朱开铨主持会议。1933 年 2 月 26 日，晚 6 时到凌晨 3 时，毛主席到云集区苏维埃政府，听取 200 多名积极分子汇报，朱开铨主持会议。

1933 年 2 月 26 日到 4 月初，毛主席亲自领导叶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工作，叶坪乡的查田运动最先取得成功。

1933 年 4 月，毛主席号召云集区每人节约三升米，支援前线红军，朱开铨领导云集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做群众动员工作，经过查田运动的群众觉悟很高，三天就捐出一千多担米，超过原计划四分之一。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

1933 年红五月扩红，瑞金县下达石集区 200 名扩红任务，云集区。实际扩红 1020 名(1932 年红五月仅扩红 9 名)，占瑞金县扩红 50%，毛主席称赞云集区已成为模范区。

1933 年 5 月，毛主席给朱开铨颁发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任命书。1933 年 6 月，毛主席在云集区叶坪乡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朱开铨向大会汇报云集区查田运动经验，在大会主席台受到毛主席表彰。

1933 年 6 月，云集区 400 名查田运动骨干组成工作团，依照《查田运动大纲》，到瑞金县其他八个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1933 年 6 月至 10 月，经新成立的长胜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朱开铨任长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 年 11 月，到苏维埃大学 2 大队学习。

1933 年 12 月，苏维埃大学校长（毛主席）任命朱开铨为 2 大队指导员。

1933 年 12 月，分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土地部工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十六、1934 年 1—4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在毛主席办公室工作。

1934 年 4 月底，任粤赣省苏维政府土地部长。

1934年5月初，接受毛主席的指示，采取组织措施整顿会昌县工作的混乱局面。

1934年5月5日—7日，毛主席亲临会昌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执行委员、区乡政府主席92人到会。毛主席、刘晓(省委书记)、钟世斌(省政府主席)、朱开铨(省政府土地部长)先后讲话。大会选举朱开铨任会昌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朱开铨领导下，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全面深入进行查田运动，依照《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健全区乡级政府工作；为配合红22师反“围剿”，扩大三个基干游击大队，建立游击小队；发动群众开展扩红运动；为前线筹粮筹款。很快就改变了会昌县落后局面，1934年6月12日，会昌县扩大红军2008名，位列中央苏区第四名。

1934年6—9月，任粤赣省会安工作委员会主任，粤赣省军区会安独立营政委。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斗争。

1934年6月17日晚，朱开铨按通知准时到达会昌文武坝毛主席办公室，汇报会安工作委员会筹建工作。

1934年6月18日，朱开铨率秘书钟桂华、机要员朱开钦、警卫员朱开铭等8人，在会昌县高排镇，接管三个月三次被广东军重创的党政军机关，重建指挥机关，安抚死难烈士家属，收编幸存人员约7(8)人。

6月20日—7月20日，朱开铨指挥独立营、保卫队和游击队，进行大小战斗12次，消灭小股民团160人。

7月16日夜，率部利用地形伏击广东军一个团，打死敌团长，消灭敌军100余人。

1934年9月下旬，在中央党校报到待命。

1934年10月上旬，朱开铨任中央工作团干事、中央罚没征收委员会委员(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中革军委五局特派员，率中央组织局县级干部队(26人)，与宋裕和局长率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管理局(宋任五局局长)、杨立三部长兼处长率中革军委总兵站部和中革军委保管处(杨任

五局副局长)，合编为中革军委(供给局)五局（长征中整编为四局）。

1934年10月10日，朱开铨看望何叔衡，何老说：“请你转告毛主席，我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我不怕苦、不怕牺牲，为革命奋斗到底。”

1934年10月18日，朱开铨进于都县城见毛主席，报告罗迈下调令去中央工作团任干事、中革军委五局任特派员，宋裕和是局长，杨立三是副局长，任务是保证中央红军白区作战供给，保管和运输中央红军金库的黄金银元，在白区补充经费，依法监督筹粮筹款。

1934年11月中旬，朱开铨患疟疾病，发高烧昏倒在行军路旁，毛主席及时发现，立即安排担架，派傅连璋治病，派卫生员钟光连续数天打针、送药。身体康复没有掉队。

1934年12月30日晚，朱开铨随同毛主席跨过湘江浮桥。1934年12月14日，到达贵州黎平，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实为缩编)，中革军委五局改编为四局，朱开铨任中革军委四局特派员。

十七、1935年1月11日，毛主席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讲话。罗梓民、丁伯霖、周兴、朱开铨、毛泽民、任弼时、陈二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朱开铨任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该片段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陈展)。领导土地委员会按政策打土豪、筹粮筹款，保证驻遵义的中央机关和部队以及遵义附近部队的给养。

1935年1月下旬—2月，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20余名干部，编入红3军团政治部，朱开铨任3军团政治部政务科长。

1935年3月，红3军团整编为四个团，朱开铨任12团（模范团团长谢嵩、政委苏振华）地方工作组主任。

1935年7月，在毛儿盖筹粮战斗负伤。

1935年9月26日，在通渭看到刘志丹名字的宣传土地革命布告。

1935年10月23日—1936年5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常委，省政府党团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负责筹建并主持省政府工作（该片段在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南梁革命纪念馆陈展）。

1935年11月8日，朱开铨率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大部分是陕甘边干部）开赴鄜县战区，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在连续紧张的工作中，坚持到战役结束，累的伤病复发，口吐鲜血，被省政府警卫队抬回救治。

1935年11月21—24日，毛主席亲自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重大胜利，打破了敌军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实现了将全国革命大本营安放在西北的战略目标。朱开铨率陕甘省支前工作团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

1935年12月初，夜晚，毛主席亲临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向朱开铨要可靠的向导带路赶往瓦窑堡（当时就派罗培兰找省政府运输队副队长米裕德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听取工作汇报，了解陕甘省干部情况。

1935年12月，时任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原陕甘晋省委书记），个人决定逮捕陕甘省政府粮食部长杨玉亭和习仲琪（两人都是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在陕甘省委副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长肖劲光、秘书长李一氓尚未到任情况下，朱开铨坚决制止朱理治继续搞肃反的“左”倾宗派主义命令，保护了杨玉亭和习仲琪。

十八、1936年1月，党中央安排习仲勋、张策到关中特委工作，途径陕甘省政府，朱开铨在王家坪热情接待他们住了几天，向他们全面了解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历史和干部情况。

1936年5月17日—1937年8月，任陕甘宁省委常委，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持省政府工作（该片段在甘肃省环县河连湾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纪念馆陈展）。

1936年5月初，中央电报召朱理治、罗梓铭、王子宜、朱开铨前往汇报工作情况后。

1936年5月下旬，经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介绍，组织批准，与罗培兰结婚。罗培兰1933年10月参加陕甘红军，是刘志丹派到南梁根据地的第一个女红军干部。

1936年12月中旬—1937年2月，任国民党统治区甘肃省西峰镇中国

工农红军办事处主任，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配合红一、二、四方面军进行山城堡战役。

十九、1937年2—4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驻三边代表(保留陕甘宁省委、陕甘宁省政府原职务)，兼任三边特委委员。三边特委书记毛泽民调新疆后，罗梓民任特委书记。特委委员高岗(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协辉(组织部长)、程理生(宣传部长)、甘渭汉(红29军政委)。

1937年4月下旬，作为陕甘宁省代表，在出席中央召开的苏区和红军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单独向毛主席汇报了原红26军42师政委，时任陕甘宁省三边特委委员、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岗的情况。

1937年5—7月，马海德诊断朱开铨为三期肺病。朱开铨在受中央的重视和关怀下，经卫生部精心治疗，身体逐渐康复。

1937年7月，奉中央命令以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身份，与陕甘宁省军事部长肖劲光、副部长赖传珠接待和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并派向导带路前往豫旺采访红军将领。

1937年7月—1938年3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法律起草委员会委员(该片段在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展)。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朱开铨，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摘掉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牌子，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

1937年10月，与张国焘旗帜鲜明展开斗争，几个月后张国焘就叛逃了。

二十、1938年4—9月，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代表，奉命到陇东特委、庆环分委检查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传达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指示。

1938年10—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检查各级政府贯彻执行边区政府工作指示的情况。

1938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机关党总支书记，分管农业；建设厅长刘景范(刘志丹胞弟)分管工业；建设厅下设公路局，局

长谢怀德。

朱开铨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报告，提出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粮食供给困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应发展边区农业生产，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成立农业学校等，得到边区政府批准。

二十一、1939年7月23日，陪同林伯渠主席和刘景范厅长出席边区农业学校开学典礼。边区政府任命朱开铨兼校长，边区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和畜牧三个部，一个实验农场，校址在三十里铺。

1939年底，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代表，负责陇东地区的公粮征收和调运工作，保障延安的粮食供给。

二十二、1940年2—8月，任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参与领导陇东分区反摩擦斗争。

二十三、1940年8月—1941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代表，负责征收和调运公粮，保障延安粮食供给。

二十四、1942年1月—1945年4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系统全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先后任六支、十一支党小组组长。

二十五、1945年4—6月，当选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令候补代表，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十六、1945年9月—1946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副专员，在陇东贯彻执行党的七大政治路线，与马锡五等同志一道，领导陇东土地改革和战争动员工作。

二十七、1946年2月—1947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专员，中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定在陇东的庆阳县，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开展试点工作，陇东专署给予大力支持，在试点工作中培养了一批土改干部。

二十八、1947年9月，调陕甘宁边区政府，协助林伯渠主席做战争动员工作，有效地调配陕甘宁边区人力物力，支持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

北人民解放军对敌作战，为边区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十九、1947年10月—1948年4月，中央土地改革训练班学习，系统学习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规定，学习和掌握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政策。

1948年5—12月，在中央组织部参加南下高级干部集中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南下工作的政策文件，待命南下。

三十、1949年1—5月，南下途经开封市，见到中原人民政府主席邓子恢，他向中央要求，任命朱开铨为中原人民政府荣誉军人管理处处长。三个月转运安置淮海战役五万余伤残军人，为渡江战役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十一、1949年9月—1950年9月，任江西省瑞金专员公署专员，中共瑞金地委委员，领导瑞金专区开展接管城乡，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建设各级政权和土地改革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50年8月27日，出席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前身），同年9月6日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1955年1月）。

三十二、1950年9月—1952年7月任江西省宁都专员区专员，中共宁都地委委员。与李庭序、罗元圻、刘英勇等同志，领导宁都地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反运动，建立各级政权，恢复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央苏区时被肃反扩大化错杀的同志平反，向他们家属发放烈士家属证，给予优抚。

三十三、1952年8月—1955年6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厅党组书记。1953年10月—1956年4月任江西省政法办公室党组副书记。

1954年江西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朱开铨领导省民政厅迅速开展救灾工作，他乘船深入灾区调查实际情况，及时向省政府汇报灾情，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组织分发赈灾物品，帮助灾区群众恢复生产，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民政部的表彰。

三十四、1955年4月—1966年5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56.7—1964.1)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25日、1957年4月1日、1958年6月、1959年6月、1960年6月、1963年12月、1964年10月，向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历届会议作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获大会审议通过。

三十五、1959年夏，在庐山会议期间按毛主席指示拜访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朱德还用毛笔为朱开铨题字，可惜的是和许多历史照片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当做罪证抄走了。

三十六、1961年9月，李富春、蔡畅夫妇到南昌看望朱开铨、罗培兰夫妇。

三十七、1962年10月，《刘志丹》小说中有一个中央红军朱全，是以朱开铨为原型，受到《刘志丹》小说问题的牵连，江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屡次上门，动员递交自愿退休申请。《刘志丹》小说问题受到牵连后就被打人另册，文革初期被内定为江西省第二批走资派。

三十八、1966年5月，江西日报陆续转载解放军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还转载光明日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朱开铨开始受到冲击。

1966年8——10月。

8月下旬，江西省委召开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出现矛头指向朱开铨的大字报，省高院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

9月初，朱开铨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受到严重冲击。

三十九、1967年1—12月。受上海市造反派“一月风暴”夺权影响，1月23日，江西省高院造反派公然抢夺党组和法院公章，抢夺法警武器枪支弹药。

1967年2—6月，省高院的“战斗团”“造反队”引进社会上的红卫兵，对朱开铨及其家人进行专政，朱开铨和家人受到摧残迫害。

5月3日早六时，朱开铨被省高院造反派押上大卡车，被江西省造反派“五·三”大游斗，省委书记、省长及省市机关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的领导干部被押上一百多辆卡车，绕南昌市区游斗。

7—9月。朱开铨被造反派非法“抄家”三十余次，家中凡是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些和老战友、老领导合影的珍贵历史照片被抄走，朱德用毛笔提的字也被当成罪证抄走。

四十、1968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接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陈昌奉任军管会主任。

1968年2月，军管会向省高院派驻军代表。

1968年9月，江西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将公检法机关被造反派揪斗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集中关押在新建县长堽原来的监狱里，称为“集训队”，朱开铨完全失去自由。

四十一、1969年5月，党的九大之后，驻省高院军代表到集训队所在监狱宣布朱开铨“解放”。

1969年8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省团校办了一个学习班，将省直机关被“解放”的老干部集中住在团校。

四十二、1970年1月，“三气”学习班结束，朱开铨终于回家了，可以正常看病取药，有了一定的安全感，身体逐渐恢复。

四十三、1971年10月，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飞机接朱开铨到福州，了解他的情况后，安排休养两个多月，陈昌奉安排返回南昌。

四十四、1972年11月—1975年12月，朱开铨任省革委会政法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筹建江西省政法干部学校。为江西省恢复了专业政法干部学校(现为江西省人民警察学校)，为江西省公检法系统培养了一大批政法专业干部。

四十耳、1973年任江西省春节拥军慰问团鹰潭分团团团长。春节前夕，

率慰问团到鹰潭市开展拥军工作，住市革委招待所，遇见从江西回北京的邓小平及其家人。

四十六、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因朱开铨1973年在鹰潭接待了返京复职的邓小平而受到政治打击，再次撤职闲居家中。

四十七、1978年2月—1984年5月，任政协江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四十八、1979年12月—1984年5月，任政协江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政法工作组组长。

1981年5月刘志丹夫人同桂荣来南昌看望朱开铨、罗培兰夫妇。

四十九、1982年1月1日，第四届江西省政协主席方志纯，副主席钟平、赖绍尧、沈翰卿、朱开铨、刘建华与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领导人一道，深入工矿和农村看望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人农民。

1982年9月中旬，到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县、会昌县、安远县和宁都县视察工作。

1983年庆城县党史研究室主任来南昌专访朱开铨。

五十一、1984年，主动向组织提出、经中央组织部批准离休。响应组织号召，开始着手回忆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的经历。

五十二、1985年11月，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江西视察工作时，专程前往江西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朱开铨。

五十三、1986年2月，习仲勋得知朱开铨病危，代表党中央派出医疗专家小组飞赴南昌及时抢救，朱开铨转危为安。

3月16日，中央批准朱开铨同志按省长级待遇。

1986年10月4日—7日贵州省遵义市委、市委党史资料研究室在南昌召开一九三五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健在委员研讨会，研讨遵义会议期间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朱开铨曾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是唯一健在的中央红军委员。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出席研讨会。

五十四、1987年9月，组织为朱开铨配备秘书，正式开始回忆录起草工作。

五十五、1989年10月，朱开铨糖尿病病情严重，从上海请来的医疗专家和江西医院的专家会诊治疗，控制了血糖，但是出现不能排尿的状况，用速尿也无效。朱开铨提出请他的老朋友，江西中医院院长姚荷生会诊。经姚荷生把脉诊治，用中药解决了无法排尿的危急病情。

同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江西医院老干部病房看望卧病在床的朱开铨，并指示要尽一切力量精心治疗。

五十六、199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朱开铨，指示江西省委省政府要关心和重视老革命前辈，江西医院干部病房要精心治疗和护理。

同月，杨成武将军到江西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朱开铨。

12月，汪东兴同志到江西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朱开铨同志，在交谈中回顾陕甘宁边区，以及在江西工作中的往事。

五十七、1991年2月完成了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的撰写工作。习仲勋同志作序，王首道同志题写书名，该书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做为党史资料永久收藏。

五十八、1993年1月16日，因糖尿病综合并发症，经上海医疗专家和江西省医疗专家全力抢救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彭志中执笔

2015年4月16日

后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朱开铨专集》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本书列入《江西党史资料》第45辑，分为朱开铨传记、文稿汇集、回忆与缅怀、附

录、生平年表等 5 个部分，是一部比较全面记录朱开铨生平大事的文献资料汇编。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办、江西省档案馆、中共赣州市委、市政府、中共咸阳市委、中共瑞金市委、市政府、中共庆城县委、县政府、中共华池县委、县政府、中共乾县县委、中共环县县委、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中共遵义市委党史办、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办、中共安远县委党史办、中共华池县党史办、中共乾县县委党史办、中共环县县委党史办、中共庆城县委党史办、瑞金中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延安博物馆、南梁革命纪念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刘志丹同志之女刘力贞、女婿张光及亲属，朱老生前工作人员杨斌同志（江西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等人专门写作纪念文章，提供档案、文献、口述史资料等；朱开铨同志子女为编幕此书提供了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朱开铨专集》虽几经修改，但其中不当、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党史、档案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5 年 12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开铨专集/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12

ISBN978-7-5098-3286-8

I. ①朱… II, ①中… III①朱开铨(1901~1933)-生平事迹 IV.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6037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徐玉凤(特邀)

复 审: 陈海平

终 审: 李青建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鞭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共南昌市委机关印刷厂

开 本: 140mm*203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375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286-8

定 价: 48.00 元